

青年自学丛书

世界史话

古代中世纪部分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话》编写组
上海汽车运输第三场

上海人民出版社

331
青年自学丛书
世界史话
古代中世纪部分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话》编写组
上海汽车运输第三场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16,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49 定价: 0.57元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
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
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
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
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
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
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
归于尽。

列 宁 语 录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氏族制度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	1
古埃及的太阳历	
——兼谈公历的由来·····	8
埃及金字塔·····	13
汉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社会·····	20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27
释迦牟尼与佛教·····	32
梭伦改革·····	38
伊索寓言·····	45
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斯巴达·····	52
马拉松战役·····	59
希罗多德及其《历史》·····	66
柏拉图及其《理想国》·····	71
布匿战争	
——罗马同迦太基争霸地中海·····	78
格拉古兄弟改革·····	85
斯巴达克起义·····	92
打开沉睡千年的罗马古城——庞培·····	100
早期基督教·····	106

罗马帝国的没落	111
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灿烂文明	119
古老的非洲大陆	128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帝国	135
阿拉伯文化	142
日本大化革新	148
遣唐使	
——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	153
吴哥窟	
——柬埔寨的象征	161
古代中西海上交通	168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	175
西欧的封建庄园	181
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	188
十字军东侵	194
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	201
瓦特·泰勒起义	207
马哥·波罗及其《东方见闻录》	213
捷克胡司战争	221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228
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235
新航路的开辟	
——殖民掠夺的开始	241
达·芬奇	248
哥白尼	255

莫尔及其《乌托邦》	263
欧洲的宗教改革	270
托马斯·闵采尔	277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	284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290
沙俄吞并乌克兰	297
斯捷潘·拉辛起义	304
沙俄的侵略魔爪伸向乌拉尔以东	312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318
附录：大事年表	326

氏族制度无力反对 货币的胜利进军

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环球旅行中，于1832年12月17日，乘船来到了拉丁美洲南端的火地岛海面。透过朦胧的迷雾，依稀看到岛上重叠的山峦和层层林木。此刻，达尔文的心潮犹如大西洋的波涛，汹涌澎湃，因为他即将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亲自考察岛上的生物资源，了解土著居民的风俗人情。

火地岛人，有着古铜色的皮肤，粗犷(guǎng 广)结实的体魄，散乱的长发。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直到十九世纪初，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成员中，男子捕鱼打猎，妇女采集根果，劳动所得在全体氏族成员之间进行平均分配。据说，有一年岛上发生饥荒，一个年轻人在海滩上幸运地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小鲸鱼——这是火地岛人十分喜爱的食物。尽管这个年轻人饿得发慌，但却没有触动它一下，而是立即去报告氏族，由氏族酋长带领大伙赶到海边，将那条鲸鱼分成若干块，平均分配给氏族的每一个人。

火地岛人中间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人们过着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他们没有多余的产品可以拿出去

交换，当然也没有作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火地岛人从来不知道私有制为何物，氏族内的财产为整个氏族公有。一次，有个欧洲人送给某个氏族成员一条被子，后者就将这条被子分割成若干面积大体相等的碎片，分给每一个氏族成员。这样做，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于来自资本主义英国的达尔文来说，却怎么也无法理解。

火地岛人的生活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人类的过去。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原始社会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劳动生产力十分低下，必须以氏族为单位共同劳动。通常，男子出外打猎捕鱼，妇女采集根果，或从事原始农业。当时，除了某些随身携带的武器和生产工具归氏族成员个人使用外，其他如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归氏族共同所有。尤其是土地的私有，更是不可想象的，印第安人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土地象水火，它不能属于任何人。”同时，由于劳动产品没有剩余，因此也没有交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这时，农业部落需要兽皮、肉类，畜牧部落需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于是出现了交换。不过最初的交换不是单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在氏族部落之间通过酋长来进行的。后来又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这时，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个体劳动已经成为可能，于是氏族公有经济逐渐分解成个体家庭经济，并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手工业者需要农产品和畜产品满足自己的生活 and 生产需要。同样，从事畜牧业和

农业的劳动者也需要陶器、锄头、布匹等手工业产品。于是，交换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发展成为个体劳动者之间的私人交换。这时，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便出现了。

交换形式最初是物物交换。从古埃及的一幅壁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交换的情景：有的人用瓦罐换鱼，还有的人用葱换扇子。直接的物物交换，必须是交换双方都恰巧需要对方的东西，交换才能成功，因此是非常不方便的。还以那幅壁画为例，如果有瓦罐的人用瓦罐去换鱼，有鱼的却不要瓦罐，而要葱；有葱的人既不要鱼，也不要瓦罐，而要扇子；如果有扇子的人正好要瓦罐，那末，有瓦罐的人，得先用瓦罐换扇子，然后用扇子换葱，最后用葱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鱼。但是，如果有扇子的人既不要瓦罐，也不要葱，也不要鱼，那末交换仍不能进行。由此可见，物物交换是很不方便的。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在人们中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惯例，即把自己所要卖出的商品，先换成人们普遍需要的某种商品，比如牲畜，然后再用牲畜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只要进行两次交换，就可达到交换的目的，不要几经周折了。因此，在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中，如牲畜这样的商品便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用它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这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牲畜，就成了“货币”。在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地区，曾有过不同的一般等价物，除牲畜外，还有帛(bó 驳)、贝壳，等等。拉丁文里“货币”一词，就是从“牲畜”这个词转化来的。汉字的“货”、“贷”、“财”，都含有一个“贝”，这说明中国古代曾以贝壳作为货币。

由于各民族或各地区充作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不一样，因而影响了商品交换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而且以牲畜作为一般等价物，既不易于保管、分割，也不便于携带。因此，后来一般的等价物都自然地落到贵金属金银上面。

货币出现之后，有了货币就可以交换任何种类的商品，就可以支配任何形式的财富。货币对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它象腐蚀性的酸类一样，加速了氏族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古老的氏族制度“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①。

货币出现之后，“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②过去以物易物常常受到时间、地点和品种等方面的限制，现在则方便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产品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起先只限于动产如牲畜、谷物，后来扩及不动产如土地、房屋。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

货币出现之后，尤其是金银货币出现之后，“求金欲就产生了”^③。以前，谁想占有社会财富，谁就要占有大量的土地、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09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49—350页。

③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51页。

牲畜和农产品。而现在,只要通过交换把它们变为货币,贮藏起来就行了。货币强烈刺激了氏族酋长积累财富的欲望,也提供了便于积累私人财富的强有力的手段。本来,氏族酋长只是氏族成员的公仆,不享有任何政治、经济特权,甚至在分发食物的时候,自己得到的往往是最少的一份。后来,随着交换的发生和发展,氏族酋长有可能利用职权,在交换过程中将一部分产品攫为己有。货币出现之后,这种化公为私的现象更普遍了,从而加速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公社的瓦解。

从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氏族成员没有贫富之分,没有阶级差别,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私有制刚萌芽的时候,阶级分化也不十分明显,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还是公有的,定期划分给各个家庭使用。但是,货币产生后,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在氏族公社内部,出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有了债务契约和各种形式的逼债,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在古希腊的雅典,有一个名叫阿里斯齐昂的农民,因遇上灾荒,庄稼颗粒无收,不得不向高利贷者李古克士借了十墨狄那麦子(一个墨狄那约合五十二公升)。然而实际拿到的只有五墨狄那,其余五墨狄那则已作了预付的利息了。一连三年,尽管阿里斯齐昂白天黑夜没命地干活,但是,不仅没有还清旧债,反而利上滚利,欠李古克士的麦子由原来的十墨狄那增加到四十墨狄那。阿里斯齐昂被迫丢下一小块土地,带着全家逃离雅典,流落异乡。

就在雅典城邦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广大氏族成员在高利贷者的盘剥之下,不得不将仅有的一小块土地抵押给氏族贵族,甚至本人及其子女也沦为债务奴隶。恩格斯深刻地揭露

说：“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①。

货币出现之后，不但可以用它来交换劳动产品，而且可以用它来交换人——奴隶，人本身也成了商品。恩格斯指出：“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②。以前奴隶只是从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现在可不同了。那些不能在战争中获得奴隶的富人们，就用货币购买奴隶，因而到处出现了买卖奴隶的市场。奴隶被广泛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奴隶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07—108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①。社会上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奴隶和奴隶主之后，氏族制度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财富，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便设立了各种强制性的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从此，古老的氏族制度完全解体，国家产生了，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70页。

古埃及的太阳历

——兼谈公历的由来

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历法——公历，有人曾似是而非地称之为“西历”。其实，究其根源，这种历法并非产生于西方，而是产生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埃及。

古埃及大体处于今天埃及的地理位置，源远流长的尼罗河由南而北纵贯全境。从邈(miǎo 秒)远的古代起，埃及人民就劳动、生息在尼罗河两岸；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由游牧转为农耕。

埃及气候炎热，雨水稀少，因此发展农业生产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埃及境内，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至10月是泛滥期，这时洪水夹带着大量腐殖质，灌满了两岸龟(jūn 君)裂的农田。数星期后，当洪水退去时，农田就留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11月进行播种，次年3至4月收获。但是，咆哮的洪水也常常带来不同程度的灾害。

勤劳勇敢的埃及人民，为了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认识到必须掌握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准确地计算时间，即需要有一种历法。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比如，把尼罗河每次泛滥的时间刻在竹杆上，然后加以比较，从中发现两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三百六十五天。同时，他们还发现，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根据，古埃及人便把一年定为三百六十五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年终加五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正如马克思所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①。有的人认为，埃及太阳历起点的那一年，当在公元前4241年，也有人说是在公元前4236年，但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早在六千多年前就问世了。

埃及的太阳历与回归年（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往来徘徊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时间——三百六十五天五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相比较，只相差四分之一天，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准确了。但是，一年相差四分之一天不觉得，经过四年就相差一天。经过七百三十年，历法上的时间比实际时间推进了半年，寒暑正好颠倒过来。经过一千四百六十年，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来了个周而复始。埃及人民在使用太阳历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岁差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难，并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给以补救。

后来，埃及的太阳历传入欧洲，经过不断改进，成为我们今天通用的太阳历——公历，又叫做“格里高利历”。

在欧洲，希腊和罗马早就有了自己的历法，但很不准确。相传在公元前八世纪，古罗马的努玛王在位时期，曾参照希腊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2页。

的太阴历，改订罗马历法，规定一年为十二个月，其中1、3、5、8四个月每月三十一天，2、4、6、7、9、10、11七个月各二十九天，12月为二十八天，全年为三百五十五天，比回归年少了十又四分之一天。由于误差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矛盾很多。

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罗马奴隶主阶级的著名政治家凯撒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罗马是一个雄踞地中海的大国，奴隶制经济相当发达。生产的发展，需要有一种较为准确的历法。公元前46年，凯撒聘请亚历山大城（位于埃及）的天文学家索西尼斯，以埃及的太阳历为蓝本，编制历法。埃及人民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便传入欧洲。

凯撒历法对埃及太阳历每年约四分之一天的误差作了调整，办法如下：平年定为三百六十五天，每四年置一闰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1、3、5、7、9、11每月三十一天，4、6、8、10、12每月三十天，2月平年二十九天，闰年三十天。这样就更加接近回归年了。因凯撒的姓氏是儒略（也译为尤里乌斯），因此经凯撒改革后定下的历法，习称“儒略历”。从公元前45年起罗马开始使用。因凯撒生在7月，故称7月为“儒略”。至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他因为生在8月，于是从2月抽出一天加在8月上，使8月也成为大月，并称之为“奥古斯都”，以显示他的地位不低于凯撒。同时将9、11两个月定为小月，10、12两个月定为大月。作这样的改动后，就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差不多，即1、3、5、7、8、10、12月，每月三十一天，4、6、9、11月，每月三十天，2月平年二十八天，闰年二十九天。由此可见，各月的天数参差不齐，并无天文学上的根据，完全是统治阶级人为地造成的。

公元 325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但没有规定以哪一年作为儒略历的起点。后来，到了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徒上推五、六百年，把传说中的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说成是公元元年。所谓“公元”，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主的生年”（以拉丁文 A.D. 表示）。在此以前称为“公元前”，英文的意思是“基督以前”（用英文 B.C. 表示）。

十六世纪，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农牧业的发展，儒略历日益不敷需要。因为儒略历虽然比埃及的太阳历进了一步，但较之回归年仍有十一分十四秒的误差，积一百二十八年又要相差一天。儒略历在欧洲通行了一千六百多年，至十六世纪下半叶，历法上的日期比回归年迟了十天，比如，1583 年的春分应在 3 月 21 日，历法上却是 3 月 11 日。此外，教会规定耶稣复活节在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由于春分已相差十天之多，耶稣究竟在哪一天“复活”的，也成了问题。因此，对儒略历作进一步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 1582 年组织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历法上 1582 年 10 月 5 日到 14 日之间的十天宣布撤销，继 10 月 4 日之后为 10 月 15 日，所以 1583 年的春分又复归于 3 月 21 日；二、过去四年置一闰，四百年共计一百闰，现在改为四百年中有九十七个闰年，从而大体上弥补了十一分十四秒的误差。置闰的方法是：凡是逢百年那一年可以用四百除尽的就是闰年，除不尽的就不是（如：1600 年是闰年，1700 年、1800 年、1900 年皆不是闰年，

2000年是闰年)。这就叫做“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通令，中国以格里历为国家历法，并采用公元纪年，但不废除农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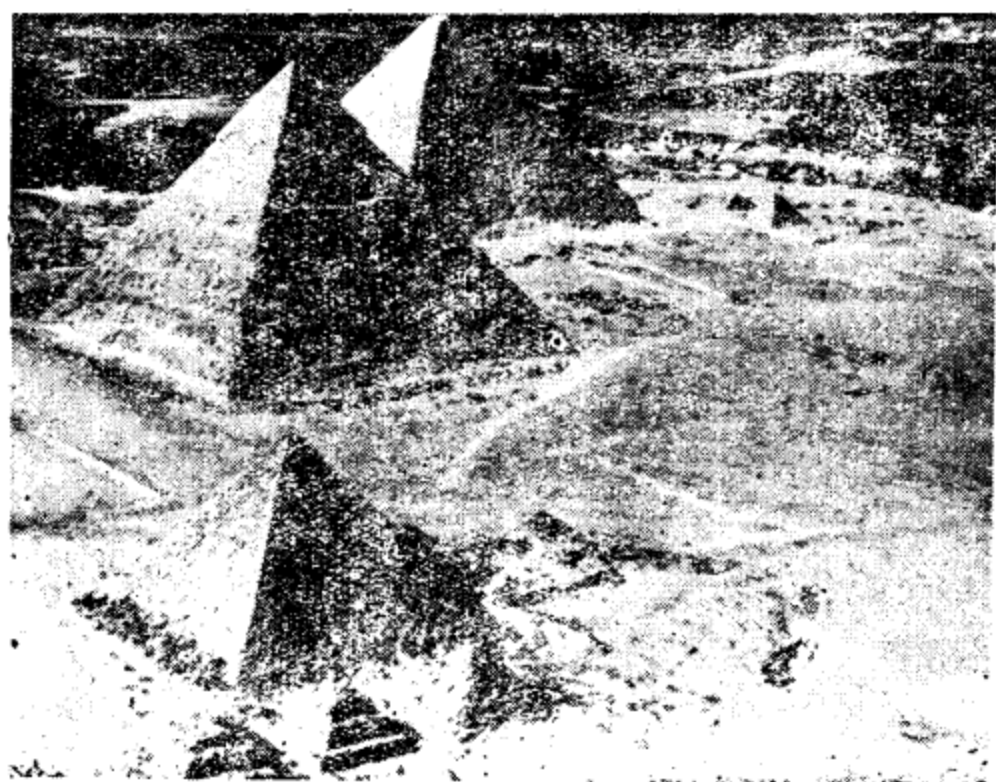
当然，格里历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每月的天数仍然参差不齐，规则性不强，特别是每经过三千几百年还会有一天的误差。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天文学的进步，这些缺陷将不断得到改进，使之更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埃及金字塔

埃及的金字塔，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宝塔，而是古埃及法老（国王）的一种陵墓。法老死后将其尸体制成尸干——埃及人称为“木乃伊”，放置在金字塔内部的墓室里。因为金字塔底呈正方形，四壁呈三角形，倾斜向上，止于顶端，平视过去颇象汉字的“金”字，因此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

自埃及首都开罗西行不远，在碧绿的尼罗河谷和浩瀚的撒哈拉大沙漠交汇处，有一个叫做吉萨的地方，那里矗立着三座最大的金字塔。清晨，它们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呈现出玫瑰紫色，与尼罗河交相辉映，十分壮丽；月夜，它们象一座座黑影幢幢的山峰，巍峨峻峭，傲视长空。

最初，埃及法老的陵墓不是“金”字形，而是长方形的，象一个大的石凳，被称作“马斯塔巴”（意为石凳）。随后，出现了阶梯形金字塔，它的形状颇象几个逐个缩小、彼此重叠起来的马斯塔巴。随着法老权力的不断扩大，法老陵墓的规模越造越大，发展成角锥体金字塔。金字塔大多数建筑于埃及古王国第三到第六王朝统治时期（约前 2800—前 2300 年），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金字塔时代”。埃及境内约有七十多座金字塔，其中座落在吉萨的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最为雄伟。第六王朝以后，随着埃及古王国的分裂和法老权力的下降，金



金 字 塔

字塔也就很少建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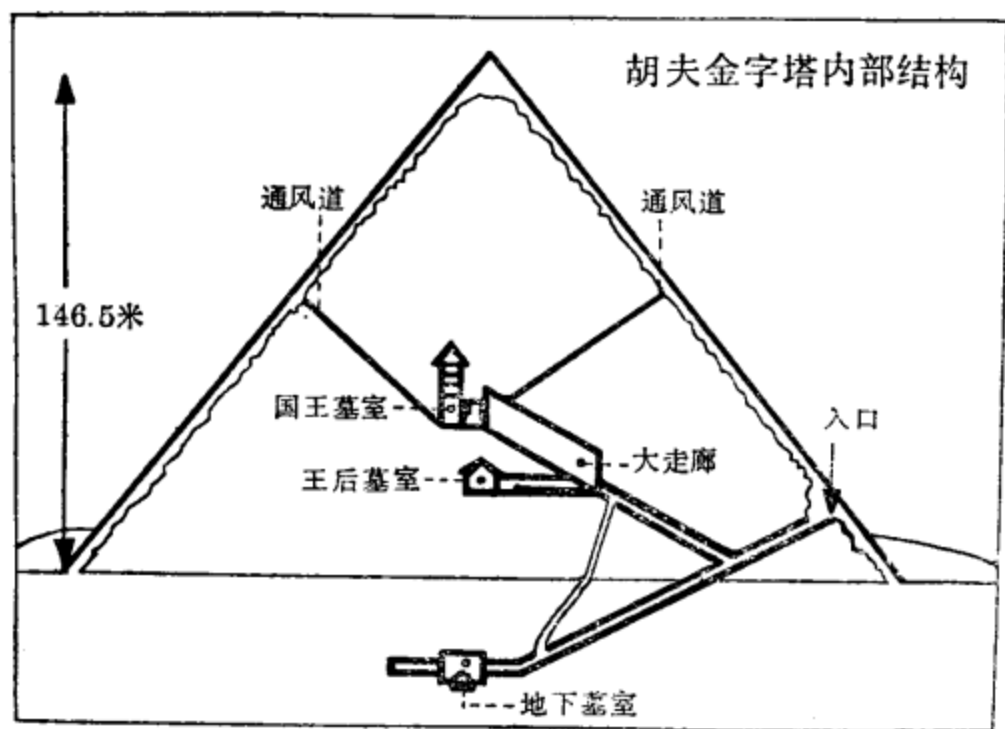
金字塔时代的埃及，处于奴隶社会。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也象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顶是法老和僧俗贵族。塔身是自由民的中间阶层，如商人、作坊主和富裕农民。压在塔底的是广大奴隶、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法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头目和专制独裁的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全国的土地。臣属朝见法老，必须行跪拜礼。法老的生活也极其奢侈豪华。

法老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呢？这要说到一个神话。据说在上古埃及，有一个国王名叫奥西里斯，他有一个兄弟名叫塞特。塞特存心不良，为夺取王位，谋害了他的哥哥，还把尸体

切成十四块，扔到各处。后来，奥西里斯的遗腹子荷拉斯长大成人，打败了塞特，为父亲报了仇。荷拉斯和母亲一道将分散各处的父亲的尸体找回，拼凑起来，做成尸干，然后借助神灵，使奥西里斯复活了。不过，奥西里斯未能回到人间，而是做了阴间的主宰。荷拉斯继承了人间的王位。兴建金字塔可能与这个神话有关。埃及法老们活着的时候作威作福，死了也幻想做阴间的主宰，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庇佑着世上的子孙，代代为王，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金字塔就是法老为自己的“未来”准备的宫殿。至于为什么将尸体制成“木乃伊”，那是由于当时埃及人有一种迷信观念，认为只有保存好尸体，灵魂才有寄托的地方。所以人死以后，先将死者的脑浆和内脏取出来，填进桂皮、乳香等香料，然后将尸体浸入防腐液里。过若干天，再将尸体取出晾干，用麻布裹好，外面涂上一层树脂，制成经久不腐的“木乃伊”。

法老胡夫的金字塔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绕一周约一公里，占地五万二千九百平方米。塔身由二百三十万块石块叠成，平均每块重达二点五吨。这些石块如用火车装载，需要六十万辆车皮，将这些车皮一辆辆衔接起来，可从开罗横贯北非，直到大西洋沿岸的达尔贝达（卡萨布兰卡）。石块之间没有施泥灰之类的粘着物，完全靠了石块本身的重量紧紧地压在一起。至今已历时近五千年，塔基还十分牢固，仅比初建时略有下沉，其外形没有发生明显的倾斜，棱角的线条仍然清晰可见。只是由于风沙烈日的侵蚀，塔的顶部剥落了约十米。阿拉伯人有句谚语形容金字塔的坚固，说：“一切都怕时间，而时间却怕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也相当复杂。金字塔只有一个入口，位于塔的北壁，离地十三米，是由四块巨石支撑的三角形拱门。进门之后，沿着一条约一百米的下坡甬道，到达一个墓室（高三米）。它不在塔身中，而是深入塔底，在离地平面约三十多米的地方凿成的。造好之后，大概胡夫不满意，于是又改变施工方案，在下坡甬道中途，离入口处约二十米的地方，另辟一条上坡甬道，通往一间约六米高的王后墓室；继续沿着上坡甬道向前伸展的是一条高达八米的大走廊，胡夫的墓室就设置在大走廊的尽头，距离地平面约有四十多米。墓室高约六米，内有石棺一口。墓室顶是用九块大石板盖成的。在墓室的上面，还有一个五层“缓冲室”，其最上面一层的顶盖是三角形的，目的是用来减轻墓室所承受的压力。此外，在胡夫墓室的南北墙上，还有两条直通塔壁的通风管道。整个金字塔，



就象一座规模十分巨大的宫殿。

在吉萨金字塔的建筑群中，还有一座引人注目的狮身人面石雕像，高二十米，长约五十七米，一只耳朵就有二米长，面容颇象胡夫之子哈佛拉。过去，有人猜测雕像里面可能有甬道、厅堂等建筑结构。据说，有人曾用大炮轰击这座雕像，想打开通往内部的入口。结果一无所获，反而破坏了雕像的面部，弄得丑陋不堪。后来经过仔细研究方才弄明白，除狮爪是用石块砌成的以外，整个狮身人面像是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雕成的。

巨大的胡夫金字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保留下来的有关史料是很少的。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游历埃及，在其所著《历史》一书中，记载了当时流传的关于建造胡夫金字塔的一些情况。

胡夫即位不久，就决定为自己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命令一出，各地官吏手持棍棒皮鞭，走遍每一个村镇，挨家挨户地征调石工、木工、金工、泥水工以及其他劳力。被强征来的民工和奴隶，编成十万人一班，每班服役三个月，轮流替换。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工程开始了。首先是采石块。石工和奴隶们冒着酷暑，在尼罗河以东的阿拉伯山（位于今埃及西奈半岛）岩上，按照划定的尺寸规格，凿许多洞，插入木楔，然后灌水，利用木楔遇水的胀力使岩石裂开，再加工成为光滑平整的长方形石块。重达两吨半的石块是如何运到工地去的呢？当时埃及人没有学会使用车辆，工匠们采用了一种用人或牛拉的木橇作为运输工具。但是，木橇在坎坷不平的路上不便移动，为此又修了一

条平坦的大路。修路的同时，另有一批工人开凿金字塔的地下墓室。只是这两项工程就花费了十年时间。

道路和地下墓室造好之后，接着建造金字塔身。当时埃及尚处在铜器时代，没有任何铁制工具，要把二百三十万块巨石一层层地垒上去，一直垒到五、六十层楼的高度是非常困难的。据传说，金字塔的建造者们，先垒好第一层，然后四面堆起一个和第一层一样高的土坡，顺着土坡将石块拉上第二层。以后，土坡随着塔身的升高而不断升高和扩大，一直堆到塔顶。这样，金字塔建成之后，几乎全部都被埋在象山一样高的土堆里面了。随后再将土坡移走，让金字塔显露出来。建造塔身、王后墓室、法老墓室等工程，又花去了二十年的时间。因此，胡夫金字塔从动工到建成，足足用了三十年。

卑贱者最聪明。金字塔凝结了古埃及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金字塔不但浑厚壮观，而且角度、线条的计算也非常准确。有人仔细测量过胡夫金字塔，其正方形底座每边的长度，平均误差只有一点五二厘米。这充分说明，金字塔的建造者们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

胡夫金字塔的建造，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数以十万计的民工，终年从事十分繁重的劳动，还要忍受饥饿的煎熬。不知有多少民工遭到监工惨无人道的吊打和折磨，又不知有多少民工倒毙在采石场上和金字塔旁。同时，胡夫把建造金字塔的费用，全都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这笔费用的总额无史籍可考，不过从一个数字可见一斑。据希罗多德说，光是给金字塔的建造者购买萝卜、葱、蒜，就花掉一千六百塔兰特银子（约合四万五千公斤）。由此可以想见，建造整个金字

塔花去的银子，恐怕要堆成一座银山了。

繁重的徭役和赋税，迫使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反抗法老的反动统治。胡夫和哈佛拉死后，起义者曾冲进金字塔，将胡夫和哈佛拉的木乃伊拖出，撕得粉碎。近代考古证实，胡夫和哈佛拉金字塔里的木乃伊确实没有了，甚至连胡夫的棺盖也不知去向。在其他一些金字塔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法老们的“永存尸体”，象他们所幻想的“永久统治”一样，都不免于在人民起义的烈火中化成灰烬。

金字塔是埃及法老实行奴隶主专制统治，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和奴隶的见证，是一部石头教科书。同时它也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伟大创造者。

汉谟拉比法典与 古巴比伦社会

1901年12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数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石碑，高二百二十五厘米，底部圆周一百九十厘米，顶部圆周一百六十五厘米。经过研究确认，在石碑上半段那幅精致的浮雕中，太阳神沙马什端坐在宝座上，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恭谨地站在它的面前，沙马什正在把象征帝王权力的标志——权标授予汉谟拉比。石碑的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定的一部法典，是用楔（xiē 些）形文字书写的，约八千字（其中有少数文字已磨灭）。这个石碑的出土，是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它把我们带到了近四千年前的古巴比伦社会。

古巴比伦王国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古希腊人称这一地区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古代两河流域，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

两河流域北部山峦重叠，多矿产和石材、木材。南部为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全区气候干旱，一年有十个月缺雨，农业



下部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

主要靠人工灌溉。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上半叶，在苏美尔地区就形成了许多奴隶制城邦。所谓城邦，即以一个小的城市为中心，包括它周围的农村地区，因此又叫城市国家。著名的有拉格什、乌尔等。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在阿卡德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如阿卡德等。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叶，阿卡德统一了阿卡德地区，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并进而征服了苏美尔、亚述等地区，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

约公元前 2189 年，阿卡德王国灭亡，两河流域再度陷于分裂。后来，乌尔兴起，建立“乌尔第三王朝”（约前 2113—前 2006 年），但也只是统一了巴比伦尼亚，而且为时不过百余年。

重新统一两河流域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东岸，“巴比伦”一词原意为诸神相会之地。该城地处两河流域的中心，扼西亚交通要冲，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又是一个战略要地，这就为以巴比伦城邦为中心统一两河流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十九世纪初，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至第一王朝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前 1792—前 1750 年）^① 时，经过三十余年的征战，约于公元前 1758 年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国王总揽全国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大权，中央设大臣辅佐朝政，地方委派总督治理。中央和地方官吏都直接听命于国王。全国土地大部分控制在国王手里，作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宗教，特别是“君权神授”的说教，是国王的精神支柱。

汉谟拉比为了巩固巴比伦王国的奴隶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原来各城邦的法律、法令，制定了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即汉谟拉比法典，并将法典的全部内容刻在石碑上，立于一座庙宇中。

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对西亚等国的成文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二百八十二条，其中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和债

^① 帝王和首相用在位和执政的年代，一般用生卒年，下同。

务奴隶、继承权、伤害和赔偿、奴隶地位等内容。这部法典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面貌。

汉谟拉比法典是一部道地的奴隶制法典。它强烈地保护奴隶主贵族、僧侣、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维护这些阶级和阶层对广大奴隶以及下层平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法典第十五至第二十条规定，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逃亡奴隶一旦捕获必须交还原主，盗卖奴隶或藏匿奴隶者处死刑。法典还规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出卖、转让和抵押。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如同牲畜，法典第一九九条规定，如果伤害了奴隶的眼睛，以这个奴隶的一半身价赔偿原主；第二四七条规定，如果伤害了公牛的眼睛，也以这头公牛的一半价钱赔偿原主。可见，完全把奴隶和牲畜视为同类。相反，如果奴隶稍微伤害了奴隶主，则要受鞭笞(chī 吃)、割耳及断骨等刑罚。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奴隶主还给奴隶规定了特殊的发式，如果理发师私自剃除奴隶的特殊发式，要砍断手指。

奴隶被使用于王室、寺庙的土地上和作坊里，也使用于中小奴隶主的土地上，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据泥版文献记载，某奴隶主租来一个奴隶，每天要他磨六十卡(约五十公升)豆粉，还要做其他杂务，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巴比伦社会里，下层平民，主要是租种土地的小农也受着奴隶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他们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缴给土地出租者。租种果园的小农，租税高达收获量的三分之二。有个名叫乌巴尔—沙马什的小农，租种

义鲁姆—巴尼一小块土地，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秋收。但是，粮食刚收上来，义鲁姆—巴尼就瞪着血红的眼睛上门逼租了，富商伊兴杜姆也上门索取乌巴尔—沙马什这年春天向他借的五百公升粮食的本息。乌巴尔—沙马什交了租，还了债，再交完了各种苛捐杂税，一年的劳动全部付诸东流。乌巴尔—沙马什衣食无告，前途不外乎把子女卖为奴隶，甚至连他本人也沦为债务奴隶。

广大奴隶和小农不断以怠工、逃亡等形式反抗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当时流行于巴比伦民间的一些诗歌，就反映了奴隶们的反抗情绪。在一首《主人与奴隶的对话》诗中，主人（奴隶主）在他那贪得无厌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之后，就问他的奴隶：“现在怎么办好呢？”奴隶嘲笑主人说：“切断我的脖子和你的脖子，然后把尸体一起抛到河里去，这就好了。”激怒的主人咬牙切齿地威胁奴隶说：“我要把你杀死并叫你不得不走在我的前面。”奴隶毫无畏惧地答道：“我死后，你也活不到三天。”严正警告奴隶主，一个奴隶牺牲了，千百个奴隶会站起来，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

汉谟拉比为了增强国力，保证税源，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此还特别设立了管理水利工程的官吏，名叫“河渠使”。汉谟拉比驱使奴隶和农民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凿了一条运河，沟通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灌溉广大的农田。为了把水引上高地，还应用了较便利的扬水装置。由于灌溉系统的扩大和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

巴比伦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

开设了手工业作坊。汉谟拉比法典提到十多种手工业，如织布、冶金、木作、造船、制砖、建筑、陶器和皮革等。

巴比伦的商业也比较兴盛。国内贸易，主要是城乡之间相互交换农牧产品和手工业品。许多城市都有特定的市场，而且价格经常有所涨落，这反映了经济生活的活跃。对外贸易，巴比伦输出农牧产品，换取它所缺乏的金属和建筑材料。

在科学文化方面，巴比伦的广大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作出了许多贡献。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大约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起初，单用图形表示简单的意思，一符一义。为了便于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后来又出现了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字符也从早期的两千多个减少到五百多个。两河流域南部缺少石料，也没有埃及的那种可书写文字的纸草，因此人们就用当地取之不尽的粘土，制成大大小小的泥版作为“纸”，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骨棒或木棒当“笔”，在泥版上勒出竖的、横的和斜的各种符号。由于落笔处印痕较为深宽，提笔处较为细狭，形状很象木楔，故有楔形文字之称。书写好的泥版，用火烘干，质地十分坚硬，不受虫蛀，不会腐烂，可以保存数千年。已经出土的大批泥版文书，是研究古史的宝贵资料。

巴比伦人在生产斗争中，由于兴修水利，丈量土地，测量容积，掌握农时的需要，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所发现。恩格斯说：“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①巴比伦人计数采用十进位和六十进位（六十进位用于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77—78页。

计时)。已经知道分数，会开平方和立方，解二次方程式和某些三次方程式。

巴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观测得相当准确。太阴月的持续时间，测定为二十九日十二时四十四分三又三分之一秒，这与现代天文学家测定的数字相差只有零点四秒。巴比伦人通过长期观察星象(占星术)，熟悉了星体的运行周期，发现月球每过二百二十三个朔望日，即十八年零十一日又回到其原来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回到原来交叉点和近地点。根据这个周期，他们能够预测日月蚀。巴比伦的天文学对后世欧洲天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著名的希腊天文学家希柏卡斯，一直在天文学方面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当大量的泥版文献出土后，一对照，原来他的理论多是承袭古巴比伦人的成果。此外，巴比伦人在建筑、造型艺术、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医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上面我们从汉谟拉比法典说起，介绍了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概况。有的同志或许要问，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那块石碑，怎么会从两河流域跑到苏撒去了呢？原来，古巴比伦王国的西邻，即今天的伊朗西南部，有过一个名叫依兰的国家，一度相当强盛。约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上半叶，依兰侵入巴比伦尼亚，估计就在这时，依兰人将石碑移到了苏撒，并磨灭了石碑上的部分文字。这部分被磨灭的文字，幸好从其他出土的泥版文书上得到补充，因此，我们今天得以看到这部法典的全文。

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珍贵石碑出土后，就被法国人劫去，现存巴黎卢佛博物馆。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与中国、埃及、巴比伦并列为东方的四大古国。勤劳、勇敢的印度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几千年来，印度社会的发展一直比较迟缓。研究其原因，这与印度种姓制度——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有一定的关系。

印度的名称起源于印度河。中国汉代史籍译作“身毒”或“天竺”，至唐代改译为“印度”。印度的原始居民，叫做达罗毗荼(pí tú 皮图)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印度河谷先后发现几个古代城市遗址，著名的有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均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因此统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存在年限约为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至前二千年代中叶。一般认为，达罗毗荼人是哈拉帕文化的创造者。根据考古发掘证实，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石制工具仍然使用，但青铜器已大量出现，其中有锄头、镰刀、鱼钩、匕首、箭头等。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已知使用犁和耕畜，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棉花等。手工业除冶金外，还有纺织和制陶。宝石和象牙的雕刻相当精致。有一种石制印章，上面刻有图案和文字，不过这种文字至今尚未释读出来。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

市，规模相当大，占地二、三百公顷，主要街道宽达十米。房屋一般是用砖砌的，除了小房之外，还有许多两层的楼房，以及包括大厅和许多房间的大建筑。从中可以推定，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后来，哈拉帕文化湮灭了，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湮灭的原因，据推测，可能与雅利安人的入侵有关。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分达罗毗荼人（少数达罗毗荼人逃到印度南方，今天在马德拉斯邦一带尚有其后裔）。入侵者是白种人，自称“雅利安”，意为高贵者，以区别于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雅利安人早先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入侵印度后，雅利安人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由游牧转为定居农业，并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在社会上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种姓”一词，在印度的梵文中称“瓦尔那”，意为颜色、品质。

古代印度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地位最高。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行政权与军事权，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以上两个高级种姓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靠剥削为生，构成为统治阶级。吠舍

是小生产者，即自由民的中下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保持严格的界限。凡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视为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奴隶主阶级还利用婆罗门教，给种姓制度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婆罗门教是由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演变而来的。它把《吠陀》——印度最古的宗教作品和文学作品，作为经典。婆罗门教虽然不设庙，也不崇拜偶像，但规定了非常烦琐的祭神仪式，从私人的日常生活至国王即位，都要祭神，祭品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有具体规定。

婆罗门教宣称把人分为四个种姓完全出于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它引用《吠陀》中的神话说，造物神——“梵天”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用肩和手创造出刹帝利，用膝创造出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同时，婆罗门教还大肆宣扬轮回说：凡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者，来生可升为较高种姓，否则，即降为较低种姓。对于广大被剥削者来说，应该逆来顺受，放弃斗争，遵守奴隶主阶级制定的“达磨”即法律，以免加重来生的灾难。

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反动的种姓制度，制定了种种法律，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摩奴，依照婆罗门教神话的说法，是梵天的儿子。假托摩奴名义制定的这部法典，其目的是“为了在应有的次序上确定婆罗门和其他种姓的义务”。

摩奴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一切创造物的主宰”，可以

强迫首陀罗服劳役，而后者应该“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务”。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而婆罗门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为了镇压低级种姓吠舍、首陀罗的反抗，法典规定了许多残酷的刑罚，如有这样的条文：“低级种姓用肢体的那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须将那一部分肢体斩断，动手的要斩断手，动脚的要斩断脚。”还规定首陀罗如果评论婆罗门祭司的品行，就要用沸油灌入他的嘴里和耳朵里。杀死婆罗门的人应处以最痛苦的死刑。但是，高级种姓杀死首陀罗可用牲畜抵偿，或者简单地净一次身就行了。此外，法典还对各个种姓的职业、婚姻、服饰、起居、饮食等，作了烦琐的规定，如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同室而居，不能同桌而食，甚至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种姓的人严格禁止通婚，以使种姓的划分固定化和永久化。

每个种姓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种姓长、种姓长老会以及种姓全体大会，处理有关种姓内部的事务，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那些被开除出种姓的人也归入贱民之列。贱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在路上，贱民要佩带特殊的标记，口中要不断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或敲击某种器物，以告知高级种姓的人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果接触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后要举行净身仪式。我国东晋法显和尚去印度取经，曾目睹印度贱民的悲惨处境，他写道：贱民“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贱民与首

陀罗被压在印度社会的最底层。

总的说来，印度的种姓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制度，但是，由于鲜明的阶级关系被掩盖在等级的划分之中，因此它容易模糊阶级界限，在劳动人民之间制造隔阂和对立，不利于他们团结对敌。此外，种姓制度实行职业世袭，把生产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种姓制度的存在，是造成印度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自古代至近代，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但是种姓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亚种姓。今天，在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贱民，达几千万人。

释迦牟尼与佛教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在古印度的北部，相传有十六个奴隶制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恒河中下游的摩揭陀及位于恒河上游的憍萨罗。这些国家的奴隶主阶级，竭力维护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社会上的人被分成四个种姓，即四个等级：婆罗门，为祭司贵族，掌握神权；刹帝利，为军事贵族，掌握军事权和行政权；吠舍，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首陀罗，为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及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同时，这些国家的婆罗门种姓，还利用婆罗门教作为统治工具，给奴隶制度和种姓制度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

摩揭陀国王瓶沙王（约前 543——前 491 年）在位时期，国势日盛，他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开始向外扩张。在他之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摩揭陀统一了整个印度北部。就在连年征战的过程中，作为军事贵族的刹帝利种姓，其政治地位日益显要，经济力量日益雄厚，因而越来越不满足于他们自己在种姓制度中所处的次等地位，公开向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婆罗门种姓提出挑战。此外，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吠舍的上层由于经营工商业而发家致富，成为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也觊觎（jì yú 技鱼）婆罗门种姓的权位。佛

教，正是作为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反对婆罗门种姓的宗教，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出现于印度的。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 565 年生在一个释迦族的贵族之家，属刹帝利种姓。“释迦牟尼”本来是佛教徒对成“佛”后的悉达多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觉悟者”）的略称，一般专指释迦牟尼。佛教寺院的“大雄宝殿”里，当中那个偶像通常叫如来佛，“如来”和“大雄”^①都是释迦牟尼的称号。

据传说，悉达多的父亲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地方的一个部落首领。悉达多于二十九岁那年，离开了双亲、妻儿，出家修道。经过七年的冥思苦想，终于大彻大悟，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了所谓“佛”。此后，释迦牟尼就在恒河流域收容门徒，传播佛教，达四十余年。

释迦牟尼不承认婆罗门教经典《吠陀》的权威性，反对杀生献血的祭祀和烦琐复杂的宗教仪式，否认必须通过婆罗门祭司才能修行得道。同时，佛教因袭了婆罗门教关于“轮回”和“业”的说教，作为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论的理论根据。按照这种说教，有生命的东西总有一个前生和一个来生。这辈子是人，前生和来生不一定是人，也许是饿鬼、畜牲，也许是神，即使是人，也有富贵贫贱的不同。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象车轮似地一生一生流转不停。至于某一生是个什么，这决定于前生的业。业是行为，包括思想、言语、行动。劳动人民之所以受剥削受压迫，都是个人前生的业所决定的，简单一点说，就是命该如此，为了来生不再受剥削受压迫，此生必须忍耐服从。

^① 大体与佛教同时兴起于印度的耆那教，其教主也叫“大雄”。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也就是四个基本“真理”：苦、集、灭、道。“苦谛”是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受苦的，生、老、病、死等都是苦。“集谛”指苦的原因，有欲望就有行为（业），因而不免轮回之苦。“灭谛”就是消灭致苦的原因，要摆脱苦就要消灭欲望。“道谛”是导致消灭苦因的道路，要消灭苦因就要修道。

佛教的理想是“涅槃”（niè pān 聂盘），据说这是一种灭绝一切欲望而达致完全寂静的至高无上的精神状态，真是玄而又玄。后来，涅槃一词多指佛或得道和尚的死亡。

佛教还宣扬“众生平等”，胡扯什么饿肚子的人固然苦，可是吃得太多而不消化的人也不舒服；抬轿子的人固然苦，可是坐轿子的人坐得时间长了也会腰痠背痛。这种所谓“平等”当然是极端荒谬的。但是，佛教的“平等”主张的欺骗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按照婆罗门教的“法”（也就是维护以婆罗门为首的种姓制度的国家法律），首陀罗不但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连听别人诵读婆罗门教经典都是犯法的，更不用说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了。佛教则与婆罗门教不同，它收容首陀罗做信徒。这不是很平等吗？

其实，佛教从来不反对现实世界的种姓制度，相反，释迦牟尼认为刹帝利是最优秀的种姓，因而也就肯定了按所谓优劣划分等级的种姓制度。佛教反对的只是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地位，并不反对特权本身，说穿了，就是要由刹帝利种姓取婆罗门种姓而代之。

马克思在批判基督教时说，基督教“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

行辩护”^①。佛教同样如此，它用宗教面前的假平等掩盖现实社会的真不平等，以达到维护剥削制度的目的。

早期佛教还有一点不同于婆罗门教，也不同于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它没有创造一个“主宰世界”的最高崇拜对象。当时佛教没有神庙，也不崇拜偶像。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徒把他火化后留下来的骨头和灰烬，分散保存在各地兴建的“窣(sū 苏)堵波”(一种印度塔)里，这就是所谓“佛牙”、“舍利”。这些东西以及一些佛教遗迹，是早期佛教徒的崇拜对象。佛寺和偶像是以后才出现的，而崇拜释迦牟尼的偶像大约是公元一世纪以后的事。

释迦牟尼为教徒制定了“戒律”。在家的和出家的教徒都必须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出家的教徒就是和尚(僧)，除了剃除头发胡须，穿僧袍并完全脱离家庭生活外，还要遵守另外一些戒律，如饮食要有节制；不观赏舞蹈、音乐、戏剧；不佩戴饰物，等等。其实，这些戒律只不过说说而已，并不认真遵守。尤其是那些口念“阿弥陀佛”的反动统治阶级，哪一个不是嗜血成性、骄奢淫逸，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佛教在印度盛行一时。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曾立佛教为国教。

早期佛教徒的组织比较松散，而且教义和戒律都是口头传授，解释各异，因此佛教很早就形成了不同的宗派。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徒就举行过几次“结集”(会议)，希图确定教义和戒律，弥合宗派的分歧，但是毫无结果。早期佛教还认为修行

^①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8页。

虽然可以使人达致涅槃，但不能人人成佛。后来，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佛教中有一派造了寺庙，崇拜起偶像来了。他们宣称只要信佛修行，人人都能成佛，并说这样气派大，乘的是大车，故有“大乘”佛教之称，而把保持原来说教的另外一派贬为“小乘”佛教。

在佛教广泛传播期间，婆罗门教曾经衰落过，但其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它吸收和采用了一些佛教教义与组织形式，取消了一些烦琐复杂的祭神仪式，逐渐适合印度统治阶级的需要。到了公元八世纪时，经过改头换面的婆罗门教在印度重新得势，易名为印度教。佛教在印度则由盛而衰，到十二、三世纪时几乎完全消失了。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佛教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过了几个世纪又先后传入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的傣族地区，这主要是小乘佛教。东汉初年，佛教从印度北方开始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到公元一世纪六十年代，佛教思想已大量传入，大小乘都有，但以大乘为主。这一支于公元四世纪由中国传入朝鲜，公元六世纪时再传入日本。此外，在印度北方兴起的以大乘佛教为基础而注重念咒和魔法的秘教，在公元八世纪时传入中国藏族地区，十三世纪时又传入中国蒙古族地区，形成为喇嘛教。

在中国，佛教还与反动的儒教相结合。例如，佛教宣扬“忠孝节义”，还有什么“百善孝当先”等等；而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宋朝的“理学”，也包含有这类说教。

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

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①

两千多年来，佛教千方百计地适应历代剥削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为套在人民群众身上的一副精神枷锁。它以消极、悲观、厌世的“苦”，掩盖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阶级压迫之苦；以修道达致“涅槃”为号召，诱使被压迫人民放弃阶级斗争，追求那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对广大劳动人民只能起一种麻醉剂作用。

至于佛教售给剥削阶级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那实在太低廉了。那些敲骨吸髓的剥削者，只要将剥削所得的一个零头，用来“行善”（主要是捐赠佛寺），就可成佛。甚至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如果“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佛教的欺骗性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但是，佛教以及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且，终将随着人剥削人制度的消灭而归于消灭。

^① 《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十卷，第62页。

梭伦改革

公元前 594 年的一天，当晨曦(xī 西)刚照进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雅典，兴致勃勃的郊区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就纷纷涌向这座古城的中心广场。原来，新上任的执政官、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梭伦，将要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大会开始了。梭伦健步登上讲坛，举目环顾了一下与会者，然后走到放在讲坛上的一个大木框前，用手一拨，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法律条文便展现在人们面前。梭伦大声宣读了这项主要内容是打击没落的氏族贵族，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的法律，并庄严声明：“这项新制定的法律有效期为一百年！”话音未落，会场上欢呼声四起，回荡在整个雅典城邦的上空。

这项法律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

古希腊的奴隶制国家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个村落和乡镇，形成所谓“城邦”，意即城市国家。城邦的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在只有几万平方公里的希腊半岛上，就分布着二百多个城邦，其中以雅典和斯巴达最著名。

雅典城邦位于阿提卡半岛上，开始形成于公元前八世纪，

到公元前六世纪初，奴隶制度已经确立，但氏族制度的残余还严重存在。氏族贵族凭借血缘门第，飞扬跋扈。贵族会议是城邦的统治机构，其成员全由氏族贵族充任，终身任职。贵族会议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执政官是城邦的首脑，最初为三名，后增至九名，分别主持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日常事务。执政官都从氏族贵族中选举，原先是终身任职，后改为十年一任，最后改为一年一任。执政官卸任后即进入贵族会议。先前曾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会议，随着贵族会议权力的日益增长，已形同虚设，不起什么作用了。

氏族贵族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权，残酷剥削广大的下层平民——小农和手工业者，以及奴隶。大批小农为生活所迫，只得向贵族借债度日，而以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作为抵押，因而在阿提卡半岛上到处插满了抵押柱，上面写明这块地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偿清债务，就得将土地折价卖给贵族，然后以佃户的身份租种原地，向贵族交纳地租，其数额高达收获量的六分之五，自己只留六分之一，因此这种佃户又叫“六一农”。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还不够还债，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甚至债务人自己卖身为奴，成为所谓债务奴隶。这样，下层平民与氏族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七世纪末至前六世纪初，阿提卡的下层平民到处在酝酿武装起义。

氏族贵族的专权，还引起平民的上层——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不满。阿提卡半岛出产白银、大理石和优质陶土等，又具备优良的港口，因此自公元前七世纪起，雅典的工商业便发

展起来。雅典的制陶业最负盛名，所产陶器外形美观，图案花纹丰富多采，远销埃及和意大利。酿酒业和榨油业次之。当时地中海区域还不知道饮用咖啡、可可和茶，所以葡萄酒兼有茶和酒两种饮料的用途。橄榄油用于烹饪(pēng rèn 抨认)和点灯照明，也是制作化妆品的主要原料。由于酿酒业和榨油业更有利可图，阿提卡的许多土地所有者就将农田改种葡萄和橄榄，因而就影响到本来就不充裕的粮食供应，城市人口的用粮便有相当部分依靠外地输入。雅典的海外贸易也随着发展起来了。每天，一艘艘满载酒类和陶器等产品的船只驶离雅典，扬帆远航，一艘艘满载粮食的船只驶抵雅典。雅典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一个商旅辐辏(fú còu 伏凑)的贸易中心。从事工商业的奴隶主，有些是从小生产者中间分化出来的，有些是从没落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虽然也通过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小农和手工业者，但主要是使用和剥削从雅典以外通过拐卖而得来的外族奴隶。

工商业奴隶主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但由于他们大多数出身卑微，因此政治上受到氏族贵族的歧视，享受不到什么政治权利，更不可以染指城邦政权。在经济上，由于氏族贵族残酷剥削本族下层平民，雅典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萎缩，国内市场日益狭小，从而影响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工商业奴隶主迫切要求取消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铲除氏族制度的残余，参与掌握城邦的政权，以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

在这个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中，工商业奴隶主需要取得下层平民的支持；而下层平民苦于氏族贵族的暴虐，也愿意和工商业奴隶主一道去反对氏族贵族。梭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走上历史舞台，领导了一场斗争锋芒直指氏族贵族的“政治革命”^①，通常称为梭伦改革。

梭伦(约前 638—前 558 年)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曾经从事工商业，到过小亚细亚等地。在广泛接触社会中，他学习到许多东西，政治上逐渐倾向于工商业奴隶主。他不满氏族贵族的专横，曾作了许多诗篇加以揭露与抨击。为了维护雅典的利益，梭伦遇事挺身而出。有一次，雅典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萨拉米斯岛被一个叫麦加拉的城邦夺去了，昏庸无能的氏族贵族置之不顾，梭伦亲自率领一支义勇军，前去与麦加拉占领军作战，大获全胜。这件事进一步提高了梭伦在工商业奴隶主和下层平民中的威望，氏族贵族更加不得人心。公元前 594 年，在下层平民的强大压力下，氏族贵族被迫同意由梭伦担任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授予他改革法律的权力。

梭伦担任了首席执政官后，利用掌握到手的最高权力，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向氏族贵族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

在政治上，梭伦按财产多寡划分公民为四个等级，每个公民依其等级高低而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收入一般是以粮食来计算(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凡收入五百墨狄那粮食的，列为第一等级，称五百单位者；收入三百墨狄那的，列入第二等级，称骑士；收入二百墨狄那的，列为第三等级，称兵士；其余财产不多或没有财产的公民(不包括奴隶)，一律列为第四等级，称为雇工。第一、二等级的公民有资格担任最高官职——执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 年版第 110 页。

四等级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梭伦为了限制和削弱贵族会议的权力，又恢复公民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会议决定城邦大事，选举执政官。此外，又成立两个新机构：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第一、二、三等级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主要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大会的重要决议。公民陪审法庭从贵族会议手中分得重要的司法权力，成为全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每个公民都可当选为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

这样，氏族贵族的显赫门第和世袭特权，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之城邦统治机构中的垄断地位，而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则凭借手中的私有财产，跻(jī 基)身于城邦政权。恩格斯在论述梭伦改革时写道：“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①

梭伦还采取措施削弱氏族贵族的经济势力。他规定永远禁止把欠债的小农和他们的子女卖为奴隶。小农因欠债沦为奴隶的一律释放，债契全部废除，抵押掉的土地重新归还原主。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重返家园。但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原为雅典公民的债务奴隶，因战争被俘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12页。

或被拐卖来的外族奴隶，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梭伦还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对氏族贵族刮起的土地兼并之风也是一个打击。

梭伦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策措施。如改革币制和统一度量衡；提倡每个雅典人学会一种手工艺技术；奖励外邦手艺人移居雅典；鼓励葡萄酒和橄榄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降低粮价等。此外，梭伦还对贵族的丧葬排场和费用加以限制，并规定没有子嗣的人死时可以用遗嘱自由处理其财产，不必象以前那样只准遗留给本氏族的人。

梭伦改革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搅乱了氏族贵族的酣梦，剥夺了他们享有的种种世袭特权。但是，不甘失败的氏族贵族必然要以各种形式进行猖狂的反扑，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梭伦制定的法律在城邦的中心广场上一公布，广大小农、手工业者和工商业奴隶主就表示热烈支持和拥护。而氏族贵族却恨得要命，立即四出活动，借助传统势力，煽动一些人起来闹事，围攻梭伦，反对改革，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反动气焰一时甚嚣尘上。但是，一小撮顽固的氏族贵族成不了多大气候，优势不在他们方面。在这之后，又经过近一百年的曲折反复的斗争，到了公元前509年，另一个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克利斯提尼，实行了一次新的改革，最终打垮了氏族贵族的反动势力，在雅典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

梭伦改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后，雅典农村中的高利贷及土地兼并之风受到一定限制，奴隶制经济得到迅速的

发展。遍布阿提卡的果园，为酿酒业和榨油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手工作坊的规模扩大了，有的使用奴隶多达百余人，手工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一些精巧手工艺如制陶、金属制品等都有了专门的行业。同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初步建立，又促进了文学艺术及自然科学的发展。

应当指出，梭伦改革和他开创的民主政治，在促进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所谓民主政治，也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对于下层平民来说，境遇虽有所改善，但十分有限，仍不免于受到生活的煎熬。尤其应当指出，雅典经济、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建筑在奴役外族奴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切与梭伦改革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的阶级本质是分不开的。

伊索寓言

一提起《农夫和蛇》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故事。毛主席告诫革命人民必须记住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①，坚决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农夫和蛇》的故事就是《伊索寓言》中的一篇。

《伊索寓言》(以下简称《寓言》)，由古希腊一位奴隶出身的寓言作家伊索(约前620—前560年)而得名。伊索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那时，在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的岛屿上，贵族、奴隶主的皮鞭到处呼呼作响，奴隶和下层平民的血泪汇成河。平民和贵族、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如爱琴海的波涛，急浪翻滚，汹涌澎湃。

奴隶和下层平民对于压迫、剥削的回答，是斗争，而寓言就是他们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在奴隶和下层平民出身的寓

^①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1967年版第1268页。

言作家中，伊索是最著名的一个。

伊索原为萨摩斯岛（靠近小亚细亚）上一个奴隶主的家奴。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他把身上的斑斑伤痕化作满腔怒火，创作了许多寓言，用以团结、教育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一起向贵族、奴隶主勇猛冲杀。

《寓言》中的大多数篇目，通过塑造人格化的动物来揭露贵族、奴隶主的虚伪和凶残。大家所熟悉的《狼与小羊》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篇：

一只狼来到河边，看见小羊在河边喝水，顿时想吃了他。但又一想，得先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一下自己。于是，狼责备小羊把河水弄浑了，害得他不能喝水。小羊回答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会把上游的水弄浑了呢？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恶狠狠地说：你去年骂过我的父亲。小羊惊愕（è 饿）万分，连忙分辩说：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狼理屈词穷，终于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对小羊说：“即使你辩解得再好，我也决不放过你。”说着，就张开血盆大口向小羊猛扑过去。狼和小羊的对立，不就是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阶级对立的真实写照吗！贵族、奴隶主的吃人本性被刻划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寓言》还常常把贵族、奴隶主比作狮子、毒蛇、狐狸而给予无情的鞭挞。在《发疯的狮子与鹿》中，作者写道：“在它（狮子）清醒的时候，我们尚且受不了，它疯了之后，什么事做不出来呢？”确实，那些发了疯的狮子，即贵族、奴隶主到处横行霸道，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任意加以处置。虐杀奴隶的手段更是骇人听闻

的，历史记载有鞭打、绞、杀、烧死、剥皮、折断关节骨、往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等。

但酷爱自由的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是任何力量也吓不倒，压不垮的。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鹰与蜥蜴(qiāng lāng 枪狼)》的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鹰是一种很凶猛的飞禽，而蜥蜴只是一种小虫。一次，兔子被鹰追逐，正在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了蜥蜴，便向他求救。蜥蜴鼓励兔子不要怕，并冲上前去同鹰说理。可是，鹰还是蛮横地把兔子吃掉了。蜥蜴由此得出结论：同鹰是无理可讲的，必须与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他就经常守候在鹰巢下面，只要鹰一生蛋，他就飞上去，把鹰蛋推滚下来，将它打碎。鹰到处躲避不成，最后飞到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宙斯(鹰被说成是宙斯的“圣鸟”)那里，请求宙斯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繁殖后代。宙斯便叫鹰在自己的膝上生蛋，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但是，蜥蜴根本无视宙斯的“权威”。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带了一个粪团，飞上天去，将粪团抛在宙斯的膝上。宙斯掩面捂鼻，慌忙站起来，膝上的鹰蛋也随之落地，打得粉碎。

小小的蜥蜴敢于向鹰这样的强者挑战，敢于蔑视宙斯这个所谓天上人间的“最高权威”，不屈不挠，坚持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反映了古希腊的奴隶和下层平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奴隶和下层平民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怠工、逃亡、击杀个别贵族、奴隶主，直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13年，单雅典就有两万多奴隶逃亡。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发生了许多次奴隶武装起义，其中

以斯巴达城邦的国有奴隶——希洛人的起义规模最大，坚持了二十年之久。

《寓言》中有不少篇总结了奴隶和下层平民阶级斗争的经验。除了《农夫和蛇》之外，《农夫的内讧的儿子们》也是脍炙(kuài zhì 快志)人口的一篇。大意是说，某农夫的几个儿子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搞不团结，而且一再规劝无效。一天，农夫把几个儿子叫到跟前，拿出一束棒让他们轮流折，谁也折不断。然后，农夫把一束棒拆开，分给每个儿子一根，叫他们再折。每人轻轻一折，棒都断了。这时，农夫用一束棒折不断，一根棒一折就断这个简单的道理，教导儿子们说：“你们看吧，假如齐心协力，你们就不会被人们所征服，但若是内讧，便要被打倒了。”这一生动的比喻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奴隶们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可以战胜的。

《寓言》作者还告诫人们，要注意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在《三只公牛和狮子》中说，有三只公牛住在一起，狮子想要吃掉他们，可是因为他们心齐，无法下手。狮子便用花言巧语离间这三只公牛的关系。公牛们不知是计，因而上当受骗，各自分开了。这时，狮子趁机将三只公牛一只一只地吃掉了。“不要相信敌人的好话”——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在古希腊，“神明”是贵族、奴隶主套在奴隶和下层平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其实，哪里有什么神明！所谓神明，只不过是贵族、奴隶主的化身。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从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勇敢地向神明挑战。《打破神像的人》说到，有个平民，家里很穷，他一再祈求神像赐以恩惠。可是，愈顶

礼膜拜，却愈穷困。后来，他生气了，一把抓住神像的腿，往墙上扔过去。结果，神像的头被砸得稀巴烂，还从里面掉出些钱来。这个喜出望外的平民对砸烂了的神像说：我向你祈祷，你不理睬，看来，就是要砸烂你。故事尽管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但却公开鼓励人们打破对神明的迷信。

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寓言》中也有所反映。《初次看见的骆驼》谈到，人初次看见骆驼，因其十分高大而惊骇，都远远走开了。后来，逐渐发现骆驼没有什么脾气，于是敢于上前接近它了。再后，由于接触得更多了，认识到骆驼是一种很驯顺的动物，这时不但大人敢于接近它，而且还给它套上轡(pèi 配)头，让孩子们牵去走动一下了。这个简单的故事，揭示了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卜人》一篇，则辛辣地嘲讽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内容是说，有一个卜人（即算命的人），坐在市场里骗取钱财。忽然有人前来告诉他，他家的门被人撬开，屋里的东西全都被搬走了。卜人大为震惊，赶忙跑回家去看个究竟。过后，人们讥讽地问他：“喂！朋友，你宣称能预知别人的事，却怎么没有预卜出自己的事呢？”这有力的责问，正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无情批判。

总之，《寓言》以它那犀(xī 西)利的笔锋，生动的形象，深刻的寓意，揭露了贵族、奴隶主的贪婪凶暴，同时歌颂了广大奴隶和下层平民顽强的斗争精神。因此，人民热爱伊索，而奴隶主则对伊索恨之入骨，并加之以“亵渎(xiè dú 谢读)神明”的罪名，密谋杀害他。

大约在公元前 560 年，一天，伊索被奴隶主押到爱琴海边一块高耸的岩石上。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伊索昂然挺立，坚

强不屈。最后，刽子手把伊索推下了山岩……奴隶主杀害了伊索，但永远扑灭不了伊索创作的寓言在千千万万奴隶和下层平民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种。

历史，象大江的波涛一样，永远奔腾向前。那些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个地被历史的巨浪席卷而去。而伊索，作为奴隶阶级的一名战士，却永远留在史册上，铭记在人民心里。

当伊索在世的时候，《寓言》便在古希腊的奴隶和下层平民中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能够成书。因此，我们今天读到的《寓言》，是由后人整理编纂而成的。其大致情形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即伊索死后二、三百年，一个希腊人把二百多个寓言故事汇集成册，题为《伊索故事集成》（今已散失）。公元一世纪初，一个获释的希腊奴隶，大体取材于上书，用拉丁韵文写了寓言一百余篇。同时，另有一人用希腊韵文写了寓言一百二十二篇。公元四世纪时，一个罗马人又用拉丁韵文写寓言，得四十二篇。以上三种韵文本，都保存下来了。后来，有人把韵文改写成散文，并把许多印度、阿拉伯和基督教的故事加了进去。经过这样多次的汇集、编纂、改写，就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寓言》，共包括近三百六十篇。

正由于《寓言》的成书有一段曲折的过程，因此，成书后有不少篇已经和原作相去甚远，有的甚至还不是伊索以及与伊索同时代人的作品。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寓言》的整理、编纂过程中，剥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故意篡改原作的革命内容，塞进了不少私货，致使有些篇目蒙上了宿命论的阴影，甚

至有诬蔑奴隶的话语。

尽管如此，《伊索寓言》毕竟保留了若干富有战斗性的篇章，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受到很大的启示。《寓言》本身还雄辩地说明了，奴隶们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化。奴隶，只有奴隶，才是古代世界历史的主人。

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斯巴达

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大致有两种类型，分别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雅典城邦的形成，纯粹是氏族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并通过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最终打垮了氏族贵族的旧势力，清除了氏族制度的残迹，建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奴隶制的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

斯巴达则与雅典不同。斯巴达城邦是在武力征服异族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长期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迹，一小撮氏族贵族（亦即贵族奴隶主）垄断了城邦的政权，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奴隶制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

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欧洛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于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公元前二千年代，有一批名叫亚该亚人的希腊部落就生息在这里，并且建立了城市，著名的有斯巴达等，逐渐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另一批名叫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由希腊北部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多利亚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入侵拉哥尼亚的多利亚人，分作三个部落，约于公元前十至九世纪，在已被毁的斯巴达旧城附近，联合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

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这部分多利亚人，就叫做斯巴达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居民大部分变为国有奴隶，称作希洛人，少部分驱逐到边远地区，同原住边远地区的居民合称为皮里阿西人。皮里阿西人有人身自由，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承担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但无公民权，也不得与斯巴达人通婚。

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斯巴达又向西邻美塞尼亚发动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最后，斯巴达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被征服者变为希洛人。同时，斯巴达人内部也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了贵族和平民。

公元前七世纪，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斯巴达城邦完全形成了。

斯巴达城邦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两个，权力均等。平时，国王的职责是主持祭祀，审理家族纠纷，权力有限；战时，一个国王充任统帅，率军出征，权力较大，一个国王留守国内。

长老会议是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有三十人，除去两个国王外，其余二十八人都是年逾六十的氏族贵族，任期终身。如有缺额，仍从年逾六十的氏族贵族中补选。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才有效。

公民大会，每月开一次，由国王主持，凡年满三十岁的斯巴达公民都有权参加。但是，公民在会上不能就长老会议提出的建议展开讨论，只能简单地表示同意或反对。表决的方

式不是举手或投票，而是以与会者的呼喊声的高低来决定，呼喊声高，即表示通过，否则就是不通过。长老和监察官也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选举方式同样以呼喊声的高低来判断。这种表决和选举方式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一个乱哄哄的会场上，很难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呼声的高低，实际上是氏族贵族操纵一切。从公元前七世纪后半叶起，随着监察官权力的不断扩大，公民大会改由监察官主持。

监察官，一共有五人，一年一选，全由氏族贵族充任。监察官的职责是监督国王的言行，审理国王违法行为，监察公民生活。公元前五世纪以后，监察官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由此可见，斯巴达公民虽然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无实际内容，一小撮氏族贵族垄断了城邦的政权。

斯巴达的土地和奴隶都为国有。土地被划分为数千份，公民每户得一份，可以父子相承，但不能买卖、转让或分割。份地由希洛人耕种，斯巴达人攫取收获物的一半。平均四、五户希洛人供养一户斯巴达人。少数氏族贵族拥有除份地以外的许多土地，以及其他财富。不过，由于禁止土地买卖，限制了私有制的发展。

为了遏制斯巴达人内部的阶级分化，以利于共同奴役希洛人，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作货币，而是用价值低的铁币。这种铁币不便贮藏，数目稍为大一点，就得用车装。斯巴达的工商业经济十分落后，因此没有出现一个象雅典那样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斯巴达除了向希洛人强征他们收获物的一半以外，还强迫希洛人到军队中服役，主要从事运输、修筑工事等苦役，有

时也充当步兵及海军舰船上的水手。由于斯巴达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是十分沉重的。例如，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一次就征发了三万五千希洛人随军出征。

希洛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把希洛人灌醉，然后拖到公共场所肆意加以侮辱。希洛人即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答一次，说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还实行一种屠杀希洛人的制度，名叫“克里普提”，意思是秘密勤务。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说：“长官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一次就秘密屠杀了二千名希洛人。

斯巴达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在斯巴达人内部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整个斯巴达如同一座军营。

当一个斯巴达人的婴儿呱呱坠地之后，先得过二道生死关。第一关，由长老给婴儿检查身体，如果强健合格，才准许父母养育；如果畸形或先天不足，则弃之山谷冷坳。第二关，由母亲用烈性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婴儿经不起考验，出现昏厥，则任其死去。幼儿在未满七岁之前，由母亲抚养。为了使幼儿长大后能成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勇敢战士，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不爱哭，不挑食，不怕黑暗，不怕孤独的习惯。

男孩一满七岁，便离开家庭，编入儿童队，开始过集体生

活。在儿童队里，他们受到严格的体育和军事方面的训练，如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在每一个儿童队里，都有一个所谓最勇敢的儿童被任命为队长，全队的儿童都必须服从他，有时还要受他的责罚。儿童队的教官由二十岁以上的公民担任。为了训练儿童的服从性和忍耐性，还对儿童实行一种鞭答制度。依照这种制度，每个儿童每年要被鞭答一次。一般是在某一个节日，儿童们跪在神殿之前，火辣辣的皮鞭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但不许喊叫，不许求饶。

男孩到了十二岁，升入高一级组织——少年队。从儿童队转入少年队要进行一次测验。那一天，国王、长老、监察官以及一般斯巴达公民都出席观看。测验项目之一是搏斗：儿童们分成两个小队，赤手空拳，身上也没有任何防护物。教官一声令下，双方就拳打脚踢、嘴咬、动手挖眼睛，一对对打成一团。每个队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健、狡诈和残忍，无所不用其极。编入少年队后，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也很少。斯巴达统治者还纵容少年队员去偷窃，以训练他们的所谓敏捷与机智。

斯巴达在对青少年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训练过程中，大肆向他们灌输反动思想。斯巴达的统治者说，斯巴达人是高贵的，应该统治希洛人，希洛人是低贱的，应该受斯巴达人统治。有些教官还经常当着青少年的面，任意侮辱和鞭答希洛人，甚至让青年参与对希洛人实行“克里普提”，直接屠杀希洛人。

从二十岁起，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三十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操练。六十岁退伍，列为预备役。

斯巴达的女孩在七岁以后，仍然住在家里。她们不是整

天关在家里纺织和做其他家务劳动,而是也从事体育锻炼,学习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唯有刚强的母亲才能生育刚强的战士。在斯巴达,做母亲的并不怕看到儿子在战争中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去打仗,不是祝福他平安,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就是说,或者拿着盾牌胜利归来,或者光荣战死而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轻视文化教育,只要求青少年识一些字,会写命令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平时说话不多,而且十分简短,以致失去连续性,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斯巴达同样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因此,在斯巴达,几乎看不到一座雄伟的建筑物,也制作不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斯巴达对外肆行武力扩张。公元前六世纪末,斯巴达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威胁和战争,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城邦,结成以它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然后,斯巴达以这个同盟为工具,到处扶植贵族势力,压抑奴隶主民主派。这就与另一个有影响的希腊城邦、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雅典发生冲突。从公元前 431 至前 404 年,斯巴达与雅典爆发了一场大战,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雅典战败,斯巴达确立了它在整个希腊的霸权地位,但为时不过三、四十年。

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英勇的希洛人也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抗。约公元前 640 年,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延续了十九年。公元前 464 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以及部分皮里阿西人再次燃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起义军勇敢善战,所向披靡,直

逼斯巴达城下，大有荡平斯巴达城邦之势。斯巴达倾全力实行镇压。后来，起义军退守伊汤姆山，坚持斗争十年之久。最后，斯巴达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被迫同意起义军携带眷属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获得自由。声势浩大的希洛人起义，沉重打击了斯巴达的反动统治。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衰落下去了。

马 拉 松 战 役

公元前 492 至前 449 年，在爱琴海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希波战争。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奴隶制大国波斯侵略，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希波战争是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范例。马拉松战役，是希波战争的重要战役之一。

公元前六世纪初叶以前，波斯人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布在伊朗高原的西南部，政治上处于强邻米堤王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 553 年，出身于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居鲁士（约前 558—前 529 年），率领波斯人反抗米堤的统治。公元前 550 年进而灭米堤，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不久，居鲁士统一了伊朗高原，并大举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南部。居鲁士死于远征中亚细亚途中。其子冈比西（前 529—前 522 年）又征服了埃及。至此，波斯的版图东临阿姆河流域，西濒爱琴海，北界高加索山，南接阿拉伯半岛，成为一个地跨亚、非两洲的奴隶制大帝国。

大流士一世（前 521—前 485 年）在位时期，实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改革的内容有：建立常备军，强化帝国的军事力量；将帝国划分为二十多个行省，委派总督及军事长官治理，直接向国王负责；修筑驿道，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改革币

制,确定由国家统一铸造金币“大流克”,向全国发行。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帝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野心勃勃的大流士继续对外扩张。

公元前 512 年,大流士侵占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一带,控制了黑海的咽喉赫勒斯滂海峡(今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妄图吞并整个希腊,从而严重威胁到希腊的独立和自由。

在希腊,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城邦,重要的有希腊半岛上的雅典、斯巴达,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等。许多希腊城邦,如雅典,工商业发达,但粮食不能自给,因此往往用自己生产的手工业品,到黑海沿岸一带换取那里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自从波斯控制了小亚细亚和赫勒斯滂海峡之后,非但希腊通往黑海的商路被截断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遏制,而且整个希腊面临着被波斯铁蹄践踏的危险。

公元前 500 年,米利都人因忍受不了波斯的压迫,发动起义。雅典立即派出二十五艘战舰前往支援,小亚细亚西岸一带的其它希腊城邦也纷纷响应。大流士慌忙调遣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不幸失败。波斯军队大肆烧杀,昔日繁华的米利都城遭到严重破坏。

公元前 492 年,大流士以“惩罚雅典援助米利都人”为借口,对希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年春天,波斯侵略军分水陆两路向希腊扑来。不料,波斯水军进抵希腊半岛的阿陀斯海角时,突然遭到飓风袭击,三百艘战舰大半沉入海底,两万多士兵葬身鱼腹。陆军在色雷斯一带又遭当地人民坚决抵抗,损失很大,被迫折回。大流士第一次远征希腊以

失败告终。

面对波斯的野蛮侵略，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投降，希腊各城邦内部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被逐的雅典贵族奴隶主希庇阿，投靠波斯，妄图仰仗波斯的势力，重返雅典，建立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而广大雅典人则同仇敌忾，并通过演出《米利都城的陷落》一剧，表示决不允许米利都陷落的历史悲剧在雅典重演，给予希庇阿这个民族败类及其波斯主子，以迎头痛击。

公元前 491 年，大流士倚仗波斯的大国地位，对希腊进行公开的讹诈。他派遣使者去希腊各城邦索取“土和水”，意思是要希腊人无条件投降，将自己祖国的锦绣河山拱手献给波斯。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有些城邦的统治者竟表示屈服，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最有影响的城邦坚决顶住了波斯的压力。斯巴达人把波斯使者拖到井边，指着井说：“井里有土又有水，你自己去取吧。”说完，就把使者推下井去。雅典人则把波斯的使者从悬崖抛进了深渊。消息传到波斯宫廷，大流士暴跳如雷，命令一个仆人，每当他吃饭的时候，必须三呼：“皇帝，请记住雅典人！”侵略气焰十分嚣张。

公元前 490 年，大流士又一次向希腊发动侵略。他派遣大将达提斯率领一支舰队横渡爱琴海。先攻占优卑亚岛上的爱烈特里亚城，然后采纳希庇阿的献策，在雅典郊外的马拉松平原登陆。

处境险恶的雅典，一面紧急动员，加强戒备，一面委派善于长跑的斐力庇第斯日夜兼程去斯巴达请求援助。斐力庇第斯两天之内赶到那里，以恳切的语调对斯巴达人说：“雅典人

请求你们给予帮助，而不要看着希腊的一个最古老的城邦陷于异邦人的奴役之下。”但是斯巴达的统治者推托说“要等待月圆之后(约十天)才能出兵。”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气馁，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击敌人。

雅典军事执政官卡利马科斯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十位雅典将军围绕着是被动防御，还是主动出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争执不下，只好付诸表决，结果又是五票对五票。遇到此种情况，军事执政官的意见举足轻重。竭力主张出击的十将军之一米太亚得，把军事执政官拉到一边，急切地对他说：卡利马科斯，现在，雅典是沦为奴隶，还是继续作为自由城邦而存在，全都在你了……。卡利马科斯最后作出决定，雅典军队开赴马拉松平原，与波斯进行决战。米太亚得被推选为总司令官。

雅典军队有一万，加上邻邦普拉提亚派来的一千援军，总共不过一万一千人。波斯军队据说有十万，而且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米太亚得决定不与敌人硬拚，而是把战线稍稍拉长，精锐步兵布置在两翼，正面战线上的兵力则相对比较薄弱，以争取有利时机发挥两翼的作用，克敌制胜。

公元前 490 年 9 月 12 日清晨，决战前夕，米太亚得对希腊将士们作战斗动员，说：“雅典将是永远保持其自由，还是戴上奴隶的枷锁，关键就在你们身上。”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更加坚定了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战斗打响了。希腊军队首先在正面战线上发起佯攻，气势汹汹的波斯军不知是计，立即实行反攻。希腊军队且战且



马拉松战役

退，波斯队伍越拉越长。正当波斯将领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杀声震天，埋伏在马拉松南北两坡的希腊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枪挺戈，象潮水般地从山坡上猛冲下来。波斯军队猝不及防，乱了阵脚，慌忙向海边撤退，一路上自相践踏，遗尸满地。希腊军队尾追至海边，展开了一场夺取波斯舰船的战斗。有一个名叫基纳尔的希腊战士，在夺船的时候，被敌人砍掉了一只手，他奋不顾身地用另一只手抓住了敌船，终于和战友们一起把这艘船夺了过来。象这样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在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共俘获七艘敌舰。波斯官兵死六千人，而希腊只牺牲了一百九十二名将士，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米太亚得为了迅速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雅典人，又选中了斐力庇第斯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斐力庇第斯接受任务

后，带着满身的血迹，以最快的速度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央广场，对着盼望的人群激动地说了一声：“大家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之后就倒在地上牺牲了。击败波斯侵略军，对于雅典人和全希腊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为了纪念这件事，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规定了一个新的径赛项目——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从马拉松起跑，大体上沿着斐力庇第斯当年经过的路线，到达雅典，全程四十公里二百米。1920年，对马拉松到雅典的那段路程又作了仔细测量，确定为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通用的马拉松长跑的距离。

波斯的残兵败将由马拉松登船之后，并没有远去，而是企图趁虚血洗雅典城。但是，他们又失算了。希腊军队并不因为胜利而放松警惕，马拉松战役一结束，只留下少数人打扫战场，大部队立刻返回雅典城。因此，当波斯舰队偷偷摸摸驶抵雅典附近海面时，雅典军民早已严阵以待，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这一图谋。

马拉松战役后，希腊各城邦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御敌的决心，雅典、斯巴达等三十多个城邦组成了反波斯同盟。雅典还积极扩充海军，建造了一百多艘战舰。整个希腊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时刻防备波斯侵略军卷土重来。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大流士一世之子）亲率号称百万水陆大军和千余艘战舰，入侵希腊。陆上，波斯军队越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后，占领了希腊中部的德摩比利隘口，南下攻入雅典城。不过，雅典军队和大部分居民，在此之前已主动转移到萨拉米岛上。波斯水军横渡爱琴海，直抵雅典海

域。

接着，双方海军在狭窄的萨拉米海湾展开激战。雅典人借助有利的地形，以灵活轻快的小船攻击波斯的笨重大舰，取得巨大胜利。据说，在山顶上观战的薛西斯，见此情景不禁失声大哭，为了不致全军覆没，慌忙下令退兵。萨拉米海战成为希腊人转守为攻的起点。

公元前 449 年，希腊彻底战胜波斯，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十三年希波战争。雅典与波斯签订和约，其主要内容是：波斯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放弃它在爱琴海上的霸权。希腊的胜利，不仅使它免于被波斯奴役的命运，并且促进了希腊奴隶制经济文化的繁荣。

希罗多德及其《历史》

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雅典，在著名的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家伯里克利当政时期（前 443—前 429 年），进一步打击贵族奴隶主的势力，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因而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马克思曾经指出，伯里克利时期是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

当时，文化的昌盛表现于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及自然科学等各方面。就史学而论，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颇负盛名。

希罗多德约于公元前 484 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滨一个名叫哈利卡纳索斯的希腊城邦。不过，在他出世前的几十年，即公元前 550 年左右，波斯国王居鲁士吞并了整个小亚细亚，其中包括濒临爱琴海的各希腊城邦。因此，希罗多德又是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臣民。论出身，希罗多德之家是哈利卡纳索斯的名门望族，其叔父（一说是堂兄）还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希罗多德从小受到良好的奴隶制教育，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史诗。

后来，希罗多德家族因反对波斯的附庸、哈利卡纳索斯的统治者而遭到迫害，希罗多德的叔父被杀，他本人被迫移居爱琴海上的萨摩斯岛。约公元前 455 至前 447 年，希罗多德不

辞艰辛，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作了一次范围广泛的旅游——北至黑海北岸，南迄埃及，东达两河流域下游，西抵意大利。每到一地，希罗多德总是通过向导和译员，认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凭吊名胜古迹，探询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考察地理环境，并作了记载，这为他写作《历史》准备了丰富的素材。

约公元前 445 年，希罗多德来到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结识了伯里克利和著名悲剧家索福克里等人，积极参与雅典的文化政治活动。希罗多德的诗作，在雅典还得过奖。希罗多德崇拜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希波战争中打败奴隶制大国波斯的侵略，十分钦佩，并搜集了许多有关史料。公元前 443 年春，雅典人在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湾沿岸，建立了图里翁城邦，希罗多德跟随雅典移民到了那里，成了这个城邦的公民。在图里翁，希罗多德将主要精力用来写作《历史》，但没有完稿，便于公元前 425 年离开了人间。

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希腊史学史上是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在他之前，约公元前九世纪，传说有一个名叫荷马的诗人，曾将流行于民间的神话、故事、诗歌汇集起来，后人称之为《荷马史诗》。这部史诗保存了公元前十一至前九世纪希腊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许多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毕竟属于文学作品，不尽翔实。至公元前六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记述神话传说、家族系谱和风土人情的散文，以说故事的方式口头流传于民间。希罗多德正是吸取了希腊史诗和散文的优长之处，在对历史

事件作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写成《历史》这部史学名著的。

《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分为九卷，按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叙述了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希腊城邦及波斯帝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等，以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后半部主要是记叙希波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从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举行反对波斯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尔战役。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前半部引用了大量民间传说及轶闻趣事，离题话较多，后半部叙述比较集中和求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后人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希罗多德在赴雅典之前，已经完成了书的上半部分，在赴雅典之后，大概受到伯里克利的鼓励，方才决定写一部系统的希波战争史。《历史》取材丰富，其中吸收了希罗多德那个时代关于史诗、哲学、人种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证了大量官府档案文献、碑铭，尤其是目击者的口述。《历史》也可以说是当时西亚、北非和希腊的一部通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希罗多德在西方被誉为“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重视实地考察，广泛接触社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对某些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分析，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关于希波战争的性质，他谴责波斯远征希腊，说波斯“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土地，不应当再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它的人们。”认为波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军队成份太复杂，又加外线作战的困难；雅典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实行民主政治，每个人都“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又例如，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往往将非希腊人统称为蛮族，

鄙薄轻视。希罗多德则有所不同，他虽然推崇希腊，尤其推崇雅典，但又比较重视古代东方的文明及其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guǐ 轨)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再例如，他认为精神病不是由神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经常遇到许多痛苦后，在烦恼当中产生的”；梦不是神托的，而是“白天我们心里想的东西”；神不能平息暴风，而是“暴风自己停下来的”。希罗多德能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可贵的。

《历史》且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希罗多德吸取了史诗的创作方法，为书中的人物写了许多娓娓动听的演说词，使得这些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书中另有些段落近似散文，文笔练达流畅，叙事引人入胜。一位评论者写道：“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长，无论如何总会使听者生厌的，但是，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想模仿荷马，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采”。可以说，希罗多德在欧洲开创了一种真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历史叙述体。

当然，希罗多德作为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一名历史学家，其史学观点，必定摆脱不了剥削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希罗多德声称：“我的责任是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但相信它却是另一桩事”。言下之意，他所采取的是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态度。其实，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不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希罗多德当然不例外。在《历史》一书中，古代世界的主人——奴

隶，及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不屑一提；少数帝王将相，如波斯国王居鲁士，大流士等，则被描绘成历史的主宰。

希罗多德的史学观点，许多地方还带有浓厚的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他认为世事变幻无常，没有规律可循，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富强，要受神和命运的摆布。他写了大量关于波斯国王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的故事，反复强调人的命运早已由神安排好了，个人只能听天由命。关于薛西斯出征希腊，他不去揭露波斯奴隶主统治集团的侵略本质，而说成是由于神的授意。他还说什么“当城邦或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总的说来，希罗多德的史学观点尽管是唯心主义的，并且在其著作中夹杂了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但是，他毕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有些已为近代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柏拉图及其《理想国》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是古希腊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理想国》是他的一本有代表性的反动著作。两千多年以来，许多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无不乞灵于柏拉图和他在《理想国》中宣扬的反动思想。柏拉图及其《理想国》为什么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柏拉图出身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个大贵族之家。在他出生的前几年，即公元前 431 年，古希腊的另一城邦斯巴达，为了与雅典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挑起了一场大战，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也是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政治之间的一场大决战。希腊境内的各个奴隶制城邦，有的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以雅典为代表；有的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以斯巴达为代表。从历史上来看，前者较后者进步。因为，在奴隶主民主政治之下，广大自由民（当然不包括奴隶）都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因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在贵族寡头政治之下，政权操纵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奴隶主的手中，非但奴隶，即使广大的下层自由民也被剥夺了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因而有碍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另外，在那些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城邦里，也存在奴隶主贵族派与奴隶主民主派的斗争，而且斗争十分激烈，常常出

现曲折和反复。

伯罗奔尼撒战争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年，至公元前 404 年，以斯巴达的胜利、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斯巴达到处扶植贵族势力，把反动落后的贵族寡头政治强加在许多希腊城邦头上。在雅典，他们唆使以克里底亚为头子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小集团，发动政变，建立了贵族寡头政治。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年），都是属于这个小集团的人。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一个主要代表，公开宣扬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有目的地安排的。他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极端仇视民主政治。柏拉图二十岁开始跟苏格拉底求学，并且成了他的忠实门徒。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前后，他们和克里底亚等人勾结在一起，在雅典上窜下跳，呼风唤雨，喧嚣一时。

贵族寡头政治在雅典不得人心，不久即被民主派推翻。苏格拉底因其猖狂反对民主政治而受审，并被判处死刑。这对柏拉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吓得魂飞魄散，如丧家之犬急匆匆逃离了雅典。

此后约十年的时间里，柏拉图去过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到处贩卖他的反动政治主张，恶毒诽谤民主政治。公元前 388 年，柏拉图到了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名叫叙拉古的希腊殖民城邦，以讲学为名，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他把民主政治视作大逆不道，说什么在民主政治下自由太多了，以致出现了以下种种现象，如父子平等，老师害怕学生，男女同享自由，奴隶与奴隶主讲平等，甚至连马也拥有自由民的一切权利和尊严，昂首行进，冲撞不肯为它让路的人，等等。这完全是一派胡

言。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奴隶主民主政治始终是奴隶主的民主，根本谈不上会有奴隶的民主。柏拉图的反动说教在叙拉古找不到市场，反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唾弃，最后被赶了出去，甚至差点儿被卖作奴隶。柏拉图在走投无路之中，只得悄悄回到雅典。

这时，柏拉图已年过四十，一想起自己的境遇，就悲伤不止，只怨天下没有知己者。但他仍贼心不死，回到雅典以后，在雅典的中心地区开办了一所“学园”，办起教育来了。他广收门徒，培养奴隶主贵族的接班人。他还舞文弄墨，著书立说，臭名昭著的《理想国》就是在这前后出笼的。

柏拉图留下了很多反动著作，主要有：《美诺篇》、《斐多篇》、《理想国》、《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法篇》等等，其中《理想国》是他的一部代表作，是他反动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以对话体的形式，借苏格拉底之口，宣扬一整套反动的国家观。他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竭力鼓吹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并妄图使之固定化和永恒化。马克思一语揭穿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反动实质，指出它“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①。柏拉图认为，国家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就是缩小了的国家。个人有三种品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国家也有具备不同品德的三等人：第一等人是统治者，即少数奴隶主贵族，他们生来具有“智慧”的品德，应当支配一切；第二等人是武士，他们生来具有“勇敢”的品德，是统治者的爪牙，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指挥；第三等人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05—406页。

是农民和手艺人，他们生来具有“节制欲望”的品德，专门为前两种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至于广大的奴隶，在柏拉图眼里根本不能算作人，因此连列为一个等级的资格都没有。

为了替这种森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制造根据，柏拉图还抬出神来愚弄人民。在《理想国》里，他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公民们说：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是神还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的。你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做这些人的时候，神用的是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一般说来，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照他这样说来，人生来属于哪个等级，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广大的下层自由民（更不用说奴隶了），只能俯首听命，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起来造反。

从这种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出发，柏拉图再三强调，在他的“理想国”里，各个等级都要听从神的意志，“互不干扰”，“互不代替”，“协调一致”，这样就实现了所谓“正义”。相反，如果三个等级的人相互代替和干扰，“这是最坏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叫做不正义”。下层自由民不能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尤其不能掌握国家的政权。他声嘶力竭地叫嚷：“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就要倾覆”。他还得意洋洋地把他勾画的所谓有节制的国家比做一支和谐的交响曲。可见，万变不离其宗，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无非就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秩序而已。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谁能充当统治者呢？他认为，

一定要由哲学家做国王。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照他说的办，“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呢？这就要剖析一下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天才论。

柏拉图认为，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模糊的映象。这就是柏拉图所鼓吹的反动的“理念论”。

既然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当然也是不真实的。那末，人的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胡说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可以不断地投生。当灵魂进入肉体之前，它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面的，在那里，它可以直观理念世界，因而就获得了理念知识，即真正的知识。可是，当灵魂一旦托附肉体下降到尘世时，理念知识暂时被遗忘了。之后，在经验的刺激下，那些被遗忘了的理念知识又逐渐被回忆起来。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而且，柏拉图还杜撰说，这种回忆知识的本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的，只有少数有天赋才能的人，如哲学家之类才具备。由此，柏拉图便得出了一个最后的答案，即世界“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可见，柏拉图的这种头足倒置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天才论，完全是为他那条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柏拉图为了要实现他那建立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理想，觉得还必须想方设法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为此，他主张在第一、第二等级中间取消私有财产，实行所谓“共产

制”。他认为，如果统治阶级没有私有财产，这个阶级中的所有的人就会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对广大奴隶以及下层自由民的压迫和剥削。反之，如果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私有财产，那就会助长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从而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以致造成“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覆灭”的恶果。很明显，柏拉图实质上是想用统治阶级的集体剥削来代替个人剥削，并以此来维持统治阶级的“一致”。可是，他根本不了解私有制就是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他的这种建立在奴隶制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共产制”，只是一种反动的空想，更谈不上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

为了使奴隶主贵族的反动事业不致于中断，柏拉图还十分注重为本阶级培养接班人。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教育所决定的，“一个人开始所受的教育的方向，将决定他未来的生活。”因此，要牢牢把持着教育这块阵地。在他的“理想国”里，儿童所使用的教材都要符合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甚至文学作品也不能例外。能够享受教育权利的，当然只是那些天性适宜于担任统治者和武士的儿童，而出身于下层自由民家庭的儿童，则完全被排斥于学校的大门之外。至于奴隶的子女，由于他们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因此根本谈不上受教育了。

柏拉图以因果报应作为《理想国》一书的结尾。他胡说什么人死后要受审，正义者可以升天，不正义者则要入地狱受苦千年。他还对阴森可怖的地狱作了一番描绘。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柏拉图真是费尽了心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设计的奴隶主贵族政治的方案，在具有民主政治传统的雅典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柏拉图本人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又不甘心就此作罢，而非要搞出点名堂来不可。当他六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两度打起精神，浮海去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死皮赖脸地兜售他那套破烂货，妄图在那里得以一逞。但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还险些断送了老命。

两千多年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宣扬的这一套反动腐朽的国家观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天才论，由中外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承袭下来，作为他们向革命人民作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布 匿 战 争

——罗马同迦太基争霸地中海

世界上最大的内海——地中海，是一个四周为欧、亚、非三大洲环抱的水域，碧波蓝天，风景秀丽。但是，自古以来，地中海并不平静，一直是大国角逐的场所。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古罗马和迦太基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长达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①。因为迦太基曾经是腓尼基^②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布匿战争”。

公元前三世纪初，罗马继战胜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山地的一些部落以后，又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各个希腊城邦，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从一个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一跃而为西部地中海的奴隶制强国。可是，罗马奴隶主对土地、奴隶和商业利益的贪欲永无止境，强烈要求继续向海外扩张，力图把整个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湖”。

然而，罗马要取得地中海的霸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西部地中海，迦太基是其劲敌。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东北部

① 《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142页。

② 腓尼基是东方古国之一，位于今叙利亚、黎巴嫩沿海一带。

一个海湾内。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它已经统辖了北非沿岸的一部分、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尼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等广大的地区。迦太基本土是地中海上一大商业枢纽，迦太基奴隶主素以经商和航海著称。非洲的奴隶、象牙，西班牙的金、银、铅，巴尔干的锡和手工艺品，埃及的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都集散于迦太基，因此，迦太基人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商业。罗马兴起后，处在扩张势头上的罗马奴隶主和商人一心想取迦太基而代之，确立自己在西部地中海以至整个地中海的霸权。当然，迦太基也决不会坐视罗马将它的触角伸进自己的势力范围，动摇自己在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两强争霸，一场大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罗马的战略意图是，首先渡过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墨西拿海峡，夺取西西里。西西里是地中海上的战略要冲和商业要道，而且农业发达，是个著名的谷仓。西西里对于迦太基的防务和商业都是至关重要的。早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迦太基与罗马曾订有好几个和平友好条约，迦太基以不插手意大利半岛的事务为条件，换取了罗马不涉足西西里的保证。但是，一纸空文哪能束缚住罗马的勃勃野心！公元前264年，罗马借口迦太基人准备进攻意大利，不宣而战，突然把军队开进西西里，占领了墨西拿城。

当时，迦太基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基本上处于守势。它虽然意识到战争迟早总会发生，但没有估计到竟来得如此之快。因此，在罗马的挑战面前，迦太基措手不及，只得暂时撤离墨西拿，并正式向罗马宣战。第一次布匿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战争初期，罗马凭借自己的步兵优势，占领了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沿海的大多数要塞仍掌握在迦太基手中。迦太基不仅拥有装备精良的由步兵、骑兵和战象组成的雇佣军，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地中海舰队，掌握着制海权。罗马当时仅有一些小型船只，海上力量远不能与迦太基相匹敌。为了最终战胜迦太基，罗马大肆扩建海军，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建造了一百艘五层战船和二十艘三层战船。但是，罗马的战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迦太基，尤其是罗马缺乏海上作战经验。为了弥补这一弱点，充分发挥步兵善战的特长，罗马在每艘战船上装置了用滑轮升降的小吊桥。吊桥顶端装有铁钩，叫做“接舷钩”，在海战中，当双方的战船接近时，罗马士兵便放下吊桥，钩住敌舰，然后通过吊桥迅速登上敌舰，与敌军展开短兵相接的厮杀。罗马运用这一战术取得了显著成效，迦太基海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公元前 260 年，在西西里海面，罗马首次大败迦太基海军。接着，公元前 256 年，罗马以三百三十艘战船和四万人组成的一支舰队远征非洲，企图一举消灭迦太基，但未能如愿，反而损失了大半海军。

此后，军事行动继续在西西里展开，双方互有胜负。公元前 241 年，罗马重建的舰队在西西里西海面，再次大败迦太基海军。迦太基元气大伤，无力再战，被迫求和；罗马因民穷财尽，需要喘息时间，也同意媾和。双方订立的和约规定：迦太基撤出西西里以及分布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一切岛屿，并在十年内缴付赔款三千二百塔兰特。

战后，在累累的奴隶白骨上，罗马奴隶制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贪得无厌的罗马奴隶主贵族和崭露头角的商业

金融阶层——骑士，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死死地盯着迦太基及其殖民地。和约签订不久，罗马便违约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科西嘉和撒丁尼亚，后来又以清剿海盗为名，从东北部侵入西班牙。

迦太基当然也不会长期忍受战败的屈辱，而罗马的新的挑衅行动更使它感到如芒在背。因此，迦太基奴隶主时刻准备进行复仇战争。公元前 237 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指挥西西里战事的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率军从南部侵入西班牙，历经九年，夺取了很大一部分地区。公元前 226 年，罗马与迦太基签订条约，以埃布罗河为界，划分两国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萨贡托城位于埃布罗河南岸，根据条约应属迦太基，但罗马却将该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 219 年，哈米尔卡之子、迦太基的新统帅汉尼拔出兵攻占了萨贡托。次年初，罗马向迦太基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

战争开始后，罗马的战略计划是，分兵北非和西班牙，一举灭亡迦太基。然而，汉尼拔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突然出现在意大利本土，给罗马以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经过是这样的：公元前 218 年 4 月，汉尼拔分兵小部留守西班牙，自己率领约九万步兵、一万二千骑兵、三十七头战象越过比利牛斯山，巧渡罗讷河，于 9 月初抵达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地带。阿尔卑斯山山高坡陡，山顶白雪皑皑，气候恶劣。汉尼拔不惜一切代价，用了三十二天时间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当这支部队到达意大利平原时，只剩下二万步兵、六千没有马匹的骑兵和一头战象了。

汉尼拔的远征打乱了罗马的如意算盘。罗马不得不放弃

进攻非洲和西班牙的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意大利。

公元前 217 年春，汉尼拔绕过罗马守军阵地，踏上通往罗马城的大道。罗马执政官费拉米尼率师尾追，中途遭到汉尼拔的伏击，损失惨重，费拉米尼本人也被击毙。消息传来，罗马统治集团坐立不安，急忙加强首都的防卫。可是汉尼拔并不立刻进攻罗马城，而是直下中部和南部意大利，补充给养，整饬(chì 斥)军队，寻求同盟者。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一年，因消耗很大，急于同罗马决战。公元前 216 年春，汉尼拔占领了坎尼城。该城是罗马的一个重要粮仓，罗马执政官瓦罗决心全力予以夺回，为此他投入了八万步兵和六千骑兵。步兵排成七十列，密密地集结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整个队形深度大于宽度，目的是要以步兵的强力冲击来突破对方的阵线。迦太基军队有四万步兵和一万骑兵，仅及罗马兵力的一半。针对瓦罗的战术，汉尼拔把军队排成半月形，凸出的一面向着对方，兵力的配置是步兵在中央，前弱后强，精锐的骑兵在两翼。会战一开始，罗马步兵发起猛攻，迦太基步兵顺势向后退却，半月形遂向相反方向弯曲。结果，罗马步兵由两侧向中间汇合进击，队伍越拉越长，而迦太基步兵则成横队攻击之，使罗马步兵陷于被动。与此同时，迦太基骑兵击溃了罗马骑兵，并截断罗马步兵的退路，形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圈。罗马军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完全丧失抵抗力。战斗结束时，罗马损兵七万，几乎包括所有高级军官，骑兵生还的仅有七十人，而迦太基伤亡仅六千人。

坎尼战役后，罗马一度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的军队

瓦解了。它在意大利的许多同盟者纷纷叛离，转而与迦太基结盟，其中包括地位仅次于罗马城的加普亚城。然而，罗马并不甘心失败，它竭力固守中部意大利，以保障人力和物力的来源，并强征十七岁以上的罗马男公民入伍，重建军队。

此后，罗马避免在意大利本土与迦太基作战，逐渐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西里和西班牙，千方百计切断汉尼拔的兵源和粮食供应。公元前 211 年，罗马攻克西西里的叙拉古城，接着又降服了加普亚城。

随着战争的迁延，汉尼拔孤军深入的弱点暴露出来，兵力和粮食的补给日益困难。继加普亚之后，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又落入罗马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迦太基统治集团内部却勾心斗角，意见纷歧，执政官甚至担心汉尼拔战胜罗马后会夺取迦太基政权，因而对危局坐视不顾。汉尼拔只得向留守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求救。公元前 208 年，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向意大利推进，并写信将进军路线及两军会合地点告知汉尼拔。不料，信被罗马人截获，增援部队全被罗马歼灭。汉尼拔的唯一希望成了泡影。

罗马夺取了西班牙以后，于公元前 205 年移师非洲，转入决定性的进攻。迦太基因本土受到威胁，急忙调回汉尼拔。公元前 202 年，罗马军队在迦太基城以南最后击败了汉尼拔。

公元前 201 年，两国缔结和约，其中规定：迦太基让出一切海外领地；不经罗马同意，不得进行一切对外战争；除留十艘战舰外，其余一概凿毁；赔款一万塔兰特。从此，迦太基一蹶不振，罗马取而代之，成了西部地中海的霸主。

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开始向东部地中海扩张，于公

元前二世纪中叶征服了马其顿、希腊，削弱了叙利亚、埃及等国。

在罗马向东扩张期间，迦太基又渐渐复苏。罗马怕自己的世仇东山再起，便于公元前149年又挑起了对迦太基的战争，即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人虽英勇抵抗，终因粮尽援绝而失败。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攻入迦太基城，大肆掳掠烧杀，熊熊大火燃烧了六昼夜，最后将整个城池夷为平地，幸存的五万居民全被卖为奴隶。

布匿战争后，罗马确立了它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中海沿岸各国，除了埃及和叙利亚而外，几乎都处于它的奴役之下。但同时也在它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根绞索，而且越勒越紧，最后导致罗马奴隶制的衰亡。

格拉古兄弟改革

公元前133年初的一天，古罗马城的中心广场上，风和日丽，人群熙熙攘攘。平民会议开始了，一位年近三十岁的新任的保民官、贵族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正在发表演说：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号召他们为保卫祖坟、宗庙和家园去同敌人战斗，可是要知道，很多罗马人家里是既无祖坟，又无家园了，他们是为别人的奢侈和财富去战斗、去牺牲的。他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可是却穷得没有立锥之地……”

说到这里，广场上顿时喧腾起来了，平民们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困苦和不幸。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让我们从罗马历史上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谈起吧！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当罗马还只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氏族制度开始解体的时候，就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所谓贵族，是指当时氏族中的权贵，又叫氏族贵族。他们利用自己在氏族中的权势，霸占公有土地，剥削普通氏族成员和奴隶。所谓平民，主要是外来移民及被罗马征

服的拉丁地区的居民。平民不同于奴隶，人身是自由的，但不能担任官职，也不可以和贵族通婚。他们可以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而且受到氏族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其中有些人甚至由于负债而沦为贵族的债务奴隶。

约公元前 509 年，罗马成立了共和国后，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中间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平民一步步争得了推举保民官、设立平民会议、与贵族通婚、担任高级官职、废除债务奴隶以及分配少量国有土地等权利。保民官在平民会议上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保民官起初只有两个，后来逐渐增加到十个。他们有权否决元老院和行政长官侵犯平民权益的法令，同时相互之间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但是，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得益最大的，并不是普通平民，而是那些富有的上层平民。比如，早期罗马的官职是没有薪俸的，因此能够担任官职的都是富有者。那些普通平民，整天为衣食奔波，又怎么可能去当官呢？结果是，上层平民冲破了氏族贵族的门第界限，与后者合流，形成了豪门贵族。

普通平民的处境怎样呢？自从废除了债务奴隶以后，他们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公民权得到了保证。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国家那里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小农连年随军出征，家中的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了；同时，由于罗马征服者将数以万计的战俘卖为奴隶，廉价奴隶源源而来，大规模使用

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贵族兼并去了。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将这一愿望以标语的形式写在许多墓碑、神庙以及其它建筑物的墙壁上。

同时，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的破产，他们无力再去当兵，因而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力量，危及到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鉴于这种情势，以格拉古兄弟为代表的罗马奴隶主贵族改革派认为，在不违背奴隶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必须限制一下土地的过分集中，并将贵族非法占用的国有土地收回一部分，分配给无地的平民耕种，使小农得以复兴。这样，既可以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又可以适当解决兵源枯竭问题。于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格拉古兄弟毅然发动了一场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格拉古兄弟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之家，他们的父亲曾任罗马的高级官职。提比略·格拉古早年参加过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来又参加过征服西班牙的战争，在罗马统治阶级中是个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的支持下宣誓就任保民官，一上任，他就向平民会议提出了一个土地改革提案，其中规定：任何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五百犹格（约合一百二十五公顷），如有儿子，每子还可占有二百五十犹格，但以二子为限。这样，每家最大限度占有国有土地一千犹格；超过这个限额的，由国家收回，然后以三十犹格为一份，分给无地平民。他还提议：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实施上述提

案。

这个提案反映了罗马国家克服兵源危机、维护贵族奴隶主阶级长远利益的愿望，同时，对破产平民也是一种抚慰，因而得到他们广泛的支持。但是提案却遭到了贵族保守派的疯狂反对，因为贵族所占用的大量国有土地，实际上早已成为各家的私产，如果提案得以实施，势必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贵族保守派为了阻挠提案在平民大会上通过，噉(sǒu 叟)使另一个本身占有很多国有土地的保民官屋大维出面反对。果然，屋大维行使了否决权，轻易地否决了提比略的提案。

休会时，提比略为了争取屋大维的支持，就向他陈述改革的必要，晓以利害得失，希望他收回自己的否决，甚至答应以自己的财产来补偿屋大维因改革而失去的地产。但是，屋大维顽固地站在贵族保守派一边，拒绝了提比略的规劝。

复会后，提比略向平民大会提出议案，要大会在他和屋大维谁去谁留的问题上作出选择。表决结果，平民一致撤了屋大维的职。

接着，平民大会立即通过了提比略的提案，使之成为法律，并选举提比略、其弟盖约·格拉古及提比略的岳父组成三人委员会。

三人委员会的工作遭到贵族保守派的阻挠和破坏，困难很多。贵族占有的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之间的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便把大片国有土地说成是私有土地，拒不交出；即使那些可以确定为应该没收的国有土地，贵族也借口在上面修建了房屋、排干了沼泽、培植了葡萄园而要求过高的补偿。但是，三人委员会在平民的赞助下，坚

持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春去冬来,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提比略考虑到,如果他一去职,贵族保守派必然要进行反扑,改革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因此,为了把改革进行下去,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保民官一般规定只任一年,但连选连任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次贵族保守派却攻击提比略违法,并暗中策划,寻找机会要杀害提比略。

机会终于到来了。选举保民官的那天,成千上万的平民聚集在罗马中心广场上,倾听提比略发表演说。其间,当提比略听说有人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就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意思是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这时,一个贵族保守派的暗探立即大叫大嚷起来,说提比略想戴王冠,要推翻共和国。接着,手持棍棒刀枪的暴徒向提比略冲去,广场上顿时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结果,提比略及其追随者三百多人惨遭杀害。

提比略虽死,但平民争取土地的运动仍在发展,贵族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仍在继续。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当选为保民官。盖约上任之后,立即提出粮食法案和土地法案,并在平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粮食法案规定,由国家供应城市平民以廉价粮食。土地法案规定,继续进行由提比略开创的土地改革,成立一个以盖约为首的新的三人委员会。

三人委员会在平民的支持下,冲破阻力,积极开展工作。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意大利境内的国有土地已经不多了。盖约提出了一项建立三处移民地的计划,两处在意大利本土,另一处在非洲迦太基的旧址上。

盖约的计划一提出，贵族保守派便施展阴谋诡计，笼络平民群众，破坏改革。他们利用一些平民不愿离开意大利的心理，策动另一个保民官李维·德鲁斯提议，说三处移民地太少了，要建立十二处，并且全部设在意大利本土。可是实际上，在意大利已经没有这么多闲置的国有土地可供建立十二处移民地了，德鲁斯的建议仅仅是蛊惑人心的一纸空文。然而，一部分平民对此却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此外，盖约规定，获得国有土地的平民应向国库缴纳租金，德鲁斯则别有用心地提出完全免去。

德鲁斯的反建议博得了平民的好感，离间了平民与盖约的关系。但是，仍有不少平民坚定地支持盖约。

贵族保守派深知，要彻底扼杀改革运动，还必须诉诸暴力。

在一次祭神仪式上，保守派的一个爪牙把祭品从祭坛上取下后，挑衅性地对盖约和周围的平民们说：“你们这群混蛋公民，快给正直的公民让路！”盖约的支持者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扑上去，你一拳我一脚，结果了这个爪牙的性命。保守派以此为借口，第二天手持利剑、标枪，对改革派进行疯狂的屠杀，当场三千多人被杀害。盖约逃入丛林，在绝望中自杀了。

马克思指出：罗马的“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①。格拉古兄弟改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这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438页。

制了贵族对国有土地的兼并,削弱了大土地所有制,改善了小农的经济地位。据记载,在改革期间约有八万多破产平民获得了土地,这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然而,格拉古兄弟改革最后是失败了。原因在于,一方面贵族保守派的势力比较强大,另一方面罗马的平民与奴隶泾渭分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只限于自由民内部,没有也不可能和广大奴隶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汇合起来,因此缺少深厚的群众基础。公元前 111 年,罗马国家正式承认贵族霸占的国有土地永归私有,还规定小农分到手的国有土地可以转让,于是土地兼并之风又盛行起来了。

斯巴达克起义

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种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奴隶不算作人，而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然而，正是奴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以他们的艰苦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并且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动了一系列气壮山河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以致最终消灭了奴隶制度，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在中外奴隶起义的历史上，公元前73年，由斯巴达克领导的罗马奴隶起义，占有极其光辉的一章。而斯巴达克本人，则被马克思称为“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①。

公元前一世纪初叶，罗马已是一个领土相当广袤(mào茂)的奴隶制大国。元老贵族把持着罗马元老院，垄断了执政官及行省总督等要职。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中，元老贵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经常把数以万计的战俘变为奴隶，到处建立起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在罗马元老贵族暴虐统治下，广大奴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法律规定，奴隶主对奴隶有生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159页。



斯巴达克

杀予夺之权。在庄园、矿山里，奴隶主挥舞手中的皮鞭，强迫奴隶用十分简陋的工具，从事极度繁重的劳动。为了防止奴隶逃跑，还给奴隶戴上沉重的脚镣，套上写有“抓住我，不要让我逃跑”字样的项圈。奴隶的生活毫无保障，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奴隶没有婚姻权，只有少数男女奴隶，经过奴隶主同意，才能结合。奴隶所生子女，也被看作是奴隶主的财产。那些年老患病的奴隶，境遇更坏，罗马城及其附近的奴隶主，竟把年老患病的奴隶扔到台伯河中的一个荒岛上，任其冻饿而死。

罗马的奴隶当中，处境最为悲惨的，要算角斗奴隶（角斗士）。角斗，是罗马奴隶主阶级的一种野蛮而残酷的“娱乐”。罗马政府为此还造了巨大的角斗场，如罗马城里的弗拉维半圆形角斗场，可容纳五万人。在角斗场上，奴隶主强迫成对的角斗士手握利剑、匕首，相互搏斗，或强迫角斗士与饥饿的猛兽拚杀，以此寻欢作乐。一场角斗的人数，起先只有几对，后来增加到几十对，最多达三百多对，并由单人搏斗，发展为分组成队的搏斗。在搏斗中，不知有多少奴隶满身是伤，血流如注，倒毙在地。

角斗士要经过专门训练，为此开设了角斗士学校。角斗士们在教练的严密监视下，整天练习刺杀、摔跤等项目，夜间则被关在彼此隔绝的囚笼里，以防止他们串联造反。

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迫使广大奴隶一再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前 137 至前 132 年，爆发了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公元前 104 至前 101 年，又爆发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的浪潮犹如地中海的波涛，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罗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色雷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介于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罗马进兵北希腊时，色雷斯人奋起抗击。在一次战斗中，斯巴达克不幸被俘，后被转卖为奴隶。斯巴达克身躯魁梧，酷爱自由，多次设法从奴隶主手下逃脱，但没有获得成功。后来，奴隶主把斯巴达克送到意大利加普亚城一个角斗士学校里，充当角斗士。

角斗士学校里暗无天日的生活，角斗场上的凄惨情景，更激起斯巴达克对罗马统治者的无比仇恨。他决心联合受压迫的阶级兄弟，高举起义大旗，把罗马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他慷慨激昂地说：“宁可为自由而战死于沙场，决不为敌人取乐而丧身于角斗场。”

公元前73年夏，正当斯巴达克串联了二百多个角斗士准备起义的时候，一个叛徒向敌人告发了起义计划。斯巴达克当机立断，即刻率领七十八名角斗士，拿起刀叉、棍棒，击杀了卫兵，冲出了角斗士学校，直奔几十里以外的维苏威火山。威震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维苏威火山座落在意大利西南部，濒临那不勒斯湾，当时处于“休眠”状态。除了一条崎岖小路可通山顶而外，到处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斯巴达克在山上安营扎寨，积蓄革命力量。起义军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嘹亮的战歌回荡在山谷间。

起义军还经常走下山来，在附近的坎佩尼亚平原严惩那些作威作福的奴隶主，解放庄园中的奴隶。广大奴隶纷纷集合在斯巴达克的旗帜下，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将近一万人。斯巴达克点燃的革命之火，照亮了奴隶前进的道路。

斯巴达克起义强烈震动了罗马统治阶级，元老院急忙派遣克罗狄率领三千官兵前往镇压。克罗狄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用重兵封锁了唯一的一条山路，妄图把起义军困死在山上。

斯巴达克临危不惧，向战士们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令：“宁可战死，不愿饿毙”。并积极寻求突围之计。一天，他巡视战地，看见一群战士正在用野葡萄藤编织盾牌。看着，看着，

他忽然想到，既然野葡萄藤能编织盾牌，是否也能用来编织软梯，然后利用软梯顺着悬崖峭壁直下谷底，打开一条脱险的道路呢？他将这一想法说出后，立即得到了战士们的支持。不久，一条长长的软梯就编好了。靠了这条软梯，靠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起义队伍成功地转移到山下。

夜深了，星移斗转，万籁俱寂。罗马官兵一个个都进入了梦乡。这时，斯巴达克率领起义军已悄悄绕到敌人背后。一声令下，起义军发起猛攻，打得三千敌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克罗狄不知所措，慌忙跳上一匹战马，逃之夭夭。

随后，斯巴达克逐步控制了坎佩尼亚平原，威震整个意大利。起义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没收来的奴隶主金银一律归公，用以换取铜铁，制造武器。广大奴隶，以及许多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

斯巴达克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要在罗马国家的心脏地区意大利本土建立巩固的奴隶政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他计划把起义军带出意大利，摆脱罗马的奴役。进军路线是，穿过坎佩尼亚平原，抵达亚得里亚海岸，然后沿着海岸线北上，再翻越横亘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势力尚未达到的高卢地区。

话分两头。斯巴达克的手下败将克罗狄回到罗马城，立即向元老院报告说，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军如何神出鬼没，势不可当。元老贵族惊魂未定，又传来起义军向亚得里亚海岸挺进的消息。于是，元老院又派遣普布列·瓦伦涅率领两个军团，约一万二千人，分兵三路，前往围堵起义军。

双方一经接触，斯巴达克就先后歼灭了瓦伦涅的两员副

将所率领的数千敌军，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当起义军因连续作战，需要适当休整的时候，瓦伦涅在一处山区把起义军包围起来，妄图置起义军于死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不过瓦伦涅高兴得太早了。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军群策群力，采用一条妙计，化险为夷，转守为攻。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一天夜晚，在前沿阵地上，起义军把敌人丢下的一具具尸体绑在木桩上，旁边点燃起篝火，远远看去好象是一个个哨兵在站岗放哨，并且留下一名号兵按时吹号。这一切布置得是那么逼真，以致瓦伦涅丝毫没有察觉。就这样，起义军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静悄悄地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天亮了，瓦伦涅发现中计，急忙率军尾追，中途又遭到起义军伏击，损失惨重，连他的卫队和坐骑也都被起义军俘获了。

斯巴达克甩开瓦伦涅以后，指挥起义军由坎佩尼亚转入更南面的鲁卡尼和布鲁丁畜牧区。在那一带，又有大批奴隶带着马匹投奔斯巴达克。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七万人，分别组成骑兵团、重装步兵队和轻装步兵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浩浩荡荡的起义军向阿尔卑斯山进发。

公元前72年，罗马元老院派出执政官波泼里科拉和连图拉斯亲自率领两个军团的兵力，前往镇压。起义军遭到一定的损失，但斯巴达克亲自率领的一支起义队伍，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这时，起义军发展到十二万人。

阿尔卑斯山高耸入云，山顶终年积雪，气候恶劣。起义军大队人马连同辎重，要翻越这座大山，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其困难的。斯巴达克大概考虑到这一具体情况，遂又放弃了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山北高卢的计划，掉转头来，挥师南下。

罗马元老院得知斯巴达克南下的消息后极度恐慌，立即宣布意大利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寄希望于选出一个新执政官，由他来扭转战局。执政官是一肥缺，往年贵族奴隶主争相入选。可是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却没有谁愿意充任。最后，元老院推出大奴隶主克拉苏，委以“狄克推多”（意为独裁者）的大权。克拉苏为了重振“军威”，驱使士兵为奴隶主阶级卖命，实行了残暴的“什一格杀令”，即把临阵脱逃而被抓回来的士兵分成十人一组，以抽签的方式，每组抽出一人处死。

克拉苏以为斯巴达克会进攻罗马城，因此在通往罗马城的大道上设下重兵，妄图围歼起义军。然而，斯巴达克绕过罗马城，指挥起义军纵穿意大利半岛，准备渡过墨西拿海峡，占领富有战斗传统的西西里岛，以便与罗马统治者作长期的斗争。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克拉苏以优势兵力，把起义军压缩在意大利最南端的一个狭长的勒佐半岛上，并在这个半岛连接陆地的一边，从第勒尼安海到爱奥尼亚海挖了一条深、宽各四、五米，长达五十余公里的堑壕，还把挖起来的土筑成一道又高又厚的土墙，企图把起义军困死在那里。

困难吓不倒起义的英雄们。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斯巴达令一部分战士点起篝火，又唱又跳，麻痹敌人；同时令另一部分战士身披白羊皮，暗暗地用树枝、圆木、泥土迅速填

满一段堑壕，筑起一条通道。随后，斯巴达克率领起义军越过堑壕，翻过土墙，突破了敌人的围困。

下一步，斯巴达克计划攻占亚得里亚海滨的布林的西港，然后渡海到希腊去。但是，来自小亚细亚的一支罗马军队，抢先占领了布林的西。这样，起义军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形势十分严重。

公元前71年初秋的一天，斯巴达克和克拉苏在离布林的西不远的地方进行决战。起义军奋勇杀敌，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黄昏时，有六万名起义奴隶壮烈牺牲。

斯巴达克和余下的一万名起义奴隶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突然，一个罗马军官从背后猛刺斯巴达克一枪。斯巴达克腿部中刺，跌下马来。战士们立刻冲上前去，将斯巴达克救起，牵来一匹黑色骏马，恳求他为了奴隶的事业，快马突出重围。斯巴达克望着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生死与共的战友，感慨万分。他毅然举起短剑刺杀了那匹战马，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报仇！他站立不稳，于是就屈下一只膝，一手举着盾，一手紧握剑，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斯巴达克领导的气吞山河的奴隶大起义，虽然不幸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强烈震撼了古罗马，沉重打击了罗马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斯巴达克，作为古代世界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和统帅，集中反映了奴隶阶级不甘屈辱，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无穷的聪明才智。两千多年来，斯巴达克的光辉形象，一直铭刻在被压迫人民的脑海里，激励他们为自由、解放而斗争。斯巴达克立下的丰功伟绩，永世长存。

打开沉睡千年的 罗马古城——庞培

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西南海岸，有一座巍峨峻峭的高山，俯瞰(kàn 看)着波光粼粼的那不勒斯湾，那就是著名的维苏威火山。

自有历史记载起，直到公元一世纪，维苏威火山长时期处于“休眠”状态，表面十分平静，好似普通的山峰。但是，公元79年8月24日下午一点多钟，山顶突然喷出滚滚浓烟和无数火星，发出剧烈的爆炸声。刹那间，天昏地暗，山摇地动，平静的那不勒斯湾也激起了汹涌的波涛。那火星是被喷起的熔岩，当它落到地面时，已凝固成石块。大量的石块、火山灰在地面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接着，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由于火山喷出的大量水蒸汽升到寒冷的高空凝结成的。大雨引起山洪，山洪挟带着大量的火山灰和石块，形成一股巨大的泥流向山下冲去，很快便把山南麓的一座城市——庞培整个地淹没了^①。城内二万多居民，大部分及时转移出去了，遇难者约两千多人。

^① 同时被泥流埋没的，还有一座名叫赫库兰尼姆的城市。该城也早已进行发掘，只是由于覆盖在上面的土层厚达三十多米（庞培城很少超过四米），因此进展较慢。

此后，维苏威火山每过若干年就喷发一次，当然也带来不同程度的灾害。但是，每次它一停止喷发，勤劳勇敢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又陆续回到山脚下，开垦土地，放牧牛羊，重建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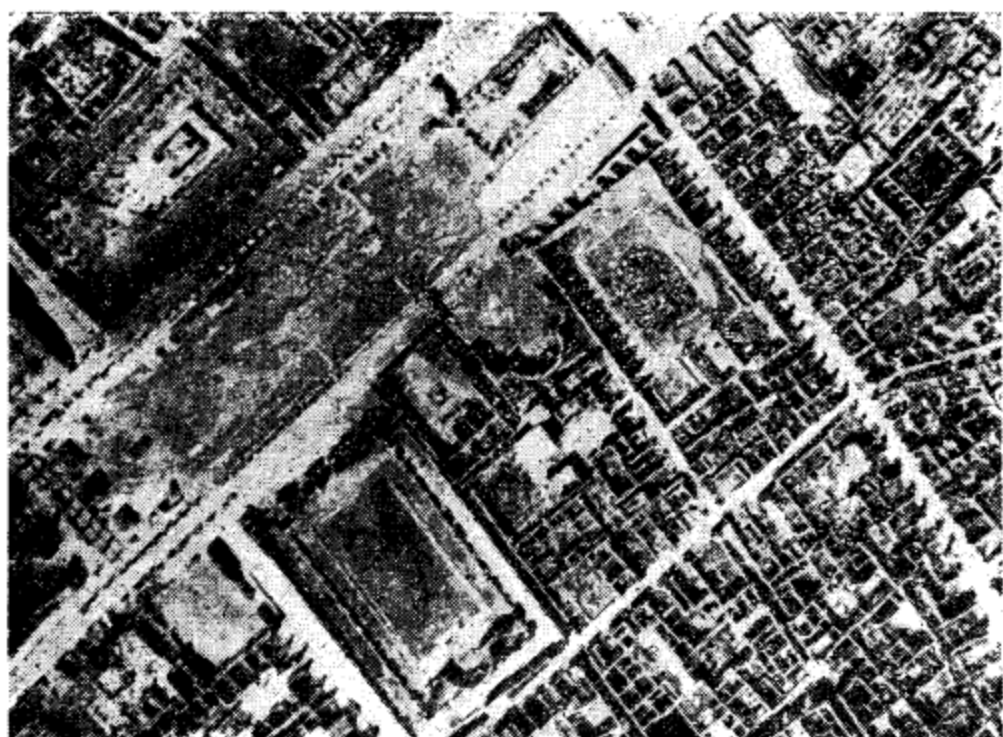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培城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后人在翻阅罗马古籍时，知道有个庞培古城，但它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却成了个谜。

距今大约二百六十年前，意大利农民在维苏威火山西南八公里的地方修筑水渠时，从地下挖出了一些古罗马的钱币，以及一些经过雕琢的大理石碎块。不久，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了刻有“庞培”字样的石块。原来庞培城就在这儿！

1748年，对庞培城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开始了。经过两百年来断断续续的发掘，这座在地下沉睡了近一千九百年的罗马古城，大部分已经重见天日。由于庞培城是被泥流埋没的，因此城里的建筑、器具以及其他文物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人们可以漫步在庞培古城平坦的大街上，参观这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庞培城约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到它被埋没时，已经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就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规模来说，庞培是座小型城市。但是，通过它可以反映出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奴隶制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

庞培城占地约一点八平方公里，四周有坚固的石砌城墙围绕，城墙总长四千八百米，设有八座高大的城门。城里纵横各有两条笔直平坦的大街，呈井字形，把全城分成九块地区。每块地区又有许多小街小巷。街巷的路面，是用石块铺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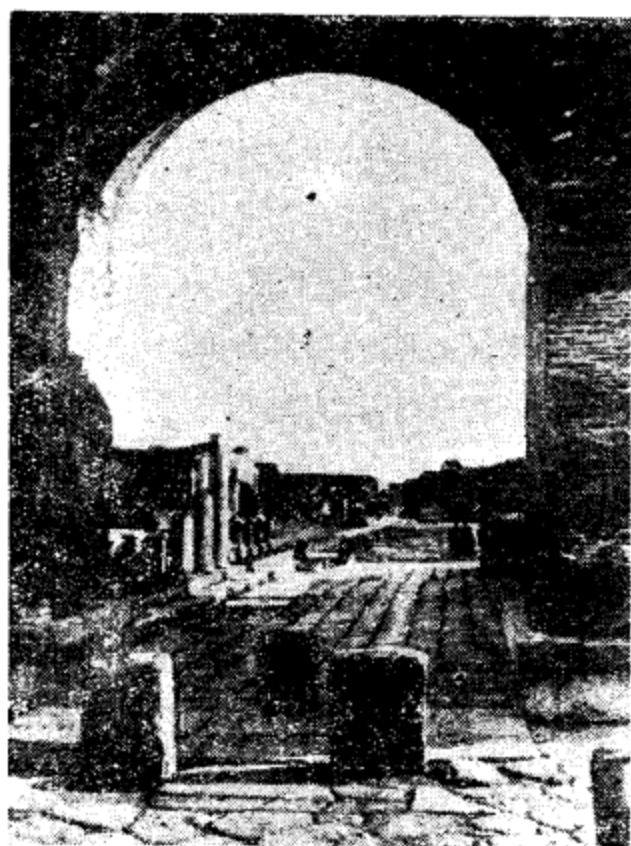
庞培城遗址一部

大街铺的是石板，有十米宽，街道两旁还铺有人行道。当年，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奴隶主富豪则坐着六人扛抬的轿子招摇过市。运货的四轮车来往不绝，由于金属车轮长期滚碾的结果，石板路面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辙。

在街道的每个十字路口都设置了饰有精致雕像的石制水池，储存清澈甘甜的泉水。泉水通过平地架起的渡槽，从城外山上引到城内最高点的一个水塔里，然后流向各个公用水池和富豪庭园中的喷泉池里。

座落在城内西南部的一个长方形广场，是庞培城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它集中了全城大部分宏伟的建筑，其中包括庞培城的官府、法院和几座大的庙宇。广场四周有高大的雕花柱廊环绕，可以遮挡风雨烈日。可惜这些建筑都已经倒

塌，看不出全貌了。不过，这不能“归罪”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那次爆发，而是由公元63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造成的。在广场上发现有未经雕刻的大理石块，而且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上，一个小雕像已臻于完成了。这说明在那次大地震之后，奴隶们正在进行城市的重建工作。今天，从广场四面残存的石碑



长方形广场一拱门

坊(它的石柱有三、四丈高，两人合抱那么粗)，从庙宇中的那些雕花精致的大理石门框、祭坛和高出地面三、四尺的石板地基，可以想见这些建筑物是多么雄伟壮观，又凝结了多少奴隶的智慧和血汗。

庞培城的官府规模很大，位于广场的东南，它是达官贵人开会、办公的地方。法院原是一所两层楼的长方形建筑物，座落在广场的西南。当年，庞培城的奴隶主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政权，惨无人道地奴役和剥削广大的奴隶。

法院所在的那幢楼，也是商人们订立贸易合同的场所。东方的香料、宝石，中国的丝绸，非洲的象牙，当地生产的葡萄

酒、呢绒和玻璃制品，以及奴隶，都在这儿洽谈成交。一些富商勾结官府，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广场的东北面是一座商场。一千八百多年前，这里店铺鳞次栉(zhì 制)比，商品琳琅满目，热闹异常。发掘时，在一个水果铺里，发现货架上摆满了杏仁、栗子、无花果、梅子、胡桃、葡萄等果品。它们当然早已不能吃了，但从外形上还能辨认得出来。在一家药店的柜台上，还发现了一盒药丸，已经变成了细末，旁边还有一根细小的圆药条，显然是当药剂师正在把它做成药丸时，突然遭到灾难而弃之不顾了。

商场上专门设有出售奴隶的高台。在奴隶贩子的监视下，那些不幸沦为奴隶的人，胸前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写明年龄、健康状况、价格等，任凭买主选购。

庞培城的店铺往往兼作手工作坊。作坊规模一般不大，一个作坊主，带有一、二个奴隶，多者五至十个奴隶。产品自制、自销。发掘出来的有面包房，有呢绒、珠宝、石工、香料、玻璃、铁器等作坊。在一家面包房的烘炉里，发现一块烤熟了的面包，不但保持着原来的外形，而且上面印着的面包商人的名字还清晰可见。发掘出来的呢绒作坊，内有洗羊毛的石槽、染缸、燃烧硫磺以进行漂白的设备等等。

庞培城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这从住宅建筑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富人的邸(dī 抵)宅十分豪华。大门往往有粗大的大理石圆柱和雕花的门楼。正厅、餐厅和卧室宽敞明亮，墙上绘有大幅壁画，地板上饰有镶嵌画。有一幅镶嵌画十分引人注目，画面是立于战车上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和骑在马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相互厮杀的情景。室内的陈设

有珍贵精美的青铜和白银制品。庭园里，栽培有奇花异草，摆着用大理石雕成的天使、人像、兽像、石盆、石瓶等，细细的泉水从石像、石刻中喷出，汇入碧波荡漾的水池中。此外，富人邸宅还设有舒适的浴室，可供冷水浴、热水浴和日光浴^①。而创造这一切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能拥挤在那些狭窄、阴暗的房屋里，有的奴隶甚至戴着手铐脚镣蜷缩在屋檐下过夜。

庞培城的奴隶主还驱使奴隶在城内东南角建造了两座公共建筑物——角斗场和体育场。公元前70年建造的圆形露天角斗场，可容纳观众二万人，它中间低平，四周看台呈阶梯形，与现代体育场的结构十分相近。观看野兽和野兽相斗，角斗士（奴隶）和野兽相斗，是罗马奴隶主的一种十分残酷的“娱乐”。角斗时，许多奴隶因精疲力竭而被咆哮的野兽撕碎，惨不忍睹。在庞培城的角斗士学校里，还发现六十三具披枷戴镣的角斗士骨骸。

古老的庞培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它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在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伟大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同时，它也以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种剥削制度，最后它不免于被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所埋葬。

^① 城里另设有三个公共浴室。当时人们已懂得用大锅炉烧水，然后让热水和冷水分别通过管道引向浴室，并且已懂得让蒸汽通过双层墙中的空隙起暖气保温作用。

早期基督教

恩格斯指出：“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对基督教更是这样”^①。那末，基督教是如何起源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呢？

罗马共和末期，广大奴隶曾一再发动起义，反抗元老贵族的反动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些起义给了罗马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是最后都失败了。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结束了罗马共和时期，建立了罗马帝国。皇帝集大权于一身，依靠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完备的官僚系统，严密控制意大利本土及各个行省。整个罗马帝国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广大奴隶身上。屋大维就曾三令五申，要对奴隶实行严刑峻法，例如，奴隶杀死主人，凡与“凶手”同住一处的所有奴隶均处死刑；禁止释放三十岁以下的奴隶，等等。屋大维还承认：“我捕捉了三万名从主人那里逃脱出来，拿起武器反对国家的奴隶，然后把它们交还原主处死。”

各地奴隶不断举行起义，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6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满罗马总督的残暴统治，发动起义，

^①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28页。

① 一举消灭了耶路撒冷的罗马驻军。罗马皇帝调兵遣将，前往
② 镇压。起义者经过四年的英勇战斗，不幸失败。罗马军队重
③ 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后，将被俘的起义者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以致于“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除死难
⑤ 者外，耶路撒冷居民被卖为奴隶的达七万人。在小亚细亚等
⑥ 地，同样爆发过奴隶起义，结果也都失败了。公元一世纪的罗
⑦ 马帝国，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奴隶革命暂时处
⑧ 于低潮。

⑨ 罗马帝国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使得在部分城市贫民及奴
⑩ 隶中间，滋长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们不满现实，但又找
⑪ 不到出路，于是就希图从宗教领域里寻求解脱。基督教正是在
⑫ 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⑬ 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犹太教就流行于巴勒斯坦一带了。
⑭ 犹太教是一神教，笃信所谓“救世主”。它预言上帝的儿子“救
⑮ 世主”将要降临人间，拯救被奴役的人民免于苦难，等等。基督
⑯ 教正是吸收了犹太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的。

⑰ 耶稣是传说中的基督教的创始人。据说，耶稣是犹太人，
⑱ 生于耶路撒冷附近。他说自己就是犹太人早先预言的“救世
主”。他教人忍受现世的苦难，以便死后升入天堂，而富人、剥
削者要入天堂则比“骆驼(一说大绳)穿过针孔还难”。这种对
富人的谴责和诅咒，对当时的被压迫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
上的慰藉。传说还谈到，耶稣在巴勒斯坦的传教活动引起了
罗马总督和犹太上层分子的恐慌，于是他们就把耶稣逮捕起
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数天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了，并说他
将来还会来到人间，拯救人类云云。耶稣被他的信徒奉为“救

世主”——希伯来语读音为“弥赛亚”，古希腊语读作“基督”，所以通常称耶稣·基督。后来，基督教徒把上述传说和所谓耶稣的其他言行用文字记录下来，编成《新约全书》，并把《新约全书》和犹太教的《旧约全书》一并作为基督教的“圣经”。同时，基督教徒还以十字架作为信仰的标志。但是，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和研究，历史上并未存在过耶稣这么一个人，更没有什么死而复活的“奇迹”，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格化的神而已。

基督教吸收教徒不分种族，所以，很快从巴勒斯坦传播到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不久又传播到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入教者多为城市贫民及奴隶，即处于罗马社会最底层的人。教徒组成基督教公社，平等互助，实行共餐，经常举行秘密的宗教仪式。公社的管理人员有长老、助祭等。

起初，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对早期基督教持敌视态度。公元64年，罗马城内发生一次大火灾，皇帝尼禄诬罪于基督教徒，大加杀戮。从这时起，至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305年)，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不断发生。戴克里先还下令焚毁教堂，用严刑峻法来胁迫基督教徒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消灭基督教，相反，基督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至公元四世纪初，基督教的势力已经遍及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教徒的人数约占到罗马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尽管基督教同情城市贫民及奴隶的悲惨处境，宣传平等思想，预言罗马帝国必将灭亡。但是，基督教不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在现实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如恩格斯指出的：基督教“希望

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①。很明显，这种寄希望于来世的说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帖麻醉剂。

早期基督教还公开宣扬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要被压迫阶级忍耐服从，苟且偷生，说什么：“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的左颊，连右颊也送上去。有人夺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由他拿去。”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基督教撇开人的阶级性，抹煞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侈谈什么“爱仇敌”，这只会麻痹奴隶的革命斗志，于奴隶主阶级有利。

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经济衰退，战乱频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斗激烈。于是，一些富人，乃至帝国的官吏，在徬徨徘徊之中，也纷纷钻进基督教里来，寻求所谓“解脱”，而且，这些人逐渐占据了教会中的主要圣职。

罗马统治阶级考虑到基督教教义和教徒成分的变化，自戴克里先以后，一反过去迫害基督教的做法，转而采取怀柔利用的政策。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为了更有效地操纵和利用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集宗教会议。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正宗教义和教会组织。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免除

^①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26页。

了教会的捐税及教会人员的兵役负担，还赋予教会以相当大的行政权限。至此，基督教完全沦为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了。

但是，基督教扑灭不了奴隶革命的烈火，挽救不了罗马奴隶制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公元 395 年，处于内外交困中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接着，基督教也在实际上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支。东正教辖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四个大主教区，每个大主教区由大主教一人主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区设在帝国都城，位置显要，因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逐渐取得对其他大主教的领导地位，成为东正教的领袖。整个西罗马帝国是一个大主教区——罗马大主教区，罗马大主教自公元四世纪起自称教皇，是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东正教与天主教正式分裂是在 1054 年，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

基督教不仅曾经作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且为历代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麻醉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鸦片。马克思深刻揭露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①

①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218 页。

罗马帝国的没落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在这二百年间，帝国的最大疆域，北面达到不列颠及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东面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南面囊括了埃及、苏丹北部及整个北非的地中海沿岸，西面濒临大西洋，俨然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境内（主要是各行省）的奴隶制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广泛役使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相当繁荣。然而，奴隶制度作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它为生产力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公元三世纪，罗马的奴隶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罗马奴隶制的危机，首先表现于农业的衰落。“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由于农业的衰落，必然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82-83页。

②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45页。

动摇整个奴隶制经济的基础。

罗马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奴隶制大庄园的普遍存在。罗马在其统一意大利及征服整个地中海区域的过程中，元老贵族在意大利和各行省霸占成片土地，建立大庄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少则几十个，多则上千个。

这种奴隶制大庄园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排斥小农，即个体自由农民。大庄园主为了扩大其地产，不择手段地兼并土地。起初，往往是“把相邻的穷人的土地并入自己的领地，其中部分是用钱从穷人那里买到的”，而当“协议购买不成功时，则用阴谋诡计——法律上的征用和毫不客气的暴力掠夺，直至弄到手才甘心”。这样一来，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有背井离乡，流入城市，成为流氓无产者。帝国崩溃前夕，聚集在罗马城的流氓无产者达八十万人。他们鄙视劳动，成年累月依靠国家和大奴隶主微薄的施舍过着寄生生活。马克思指出：“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①。自由农民已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担当者了。

大庄园主为了追逐利润，往往把原来种植谷物的土地，改为经营畜牧业或园艺业，这也是导致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庄园经济发展较早的意大利尤为严重，恩格斯指出：“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则使用大批奴隶经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600页。

营大规模的园艺业”^①。其结果，许多地区都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地，谷物的生产不断下降，以致不时带来饥饿的威胁。罗马作家普林尼在谈到意大利和北非洲的情况时曾感叹道：“大庄园制度毁灭了意大利，并且也毁灭了各行省。”

大庄园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极其残酷。他们不顾奴隶的死活，强迫奴隶从事过度繁重的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六个小时以上。许多奴隶在劳动时还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磨房里劳动的奴隶，脖子上被套上一个大木枷，以防止偷吃面粉。奴隶稍有反抗，就遭受各种酷刑，轻则鞭笞、拷打，重则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之下，无数奴隶还在壮年时期就被夺去了生命。广大奴隶不断以各种斗争形式，反抗奴隶主的残暴统治。怠工是奴隶经常采用的一种斗争形式，给奴隶主造成很大的损失。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科路梅拉写道：奴隶“把土地耕种得极坏，在播种时故意乱播，而浪费了极大数量的种子；他们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已经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谷物的一部分隐藏起来，或以故意的疏忽造成损失。”奴隶还经常破坏劳动工具。奴隶主为了减轻损失，只给奴隶使用一些粗笨的工具，以致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新式工具如水磨、带轮犁等，后来都难于推广使用，因此生产效率极低，单位面积产量不断下降。奴隶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成批地逃入山林，或举行武装起义。结果是，奴隶也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担当者们了。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45页。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一个社会，没有人从事生产，尤其是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这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

由于农业的衰落，农村没有足够的粮食和手工业原料供给城市，城市手工业的产品也找不到销路，因此工商业随之衰落下去，许多商旅云集的城市变成了冷落的乡镇。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军队却越来越庞大，奴隶主更加荒淫无耻。为了应付浩大的经费开支，帝国政府拚命加重税收，并不惜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大量发行货币。结果，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社会经济濒临崩溃。恩格斯指出：“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①

罗马奴隶制危机还表现于政局的动荡。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军事政变层出不穷，从公元238至253年这十五年间，就换了十个皇帝。各行省往往独霸一方，拥兵自立。

在奴隶制度无可挽回的衰败之中，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隶农制发展起来了。隶农制早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就出现了，至公元三世纪时，已广泛流行。隶农的来源是，在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一些大庄园主为寻找出路，改变经营方式，把土地划成若干小块，交给奴隶和一些破产的农民耕种，收取收获物的六分之五甚至十分之九作为地租。这些承租土地的人称之为隶农。隶农不同于奴隶，他们可以支配部分剩余产品（尽管数量极少），建立家室，因此比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45页。

奴隶有一点生产兴趣。但隶农也不是自由人，他们不可以与自由民通婚，也不可以随意离开主人。恩格斯称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①。那些采用隶农制剥削的大庄园主，逐渐转化为新兴的封建地主。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大批收容逃亡奴隶和破产的自由民，既经营农业，又发展手工业，使田庄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武装，各据一方，使罗马政府无可奈何。隶农制的发展大大削弱了帝国中央的权力，加速了奴隶制的解体。

然而，“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②。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就进行过所谓“改革”，力图挽救大势已去的罗马奴隶制度。

戴克里先(284—305年)竭力加强专制皇权，皇帝被尊为神，朝见的人都要跪拜。他将大行省划小，并将帝国全境一百多个行省划分为四个大区，分区加以统治。他还大肆扩充军队，将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部机动部队两部分，剥夺了行省长官的军事职权。

君士坦丁(306—337年)把帝国的首都从罗马城迁到了东部的希腊旧城拜占庭，定名为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妄图借助东部行省的经济力量维持帝国的统治。他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两度重申主人有权杀死奴隶，宣布贫民出卖子女为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第146页。

②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83—284页。

合法。他还用法律的形式将隶农世代固着在土地上，禁止隶农逃跑，规定主人有权处理隶农的财产。总之，他千方百计把隶农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限制隶农制的发展。此外，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来巩固奴隶主的反动统治。本来，早期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的宗教，但由于它宣扬忍耐服从，不搞阶级斗争，终于为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把基督教作为奴隶制帝国的精神支柱。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倒行逆施，使得奴隶、隶农的状况更趋恶化，社会危机四伏。君士坦丁死后，帝国境内群雄角逐，政局愈加动荡。公元 395 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庭帝国）和以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

随着奴隶制危机的日益加深，自公元三世纪起，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广大奴隶和隶农不断爆发起义。公元 238 年，北非阿尔及利亚一带爆发了奴隶和隶农的起义。公元 263 年，西西里的奴隶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就是在罗马城内也发生了“造币工暴动”。公元三世纪七十年代，高卢人民掀起了“巴高达”（意为战士）运动，起义者由农民当步兵，牧人当骑兵，转战各地，狠狠打击那些罪恶累累的奴隶主，使得罗马统治者胆战心惊。公元四世纪中叶，巴高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并从高卢扩展到西班牙。公元五世纪初，一部佚（yì 亿）名喜剧形象地反映了巴高达运动的深得人心。剧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苦于没有生路，祈求守护神给他找个安居乐业之处，守护神提出多种建议，其中有一项就是劝他到巴高达运动

所控制的地区去，说：“那里的人受治于天道，公正无私，你到那里，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公元四世纪，北非也爆发了“阿哥尼斯特”（意为战士）运动，参加者有奴隶、隶农和农民，他们要求实行社会平等、财产公有，彻底推翻罗马奴隶主的统治。每到一处，他们就占据庄园，焚毁各种债券，解放奴隶。有一次，一个奴隶主趾高气扬地坐在马车上，叫他的奴隶跟在车后奔跑。起义者看到后怒不可遏，当即令那个奴隶主滚下车来，在车前引马带路，让奴隶坐到车上去。路旁的群众看了无不拍手称快。阿哥尼斯特运动动摇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

当西罗马帝国已是摇摇欲坠之时，又受到了日耳曼人的冲击。日耳曼人分为许多部落，原先散居在罗马帝国北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与罗马有接触。公元四世纪时，日耳曼人的氏族组织日益瓦解，逐渐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公元四世纪七十年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罗马政府强迫西哥特人为罗马当兵，甚至将不少西哥特人贬为奴隶。西哥特人不甘屈辱，手执武器，发动反罗马的起义，当地许多奴隶、隶农也参加进来。公元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领兵前往镇压，被起义军打得大败，瓦伦斯本人也一命呜呼。此后，日耳曼各族大规模向帝国境内迁徙。

公元410年8月，西哥特人全力围攻罗马城，城内奴隶乘机起义，在半夜里打开城门，与西哥特人合力攻占了这个罗马奴隶主阶级的巢穴。西哥特人没有久留，随即折入高卢和西班牙，与当地起义群众汇合，推翻了罗马在高卢和西班牙的统治。当西哥特人来到西班牙时，先期到达那里的另一支日耳

曼人——汪达尔人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与当地的阿哥尼斯特运动相结合，摧毁了罗马在北非的统治。西罗马帝国这时已成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只孤舟。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废黜。就这样，那个曾经称霸地中海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奴隶、隶农和日耳曼人的共同进攻下，彻底覆灭了！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它的废墟上兴起了一系列封建王国。西欧的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 灿烂文明

过去,欧洲人习惯地称美洲为“新大陆”,其实,在十五世纪末叶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美洲的主人——印第安人,早已建立了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洲的印第安人与亚洲的黄种人,在种族上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美洲原来是一片万古荒原,没有远古人类的足迹,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从亚洲迁徙过去的。

亚洲的东北部与美洲的阿拉斯加十分靠近,中间仅隔着一道白令海峡,其最窄处只有八十六公里。地质学的研究证明,在第四纪最近一次冰期来临的时候,海水大量被蒸发并以降雪的形式积聚在陆地上,因而导致海面下降,其幅度达一百五十米至二百米,结果,白令海峡的海底山脊露出了海面,成为可以通行的“陆桥”。

大约五万年以前,印第安人的祖先就是通过这座“陆桥”,陆陆续续从亚洲进入阿拉斯加,由北而南散布于整个美洲。北起加拿大冰原,南至火地岛,到处有印第安人的足迹。据估计,在十五世纪末叶,印第安人的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分成许多部落、部族或民族,所用语言和方言有一千七百多种。在社会

发展阶段上，各支印第安人很不一致，有的尚处在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如北美的易洛魁人，有的已进入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则建立了文明古国。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从古代起，相继创造了辉煌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

奥尔梅克文化可以看作是墨西哥文化的前驱，出现于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奥尔梅克人创造了象形文字、计算法和历法。他们还学会用整块石头雕凿祭坛和人头像。1939年，在墨西哥西部的泥沼丛林中，人们发现了奥尔梅克人留下来的由玄武岩石雕成的巨人头像。这些头像高二至三米，头围有七米半，每颗重达二十五吨。

玛雅人于公元初，在尤卡坦半岛上建立了作为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城邦。约公元四至九世纪，是玛雅文化的昌盛时期。一百多年前，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一座玛雅城废墟，里面建造有庄严的庙宇和雄伟的宫殿。

玛雅人是勤恳的农艺家。他们从野生植物中培育了玉米，作为主要粮食，此外还种植甘薯、番茄、南瓜及豆类等。可可也是玛雅人精心培育成的。今天，“可可”连同“巧克力”等出自印第安语的词汇，都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名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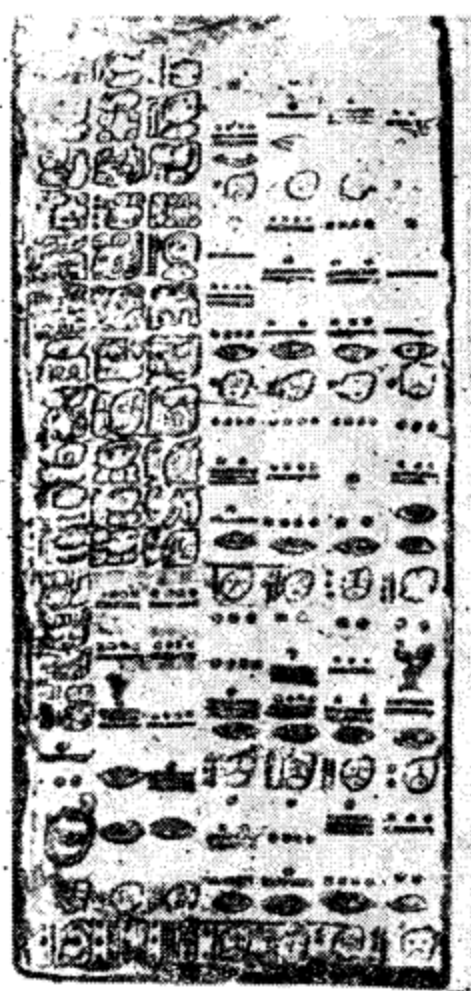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玛雅人很早就建立了天文台，细心观察天象。他们制定的太阳历，一年有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外加五天作为禁忌日，共三百六十五天，闰年加一天；一星期为五天，四星期为一月。月份的名称大都是按“播种”、“收割”等农时命名的。

玛雅人在公元初就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玛雅文献有两种，一种是以毛发制笔，树皮制纸，记述有关宗教、神话、历史、天文等内容。这些宝贵的文献，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后，几乎毁灭殆尽，仅留下三本。另一种是刻在石碑和其它器物上的铭文。此外，玛雅人大约每隔二十年就建立一些纪年柱，记载重要事件和日期。

玛雅人的建筑十分壮观。一千六百多年前，玛雅人建造的一座神殿，高六十多米，分作十五层，而且在第一、五、八及十一层处各有一间石室。整座神殿是由几万块重达一吨的花岗岩堆砌成的。

到了公元九世纪，由于某种至今尚未明了的原因，玛雅文化突然中断了。尽管如此，玛雅文化对后来墨西哥文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九世纪后，托尔特克人征服了墨西哥盆地。“托尔特克”一词，印第安语意为“巧匠人”。托尔特克人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们建造的“太阳金字塔”，高六十四点五米，底边宽二百二十米，上面建筑有庙宇和太阳神



玛雅人的象形文字

雕像，并有石梯由底部一直通向塔的顶端。太阳金字塔无论在占地面积和规模上，都超过了埃及的金字塔。不过，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它不是国王的陵墓，而是一种坛庙建筑。托尔特克人也已使用象形文字，并制定了历法。

十三世纪中叶，另一支印第安人部落——阿兹特克人又征服了墨西哥盆地，并在铁希戈戈湖（即现今墨西哥城的旧址）中的两个岛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铁诺奇第特兰城。通过不断的对外征服，至十五世纪中叶，阿兹特克人已控制了整个墨西哥盆地，西临太平洋，东濒墨西哥湾，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境内被征服的部落都必须向阿兹特克国王贡纳黄金、毛皮等贵重物品。铁诺奇第特兰相当繁华，城内街道宽广，绿树成荫，湖中有水上花园。两个岛屿之间用长堤相连。全城居民有六万人（一说十万至三十万人）。市场上商品种类繁多，有水果、毛皮、席子、药草、黄金、翡翠、陶器及纺织品等。

铁诺奇第特兰城建有金字塔形的坛庙共四十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有一百四十四级台阶。另外还有雄伟的宫殿建筑等。



树干雕——山神之鼓

阿兹特克人也是杰出的雕刻家。他们制作的一尊印第安人的雕像，屈膝蹲坐，双手环抱于膝前，两眼注视着前方，栩(xǔ 许)栩如生。

在医学上，阿兹特克人已知道用奎宁、毛地黄等药物治疗疾病，还掌握了原始的麻醉术。

除墨西哥外，秘鲁是印第安人的另一文明发祥地。

秘鲁中部有个名叫查文的小山村，面对湍急的莫斯纳河，背倚巍峨的群山。在本世纪初，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古庙，据考证，约建于公元前1500至前1000年。庙内一块大石头上，凿有七个不太深的圆洞，其构图很象猎户星座，这表明秘鲁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天文了。在两根圆柱上，各雕着一只鹰，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纤细的纹理仍然清晰可辨。另外还有许多石板，上面刻着凶猛的美洲虎，手持兵器的武士，形象十分逼真。查文文化凝结了古代秘鲁人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

公元二至六世纪，秘鲁进入了阶级社会。从出土的许多墓葬中，发现了有服饰不相同的陶俑，这说明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十三世纪左右，印加人崛起于秘鲁高原。印加人是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的一支。“印加”一词，印第安语的意思是“太阳的子孙”。十四至十五世纪，印加人征服了周围各部落，以秘鲁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其疆域北抵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南境，南至智利及阿根廷北部，统辖的人口达六百万。

印加人虽然不会冶铁，但已大量使用铜、青铜、金、银、铅

等多种金属，并擅长用金、银、铜制成各种器皿。在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花园里，独具匠心的印加人用金银制作的花朵，几乎与天然的一样。出土的贵族墓葬中，往往有几十磅到几百磅用金、银制成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印加人制作的陶壶不仅造型优美，而且色彩也十分绚丽。印加人还擅长纺织，尤以毛纺织品著称。

印加人也是伟大的石工建筑家。首都库斯科的城墙，城内的宫殿、庙宇等建筑，都是用巨石砌成的。这些石块都经过仔细琢磨，以致石缝间连刀片也插不进。库斯科以北有一座保存得十分完整的重镇，座落在深山之中。整个镇上的建筑几乎都是用一至三米见方的巨石砌成。镇内有居民点、作坊、庙宇、堡垒，还有用整块大石磨成的日晷。

印加人曾培育了近四十种植物，最著名的是马铃薯。他们已知道用鸟兽的粪便作肥料，修筑梯田，建立灌溉系统。

为了加强国内的联系，印加人修筑了两条纵贯全国的南北大驰道，每条长达二、三千公里。驰道在穿过河流峡谷时，架有桥梁，遇到河面过宽，则利用浮桥和渡船。路面平坦坚固，路旁绿树成荫。整个工程十分浩大而艰巨，无怪乎有人惊叹地说，这两条驰道的建筑“可以吓倒现代最勇敢的工程师”。驰道沿途相隔不远就设一驿站，有专人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公文书信。

在计算和记事方面，印加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称为“基布”的结绳文字。做法是在一根粗长的绳子上，系上一条条不同颜色的细短绳，细短绳上编结的形式和多少表示数字，细短绳的颜色则表示各种物品，如褐色表示马铃薯，白色表示银

子,黄色表示金子,红色表示战士等。印加帝国就是通过这种“基布”,保留了关于人口、税收等记录。印加人还有一种各地都通用的公用语,以克服各部落在语言上的障碍,加强帝国境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

在医学上,印加人已懂得使用麻醉药,据说,甚至还能动脑外科手术。

从以上大量生动的史实中可以看出,美洲印第安人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民,他们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地谱写了美洲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然而,1492年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后,欧洲各国的殖民强盗为寻求黄金,抢夺殖民地,一批又一批地横渡大西洋,侵入美洲,中断了印第安人独立发展的历史,毁灭了印第安人的文明。

1519年,西班牙殖民强盗科泰斯带着一批亡命之徒,从西印度群岛侵入墨西哥盆地,来到了神话般的铁诺奇第特兰城。第一次与殖民强盗打交道的印第安人毫无经验,阿兹特克的国王蒙特苏马还按照印第安人招待客人的传统习惯,亲自在城郊迎接科泰斯。可是,科泰斯却把蒙特苏马囚禁起来,大肆劫掠印第安人的财富。殖民强盗在王宫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国王珍藏的金银珠宝,贪婪的科泰斯曾说: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宝物面前,他不得不闭上眼睛。

英勇的阿兹特克人,在新首领考特莫克的领导下,以顽强的战斗,保卫自己的都城。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凭借手中良好的装备,惨绝人寰地屠杀阿兹特克人。铁诺奇第特兰这座美丽繁荣的古城,变成一片废墟。考特莫克也遭到杀害。今天,墨



西班牙殖民者袭击印第安人

西哥到处都有考特莫克的纪念碑，以铭记这位著名的爱国者。

西班牙在征服了墨西哥之后，继续南侵。1531年11月，另一个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从海上入侵秘鲁。他把印加国王囚禁起来，当作人质，对印加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勒索：如果印加人能在囚禁其国王的房子里装满黄金，在另外两间较小的房间里装满白银，国王就可获释。印加人为了营救自己的国王，夜以继日地从四面八方送来大量金银，其价值估计达二千万美元。但是，当金银到手之后，皮萨罗却背信弃义地把印加国王杀害了，并一步步侵占了整个印加帝国。皮萨罗不仅贪得无厌地掠夺印加人的财富，而且肆无忌惮地毁坏印加人的宫殿、庙宇古迹及其它珍贵文物。不屈不挠的印加人为了捍

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长达三、四十年的武装斗争。

继西班牙之后，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者也接连入侵美洲，野蛮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强占殖民地。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倾大西洋之水也写不完的。

古老的非洲大陆

非洲是一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大陆，非洲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历史上，非洲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谱写了人类历史的光辉篇章。然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替他们对非洲的殖民掠夺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作辩护，却诬蔑非洲是一块“黑暗大陆”，胡说什么“在无数的世纪中，当历史的壮观一一涌现的时候，非洲原封不动地停留在野蛮状态中”，非洲黑人“和白种人的文明毫无相似之处，只能象猴子学人一样的加以模仿”。这种刻毒的语言，丝毫无损于伟大的非洲人民，相反，只是更充分地暴露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

先从人类的历史说起吧。过去，根据从亚洲和欧洲出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来判断，人类历史大约有一百万年。可是，随着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这种判断正在逐步地让位于更新的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相继发现了原始人的头骨等化石，并伴有大量砾（lì 利）石工具出土。经过科学测定，这些人类化石和砾石工具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至二百六十万年，这一发现把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一百六十万年。东非这些新的发

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而且还意味着非洲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呢!

在北非地区,非洲的原始人留下了许多岩画。在制作这些岩画时,可能最初是用细线条勾好图案,再打出较清晰的虚线,然后细心雕刻而成。这些岩画有的取材于动物,如有一幅描绘水牛角斗,还有一幅描绘狮子和狼追逐野猪。另有一些岩画是描绘各类人物的,其中有的人物戴着用羽毛做成的冠帽,显然是氏族或部落的首长;有的戴着项圈和手镯,可能属于氏族权贵;还有的是携带弓箭盾牌的战士。这些岩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古代非洲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yì 益)。非洲人民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搏斗中,逐渐驱走了野蛮,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非洲建立过许多古老的国家。除了举世闻名的古埃及之外,在今天的苏丹北部,有过一个著名的古国——麦罗埃。麦罗埃王国建于公元前八世纪,起先定都于纳帕塔城,后于公元前530年左右迁都麦罗埃城。麦罗埃王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今天,在原麦罗埃城附近,仍保留有古代宫殿和庙宇的遗址,以及许多精美的岩石碑,上面刻有至今尚未释读出来的文字。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彩陶残片和刻有雕纹的石头。

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前,麦罗埃就已进入了铁器时代。麦罗埃曾经是非洲炼铁业的中心。在遗址的附近,至今还有两堆象小石子一样黝(yōu 友)黑发亮的铁渣,还发掘出炼铁的熔炉。铁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麦罗埃铁器除供本国的需要外,还向西非出口,炼铁技术也不断地向西

非和南非传播。西方殖民主义者胡说,直到近代,非洲尚处在石器时代。这一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一无耻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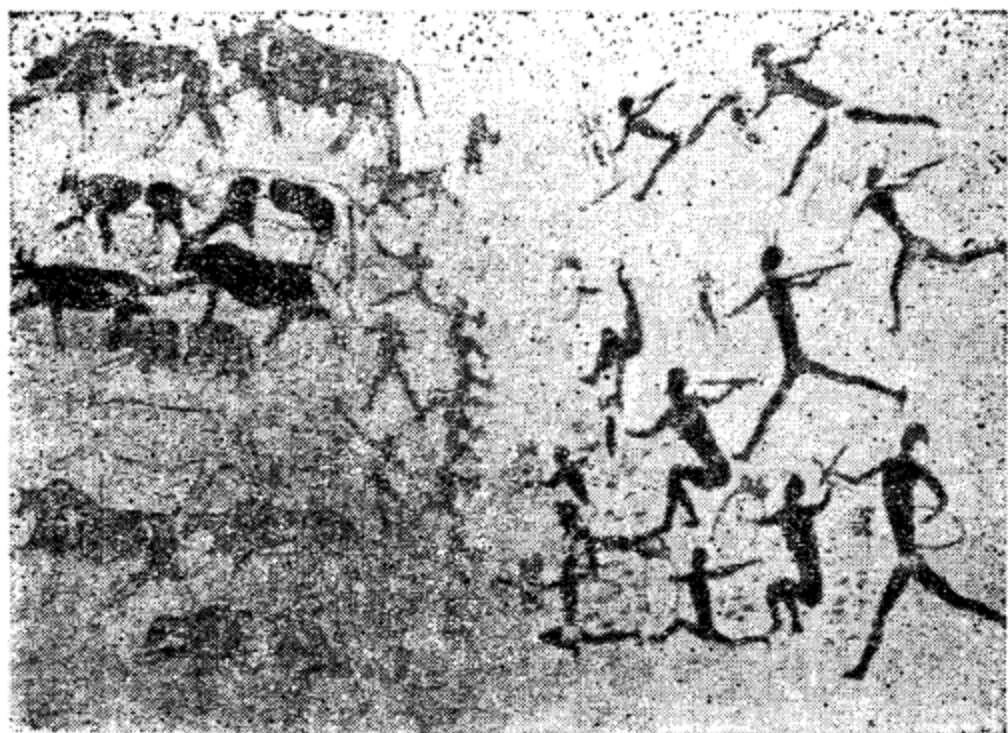
麦罗埃王国曾经和许多国家进行过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麦罗埃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鼎(现存喀土穆博物馆),这说明麦罗埃和中国也曾有过交往。麦罗埃王国在历史上约存在了一千年,在公元四世纪时为阿克苏姆国所灭。

阿克苏姆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北部,约公元二世纪建国,首都阿克苏姆城。公元四世纪,阿克苏姆是非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之一。它的国王自称“万王之王”。

阿克苏姆是个山国,高原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阿克苏姆人民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在山坡上修建了许多梯田和水利灌溉工程,种植小麦等农作物。这些梯田,经过劳动人民世代的保养和垦殖,有些一直沿用到今天。

阿克苏姆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上有金、银、铜三种货币流通。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埃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位于红海岸边的港口城市阿杜利斯,是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十分繁荣。公元七世纪后,阿克苏姆国衰落了。到了十三世纪,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一带,历史上有过一个贝纳迈塔帕王国,约存在于十三至十八世纪。人们对这个内陆王国的历史知道得不多,但它有大量的石头记录可考。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堡近郊,有一批贝纳迈塔帕王国的石头建筑物遗址,其中有一座国王的“宫殿”,约长九十一米,宽六十六米,围墙高九米,厚六米。象这样规模巨大、结构精巧的



南部非洲人的壁画

建筑物是很少见的。这反映了贝纳迈塔帕王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农田水利的建设上，南部非洲人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往往在一条河流的上游附近开一岔口，在岔口上用石头筑起一道水闸，然后让河水通过水闸流入一条高水位的沟渠，灌溉层层梯田。这种沟渠蜿蜒数里，而且其坡度设计得相当科学。

在非洲的西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个著名的古国。加纳王国位于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上游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马里和上沃尔特），约公元四世纪建国。境内盛产黄金以及象牙、皮革等。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称加纳为“黄金海岸”。

加纳王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初具规模。对外贸易

主要是向北非出口黄金，换取食盐和纺织品。沿商队来往的大道旁，出现了许多城市，如马里、加奥等。国库收入主要靠贸易税和贡赋。

加纳国王拥有二十万人的军队，其中弓箭手有四万多名。国王在接见下属时，礼仪十分隆重。据记载：国王“坐在一个大帐篷里。帐篷的四周是一些披着金制马衣的马匹。他的身后，站着十个手持盾牌和镶金宝剑的侍从。他的右边是王国里一些亲王们的儿子，他们穿著华丽，把黄金编入他们的头发中间。这个城市（国都）的总督坐在国王前面的地上，总督的周围坐着大臣们……接见是以敲打一种被他们叫着德巴的手鼓开始的”。国王还拥有巨大的财富，其来源除了税收和贡赋外，矿坑里采掘出来的大天然金块也全归他所有。据说，国王有一块金子，其分量之重，满可以放心地把马拴在上面。

1951年，在今马里首都巴马科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地方，发掘出一座古城的遗址。据研究是加纳的古都。这个古城遗址面积近一平方公里，有许多巨大的建筑物，还有一座清真寺（伊斯兰教于十一世纪传入西非）。当时城内居民约有三万人。象这种规模的城市，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还是不多的。出土文物有铁制标枪、刀子、箭头和各种农具，还有许多玻璃制的秤砣，显然是用来秤金子的。此外，还发现七十七块彩石，其中有的刻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文，有的饰有精美的花边。

十三世纪，马里王国兴起。马里原是一个小邦，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十三世纪灭掉加纳，建立了马里王国，其领土东起尼日尔河中游，西至大西洋岸。曼萨·穆萨在位时期（1312—

1337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学术文化,加强与北非各国的交往,境内的廷巴克图城是当时非洲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

马里的手工业以纺织著称,产品不仅供应本国居民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北非。

马里的航海事业也相当发达。据说,曼萨·穆萨曾派遣水手横渡大西洋,“他装备两百只船,其中装满了人,并用同样数目的船只装满了黄金和够用两年的水和食物。他对指挥官们说,在你们到达海洋那边或用尽你们的食物和水以前,不要回来。”后来,这支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强大的风浪,除了一只船折回马里外,其余都不知去向。这次航行虽然没有成功,但它较1492年哥伦布开辟从欧洲到达美洲的航路要早一百多年。

在尼日尔河的下游,还有两个著名的古国:贝宁王国和约鲁巴王国。这两个王国都以精美的青铜艺术和象牙雕刻闻名于世,早期制品可上溯到公元八至十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最初接触到这些艺术珍品时,曾竭力否认它们是出于非洲黑人之手,胡说是由很久以前到达贝宁的欧洲人制作出来的。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这类奇谈怪论很快就破产了。

正当非洲人民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自十五世纪末叶起,贪婪凶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接连闯进非洲,把野蛮的殖民主义制度强加在非洲人民头上。他们到处烧杀掳掠,搜寻黄金、象牙,强占土地、森林、矿藏,奴役非洲人民。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后,随着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大增长起来,于是,殖民主义者又干起了贩卖奴隶的罪恶勾当。结果,无数黑人被卖作奴隶,运过

大西洋，投入暗无天日的美洲种植园和矿井里。另有大批非洲黑人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开发和建设起来的家园、城池，进入热带森林和沙漠地带，重新过那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因此，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掠夺，阻碍了非洲社会的正常发展，使得近代非洲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伟大的非洲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的那天起，就拿起大刀长矛，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给了它们以沉重的打击。尤其在今天，非洲人民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已成为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主力军，长期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诬蔑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成为烈火熊熊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前线。古老的非洲大陆，正焕发出新的青春。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帝国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的西南部有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名叫阿拉伯半岛，那就是阿拉伯人的老家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

阿拉伯半岛三面环海，海岸山脉逶迤，缺少天然港口，北部与叙利亚、伊拉克之间又隔着浩瀚的沙漠。因此，阿拉伯半岛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在西部沿海的汉志地区有一条商道，北抵地中海岸，南经海路通达埃塞俄比亚、印度，远至中国。在古代，这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条重要商道。阿拉伯半岛内陆，大部分是沙漠和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有的地区甚至连续几年滴雨不下，烈日似火，因此适合游牧，不宜农耕。仅在半岛西南部的也门一带，由于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有林园之美，被称为“阿拉伯的乐园”。

半岛内陆的阿拉伯人，又叫贝多因人，公元五至六世纪时，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他们以氏族和部落为单位，骑着阿拉伯马，赶着成群结队的骆驼逐水草而居，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骆驼在贝多因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骆驼的毛、皮可制作衣服，肉、乳可充饥、解渴，粪可作燃料，甚至骆驼尿还可当作“药水”，涂在皮肤上防止虫叮蚊咬。无怪乎贝多因人自称“驼民”。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原始公社逐渐解

体。氏族贵族一般都占有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很多奴隶和牲畜，并开始奴役贫苦的牧民。

在半岛西部的汉志地区，即上面提到的那条商路沿线，有许多阿拉伯人从事商业。他们或者自行经商，或者受商队雇佣，充当驼夫、保镖和向导。商队为了安全起见，常结伴而行。长长的骆驼队首尾相连，蜿蜒行进在高山峡谷和起伏的沙丘之间。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由阿拉伯人从这条商路运到叙利亚、埃及一带，然后转运到东罗马帝国。在这条商路上，很早就出现了两个有名的商业城市——麦加城和麦地那城。麦加的居民，大都属于古莱西部落。城内有一座克尔伯古庙，庙里有一块黑色陨石，古莱西人视为神物，前往膜拜者络绎不绝。在这部分经商的阿拉伯人中间，比较早地出现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古莱西部落的上层分子，靠了经商、贩卖奴隶和放高利贷致富，成为有势力的商业贵族，一般的氏族成员被迫依附于他们，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外部的条件也加剧了阿拉伯社会矛盾的发展。途经汉志地区的那条东西方贸易通道，十分有利可图，因而引起当时两个大国的垂涎和争夺。这两个大国，一是称霸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一是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公元525年，与阿拉伯半岛一水之隔的埃塞俄比亚，受东罗马帝国的支持，入侵也门。公元570年，伊朗士兵驱逐埃塞俄比亚人，将也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也门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伊朗另外开辟了一条经由波斯湾和两河流域通到地中海的商路。商路的改变，对阿拉伯社会经济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加的商业贵族不得不大大缩减商业活动，

把资金转入牧区，放高利贷盘剥贝多因人，从而加速了贝多因人的阶级分化。许多从前以驼夫、保镖和向导为业的人，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只好靠借债度日，十分痛苦。

总之，在这个历史阶段上，阿拉伯社会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因此，阿拉伯贵族迫切要求统一各部落，建立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对内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族的侵扰，保护商路，发展商业经济，并进一步向外扩张，掠夺新的土地和财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拉伯贵族感到旧日各个氏族部落所信奉的多神教已不适用，需要有一个一神教，用它来作为一面旗帜，把分散的阿拉伯部落联合起来，同时作为麻痹和奴役广大下层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个新的一神教，就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570—632年)，他出身于麦加古莱西部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关于他的早年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出生之前，父亲就去世了。当他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后来是由其叔父抚养长大的。

穆罕默德做过牧童，没有学过文化，可能识不了几个字。十几岁的时候，他曾随同商队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经商，到过不少通都大邑，扩大了眼界，并且在那些地方直接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二十五岁那年，他和麦加的一个很有钱的寡妇结了婚。这次婚姻给他带来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因而成了麦加的闻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使穆罕默德深感阿拉伯社会危机的严重，于是他便从革新宗教入手，设法使阿拉伯贵族摆脱面临的困境。公元610年左右，穆罕默德依据阿拉伯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参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

创立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在阿拉伯文里，“伊斯兰”是服从的意思。它把原来古莱西部落的主神安拉（亦称真主），奉为唯一的宇宙之神，认为安拉是超物质的、无形无象的世界主宰，严格禁止崇拜多神和偶像。穆罕默德自称是安拉的使者和先知，是来到人间传达安拉旨意、教导人类的。伊斯兰教徒都称“穆斯林”，意思是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伊斯兰教的圣典称《古兰经》（“古兰”意为读本）。它被说成是安拉通过穆罕默德而降谕世人的，其实不过是穆罕默德言论的汇集，是后来由其弟子整理而成的。

伊斯兰教的教规主要有五条：一、除安拉以外，别无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二、每天面向麦加城克尔伯古庙礼拜五次，每星期五中午举行公众礼拜，礼拜时必须诵读古兰经；三、每个穆斯林都要缴纳其财产百分之二点五的赈济税，叫做天课，用作国库开支，修建清真寺，赈济贫穷的穆斯林等；四、每年斋月，即回历九月，每天自黎明至日落戒饮戒食；五、每个穆斯林一生中尽其可能到麦加城克尔伯古庙朝圣一次。此外，还规定了一些风俗习惯方面的戒条，如不食猪肉（据说因猪系不洁之物）、不饮酒等。

伊斯兰教宣传来世说和灵魂不死。凡是今世信仰安拉，忍耐、服从的人，死后复活可升入天堂，否则就要堕入地狱。伊斯兰教公开申明保护私有财产，承认奴隶制度，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些都反映了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本质。

穆罕默德从事传教活动初期，曾遭到古莱西部落里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甚至密谋杀害他。公元622年7月16日夜

间，穆罕默德及其门徒翻过麦加城墙，被迫出走到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历法（回历），即以这一天作为纪元的开始。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多年，信徒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公元 630 年，在“向麦加进军”的口号下，他率兵逼临麦加城下。古莱西部落的一些反对派妥协了，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且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威。麦加城内克尔伯古庙改为清真寺（天房），定为伊斯兰教的圣地，那块黑色陨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被保留下来。庙内的三百多尊偶像全被捣毁。后来，穆罕默德又征服了半岛的其它地区，大体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穆罕默德以安拉使者的名义，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集神权、政权于一身。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圣经”，而且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基本准则，人人必须遵守。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制造舆论和提供一定的组织形式的作用。

穆罕默德逝世以后，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只有一女，阿拉伯贵族便选举他最初的信徒和近亲来继承他的职位。当选者称“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人。最初的四任哈里发均建都于麦地那，并打着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幌子，大肆向外扩张。阿拉伯骑兵机动灵活，适应于在草原和沙漠地区作战。公元 635 年，号称“安拉之剑”的卡立德利用伊朗和东罗马帝国两强争斗，互相削弱的时机，指挥骑兵向北越过人迹罕至的沙漠，击溃东罗马军队，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着，阿拉伯军队挥师东进，于公元 642 年灭伊朗萨珊王朝。同年，另一支阿拉伯军队征服了埃及。

阿拉伯的对外扩张，引起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下层人民

不断爆发起义，上层贵族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公元 660 年，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摩阿维亚被立为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次年正式建立倭马亚王朝(661—750 年)。

公元七世纪末，倭马亚王朝的统治稳定后，阿拉伯贵族又大规模向外扩张。在西线，首先征服了整个北非，然后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接着，阿拉伯军队又越过比利牛斯山，侵扰法兰克王国。公元 732 年，在波亚迭战役中，被法兰克的军队击败，退回西班牙。阿拉伯帝国向欧洲内陆的扩张受到阻止。在东线，阿拉伯军队从伊朗出发，于公元 664 年占领阿富汗首府喀布尔。公元 674 年，阿拉伯军队又侵入中亚细亚，直抵帕米尔高原。到八世纪中叶，阿拉伯国家的版图，西濒大西洋，东临印度河，北界咸海，南至尼罗河，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伊斯兰教也传播到各地。在帝国境内，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受到特别尊崇，帝国还鼓励各族人入教。对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虽允许他们保持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但要缴纳人头税，名为向安拉的献礼。许多异教徒因缴不起人头税，相继改信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近邻，也有许多民族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唐朝初年，伊斯兰教经中亚一带传入中国。

阿拉伯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剥削广大农民以及奴隶(帝国境内长期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公元 747 年，奴隶出身的阿布·穆苏里姆在呼罗珊地区以减轻赋税为口号，发动起义。中亚一带的农民纷纷响应。经过三年奋战，终于推翻了倭马亚王朝，但起义成果被混入起义队伍的大地主阿布·

阿拔斯篡夺了。公元750年,阿拔斯出任哈里发,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公元762年,迁都巴格达。

阿拔斯王朝最初一百年,是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开驰道,设驿站,加强中央与各行省的联系。经济上重视兴修水利,因此农业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繁荣。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昌盛。

然而,阿拉伯帝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全是靠奴役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来实现的,因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地方封建势力日益抬头,割据称雄,帝国政府顾此失彼,鞭长莫及。到十世纪中叶,哈里发所控制的地区仅限于巴格达及其近畿一隅之地。十一世纪初,塞尔柱土耳其人崛起于中亚细亚,向西越过伊朗高原,进抵两河流域,于1055年进入巴格达。此后哈里发不再拥有世俗权力,只作为伊斯兰教的教主而存在。到1258年,蒙古军队攻入巴格达,杀死哈里发,阿拉伯帝国最后灭亡。

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留下了它的历史痕迹。在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成批成批的阿拉伯人迁徙到巴勒斯坦、叙利亚、两河流域及北非,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民族成份。伊斯兰教也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响次于基督教,而大于佛教,主要分布于阿拉伯各国、南亚次大陆及东南亚一带。

阿拉伯文化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各种各样，可是有一种数字，不需要翻译，大家都认得，那就是阿拉伯数字：0、1、2、3、4、5、6、7、8、9。

其实，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法并不是阿拉伯人首创，而是由印度人发明的。但是，将这种数字加以传播，却是阿拉伯人，以致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阿拉伯数字。

印度数字及十进位法，是公元八世纪末叶传入阿拉伯帝国的。那时，阿拉伯人用字母记数，欧洲人使用繁复的罗马数字，在数学运算上都十分不便。阿拉伯人发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逐渐替代了罗马数字。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传播，促进了数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公元八至十世纪是阿拉伯帝国繁荣的时期。当时，帝国版图西濒大西洋，东临印度河，北界咸海，南迄尼罗河，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都囊括在内。阿拉伯文化是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共同创造的，并且吸收了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除了传播阿拉伯数字及十进位法外，对代数学、几何学和三角学都有所贡献。花刺子密(780—850年)是阿拉伯的著名数学家。他关于代数学的著述于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被选为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本，一直沿用到十六世纪。

天文学是一门与数学有密切关连的学科。有些阿拉伯数学家对于天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如花刺子密就编纂过天文表。阿拉伯的天文工作者，通过设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城市的天文台，用自己制作的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日以继夜地观察天象，详细记录各种数据，不断有所发现。著名的阿拉伯天文学家白塔尼(?—929年)，经过四十一年仔细观测和精心计算，著成恒星表。后来，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哥白尼在其所著《天体运行》一书中，多处引证了白塔尼的观测数据。今天，在欧洲的各种文字中，宇宙中许多星宿的名称，以及大量天文学用语，都来源于阿拉伯语。

在化学领域中，阿拉伯人注重实验，改进了蒸馏、结晶、升华、烧焙等方法，能够制造明矾、硼砂、朱砂、酒精、升汞、硫酸、硝酸、王水、碳酸钠等化学品。今天我们通用的一些化学品的名称，如酒精、樟脑、苏打等，都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人还曾用磷作原料，制成一种闪闪发光的人造宝石。查比尔(702—763年)是阿拉伯著名的化学家，留有著作一百多种，在化学理论和实用方面均作出了贡献。查比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对欧洲的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阿拉伯的医学也比较发达。在距今一千年以前，阿拉伯

的医生在为病人施行手术时就注意消毒，使用麻醉剂。他们对于伤寒、霍乱、天花、麻疹等疾病，也有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巴格达医院院长拉齐(865—925年)是位著名的临床医师，著有《医学集成》一书。阿维森纳(980—1037年)是一位最著名的阿拉伯医学家，兼哲学家、诗人和自然科学家。他写有医学著作十六种，其中以百万字的巨著《医典》闻名于世。阿维森纳摒弃宗教迷信观念，反对当时盛行的炼金术和占星术，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生理学、病理学、治疗方法及药物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见。他特别注意切脉法，脉象的区别甚为精细，多到四十八种，而其中有三十五种与中国晋代太医王叔和的《脉经》一书记载相同。《医典》一书代表了当时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而阿维森纳则被誉为“医中之王”。阿维森纳的《医典》于十二世纪译成拉丁文，影响欧洲医学界达数百年之久。

阿拉伯文学也是丰富多采的。阿拉伯人喜爱诗歌，许多行吟诗人，没有进过学校，却能吟诵美丽动人、热情奔放的诗篇。每年庙会期间，还举行赛诗会。民间故事在阿拉伯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著名的是《安塔拉传奇》，它主要反映阿拉伯帝国形成以前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此外，有些韵文故事配以音乐曲调，每章只讲一个故事，很象中国的弹词和鼓儿词。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文又译作《天方夜谭》)，以一本古老的波斯故事集为蓝本，吸取了印度、希腊、埃及等国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轶闻趣事，经过几百年的修改补充，到十六世纪最后定型。《一千零一夜》被广泛地译成各种文字，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阿拉伯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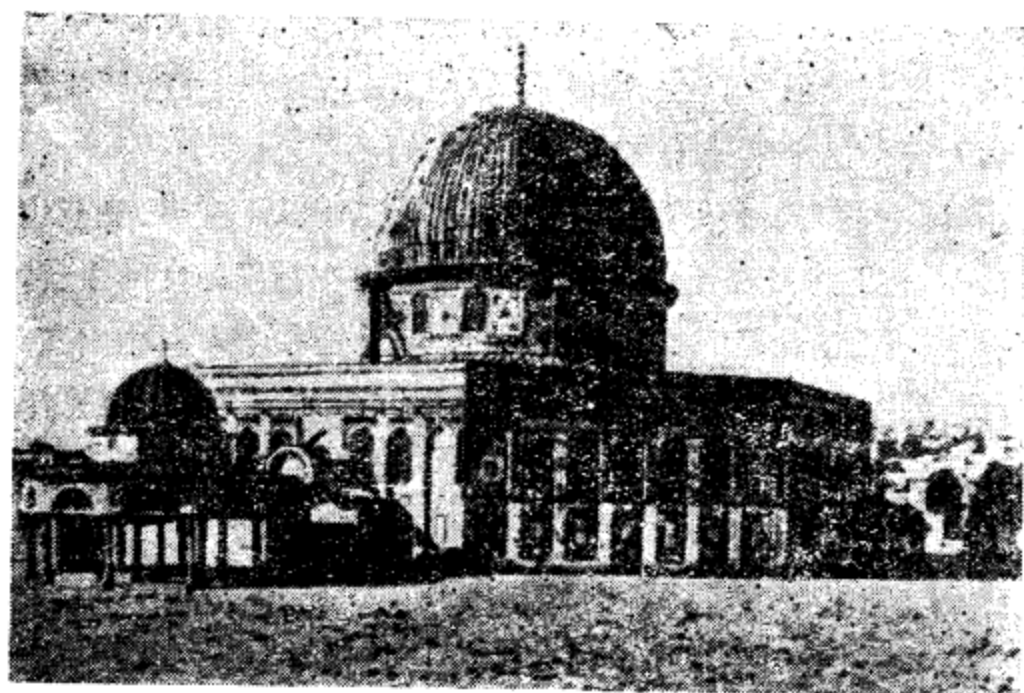
展影响较大，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等作品，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都曾借鉴于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共有二十八个字母，音节优美。八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末叶，阿拉伯文是国际性的语言，在那个时代，凡是西方人要受高等教育，必须学习阿拉伯文。今天，阿拉伯文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语言，而波斯文、阿富汗文、印度的乌尔都文，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

阿拉伯的历史学，最初是以记载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事迹为主，后又出现了编年史和人物传记。马苏第(?—956年)是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曾游历波斯、印度、锡兰、中国、中亚细亚等地，著有《黄金草原》一书。该书共三十卷，内容广泛，除阿拉伯古代史外，还涉及到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马苏第的这部巨著和其他阿拉伯史籍，为研究阿拉伯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阿拉伯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阿拉伯的使者、旅行家和商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东半球，因此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是阿拉伯的大旅行家，曾游历中国及东非海岸、西非、西亚、印度等地。

耶路撒冷有一座被称为“沙漠中的圆顶”的清真寺，那是一座著名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由于伊斯兰教正统教派反对崇拜偶像，禁止在雕刻绘画中表现人物和兽类，所以限制了雕刻生物艺术的发展。然而，独具匠心的阿拉伯工艺美术者，运用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和阿拉伯字母，在建筑物的装饰上雕绘出精致优美的花纹，别具一格。



耶路撒冷清真寺

阿拉伯人在文化上的贡献，还表现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方面。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唐朝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陆路主要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可直达中国的泉州等港口。不少阿拉伯人留居中国，有的还出任官吏。中国人也有到阿拉伯居住的，如唐朝的杜环留居阿拉伯十余年，归来著有《经行记》。公元八世纪中叶，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传入阿拉伯，然后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阿拉伯文化向西欧传播，主要通过西班牙。西班牙科尔多瓦城，是阿拉伯文化的中心之一。城里有图书馆七十所，其中一所藏书达四十万册。科尔多瓦大学是一座享有国际声誉的综合性大学，开设有法学系、天文学系、数学系、医学系等。学生不但有来自西班牙和阿拉伯各地的，还有来自欧洲其他

国家的。科尔多瓦被人誉为“世界的宝石”。

总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阿拉伯文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当然，阿拉伯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不能兼收并蓄，必须加以批判地继承。

日本大化革新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一个群岛国家，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组成，西隔日本海、黄海、东海与亚洲大陆相望。

公元一、二世纪，日本的原始公社制逐渐解体。公元三世纪，在今本州奈良一带，出现了一个名叫大和的奴隶制国家。至公元五世纪，大和征服了日本列岛上的各个“小国”（实为部落或部落联盟），大体统一了日本。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天皇。

在征服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过程中，皇室和贵族奴隶主把许多异族（尤其是日本的少数民族虾夷人、熊袭人）俘虏贬为奴隶。这类奴隶多数给奴隶主当奴婢，从事家内劳役，甚至用来殉葬，用于生产的不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征服部落的血缘关系不易打破，征服者不能把他们作为个别奴隶加以奴役，只得保留原来的部落组织，称为部，部内的人称为部民。征服者对部民进行集体奴役。有些归化人，主要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也被统治者强制编成部，成为部民。此外，还有些少数平民，因触犯了统治阶级，而被贬为部民。部民集体住在奴隶主的农庄上进行生产劳动。从事农业劳动的称为田部、舂米部，从事手工业或其他职业的总称为品部，在品部

里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锦织部、鞍部、锻冶部等。部民有少量的财物和生产工具，有自己的家庭，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凭借对部民的人身支配权力，无限制地剥削部民，也可以任意将他们赠送、贡纳。因此，部民实际上处于一种奴隶地位。部民制，是日本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室在全国各地广置农庄，称为屯仓，地方奴隶主也设置许多农庄，称为田庄。屯仓和田庄里的主要劳动者是部民。同时，皇室和贵族奴隶主还大肆兼并平民的土地，致使许多平民“全无容针之地”，经济地位每况愈下，甚至沦为部民。

在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广大部民及奴婢的生活十分悲惨。日本史籍《日本书纪》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载：“五谷不登、百姓大饥”、“老者啖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与母子共死”，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富有斗争精神的广大部民及奴婢，以各种形式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或者成群结队逃亡山林；或者抗缴赋税；或者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到了公元六世纪，部民制已走到了尽头，整个日本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

在部民制衰落的同时，封建地主阶级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进而要求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但是，垂死的奴隶主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大贵族奴隶主苏我氏，控制了朝廷的实权，顽固维护腐朽、没落的部民制和贵族奴隶主的世袭特权。

公元593年，苏我氏拥立自己的甥女为推古天皇，由甥孙圣德太子（593—621年）摄政。圣德太子对操有实权的苏我氏表面妥协，暗地里积极活动，进行改革。公元603—604年，

圣德太子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进行了有名的“推古朝改革”。

“冠位十二阶”规定官阶为十二等级，不可世袭，以限制贵族奴隶主的特权。“宪法十七条”是管理国家的根本纲领，目的在于提高皇室威权，强调皇权至上。

不过，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关键是他没有触动部民制。但就连这一点改革，也为苏我氏所不容。公元622年，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猖狂反扑，扼杀了革新事业。

在圣德太子之后，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继续推进革新事业。他们吸取了圣德太子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夺取贵族奴隶主的政权，才能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并且为此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公元645年6月12日，文武官员，包括大贵族奴隶主苏我入鹿，在太极殿中接见“三韩”^①的使者。接见刚开始，中大兄命令将宫门全都关闭，亲自挥剑刺杀了苏我入鹿，在场的其他贵族奴隶主吓得胆颤心惊，纷纷慑服。

同时，中大兄以吉野法兴寺(在今奈良县)为据点，组织军队，严加防范。苏我入鹿的父亲在走投无路之中，于13日自杀身死。

14日，新兴地主阶级组成了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的新政权。中大兄的舅舅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

公元646年，新政权颁布了一系列革新诏书，对社会的经

^① 三韩是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

济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即所谓大化革新。

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封建土地国有制。贵族奴隶主的私有土地一律收归封建国家所有，部民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公民。政府对公民按人口颁给“口分田”，男子得田二段（约合二十三点八公亩），女子为男子三分之二，私奴婢给田为良民的三分之一，每隔六年作一次调整，称为班田收授。受田人要向国家交纳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名为租、庸、调。租，即田租，每段交稻二束二把（一束为十把，一把为用手抓满三次的稻谷）。庸，就是力役，每人每年十天（经常延至二十天），可用实物代替。调，按地方土产征收，一般交纳布或绢，每户一丈二尺。新政府还奖励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这样，部民成了“班田制”下的农民，有了自己的私有宅地和园地，可以使用山林池沼，承担固定的徭役和地租，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来了。

政治上，废除贵族奴隶主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各级行政组织，由国司、郡司、里长进行治理。

大化革新后，日本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趋于最后崩溃。但是，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对大化革新进行了顽强的反抗。早在公元645年9月，奴隶主贵族就曾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新政权，中大兄立即出兵予以镇压，才解除了危机。公元658年，以苏我赤兄为代表的贵族奴隶主挑动有间皇子谋反。后来，苏我赤兄眼见形势于己不利，大耍两面派手法，摇身一变，反向中大兄告发有间皇子，骗取中大兄的信任。中大兄镇压了有间皇子，但苏我赤兄却因此

获得了中大兄的重用，在革新派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公元668年，中大兄即天皇位，称天智天皇。公元671年，任命其子大友皇子主持朝政，由苏我赤兄辅佐。大友思想上是倾向于奴隶主贵族的。

公元671年底，中大兄病死，大友皇子继位，政权落到了奴隶主贵族手里，革新事业出现了反复。

但是，封建制度已逐步形成，旧势力终究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以中大兄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为首的革新派继续进行改革。公元672年，大海人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7月22日，大海人与大友的军队决战于瀬田（今滋贺县）。大海人的军队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地全歼敌军，粉碎了贵族奴隶主的反动势力，大海人皇子继位为天武天皇。

此后，革新事业持续向前发展，至公元701年（大宝元年），文武天王修成《大宝律令》，把大化革新的成果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这样，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革新才最后完成。

大化革新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就此得到真正的解放，而是被套上了一副新的枷锁，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逐渐展开了，成为推动封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遣唐使

——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上面这首绝句，是我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听说其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汉文名字叫“朝衡”，亦作“晁衡”）在归国途中遇难时写下的悼诗。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唐学生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于公元717年随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来华留学，因学习成绩优异，通晓中国典籍，长于诗文，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重用，并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东归，中途在海上遇到大风暴，当时传说他已经葬身波涛了。其实，他漂流到安南（今越南）获救，复于公元755年辗转来到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后即留仕不归，逝世于中国。李白这首流传甚广的诗，虽系因误传而作，也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两千

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友好往来的历史。

从遥远的古代起，东亚大陆和日本之间就有交通往来。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年），中国已经和日本有交往了。《汉书·地理志》中说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我国史籍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载，但这里所说的“国”，实际上是指部落或部落联盟。

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某一部落的酋长遣使来中国通好，光武帝称之为“汉委（倭）奴国王”，赠以印绶（shòu 受）。光武帝所赠的那一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筑前（今福冈县）发掘了出来。

公元三世纪上半期，即当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日本已由氏族公社发展为奴隶制国家，与统一中国北部的魏有使节往来。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当时日本分为一百多个小“国”，其中有二十几个“国”是在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统属之下。卑弥呼于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第一次遣使来魏通好，赠送方物。魏明帝回赠了刀剑、铜镜、锦绣、金银等物，并派官员陪送日使回国。在这以后的十年中，邪马台国又先后三次遣使来魏。《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还说：“卑弥呼以死，作大冢（zhǒng 肿），殉葬者奴婢百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日本奴隶制度的残酷。

公元三世纪，中国的文字和书籍开始传入日本。于是日本人便把汉字当做记事抒情的工具。最早的日本书籍，完全是用汉文写成的。

公元四至六世纪，即当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有

不少中国劳动人民陆续东渡到日本。他们之中有农民、织工、陶工、铁匠、木匠、石匠、武器匠，带去了中国农业和工艺方面的知识，以及育蚕缫丝的方法。除了这些工匠以外，日本还特别派遣使臣来中国聘请缝工女，于是中国的缝纫和服装式样传入日本。

公元五世纪后半期，日本列岛上的那些小“国”由互相征伐而趋于合并，出现了大致上统一的大和国家，并与中国南朝的刘宋经常有使节往来。《宋书·蛮夷传》中记载：公元478年（宋顺帝昇明二年），倭国王遣使上表曰：“自昔祖祢（mí迷），躬擐（huàn患）甲冑（zhòu宙），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一段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这封国书是用优美畅达的汉文写的，可见当时日本已经有人精通汉文了。

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近三百年南北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阶段，新兴的日本封建主急于要从中国吸取一套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于是有计划地经常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中国访问、学习。

公元607年，中国隋炀帝在位时，日本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臣，携国书来中国，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日使返国，回访日本，受到日本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在这以后，日本使臣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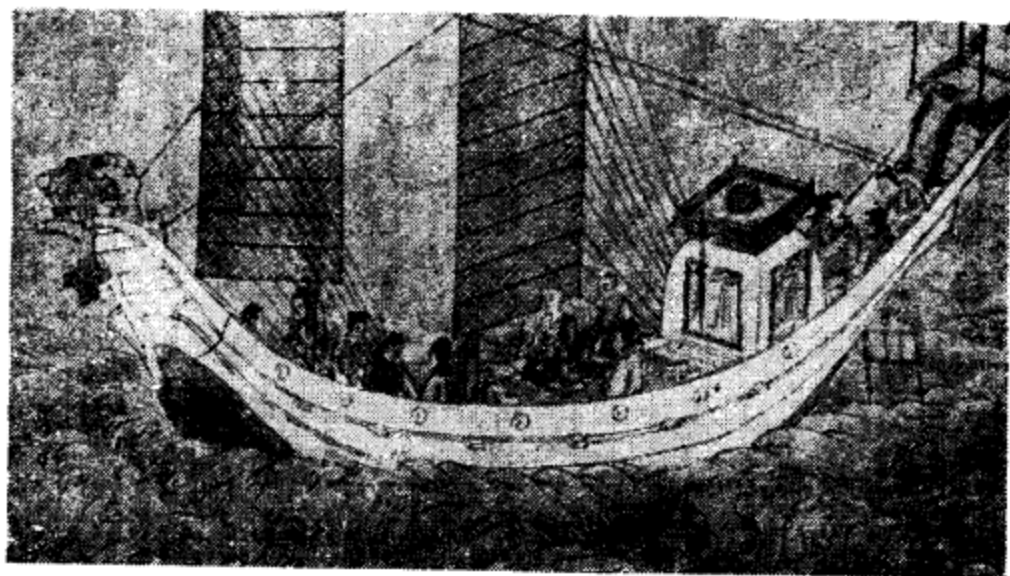
便络绎不绝了。

公元 618 年，唐朝取代了隋朝。由于隋末农民起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呈现出高度的繁荣。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中亚诸国、南洋各地、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的商人和使节，均汇集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日本陆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吸收中国先进的文化成果。

在唐朝开国之际，已经有一批日本学生、学问僧在中国学习，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有一定的了解。公元 623 年，从中国留学回去的人就上书日本天皇，说中国是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大国，日本应当经常与中国往来，并任用留唐学生来革新日本政治。于是，在公元 630 年，日本派出了以犬上御田锹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来中国访问。而从中国留学归国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mín 民)等人，都竭力主张日本应当取法于中国，弃旧图新。他们成了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 645 年，日本新兴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代表奴隶主贵族势力、盘踞要津的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迁都难波，并仿照中国建元的办法制定年号为“大化”。在大化年间，日本实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大化革新”。从此，日本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

大化革新后，日本的新兴地主阶级不断派遣唐使来中国。



遣唐使乘坐的船舶

遣唐使的规模，起初并不大，每次约在百人左右，及至公元八世纪初，它就大为扩展，人数最多时有五、六百人。遣唐使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工等各方面人士的考察团，其中半数以上是舵师和水手。官员有大使、副使、录事等。此外，有留学生、学问僧、医生、译员、商人以及各种工匠。当时的海舶还是较小的木制帆船，最大的也只能乘一百五、六十人。较大使团往往需要分乘四艘海舶前来，因此在日本诗歌中，遣唐使的船队常被称为“四舶”。

遣唐使来华的航路，前后有所不同。早期的遣唐使多走北路，即从九州岛北面渡过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岸北航，再沿着辽东半岛西航，在山东半岛东端的登州或淮河流域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登陆。北路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航行，比较安全，惟需时较久。后来，遣唐使多改走南路，即从九州岛西航，横渡浩瀚的东海，在长江下游的扬州或杭州湾口的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南路是捷径，顺风十日可达，但风波

之险远甚于北路。当时航海技术不发达，船身小而且不坚固，在海上遇到风暴，常有覆没者。然而，中日两国人民为了寻求友谊，涉风波之险，彼此往来不绝。

遣唐使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和礼遇。他们一到达中国港口，即由当地的地方官负责招待膳宿，并免费提供交通工具把他们送到长安。在那里，他们常常能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例如：唐玄宗曾接见于公元750年来中国的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并且命令画工为之画像，留作纪念。遣唐使返国时，唐朝也往往任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

随遣唐使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在沟通中日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留学生和学问僧，现在有史籍可考的有一百五十多人。留学生多入唐朝的国子监（当时最高学府）就学，其中有人留居中国达数十年之久。他们精通汉文，熟习中国的典章文物，如阿倍仲麻吕。其他如吉备真备、大和长冈、橘逸势、菅原道真等，也都以通晓中国学艺知名。学问僧多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名山古刹，在学习佛教经典之外，也经常注意一般文化。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在返国时，带回大量的中国书籍。

遣唐使也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他们利用来华之便，带来日本的物产，而于返航时把中国的各色货物带回去。当然，遣唐使并不是当时中日贸易的唯一渠道。近来曾在日本各地发现唐朝的钱币“开元通宝”数万枚。在我国西安的唐人墓葬中也曾发现日本的银币，这说明当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中国学者也有到日本讲学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688—763 年)。鉴真原为扬州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名僧,他熟习佛教经典,并精于医药学。公元 742 年,鉴真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不顾海上航行的危险,率领弟子乘舟前往,但先后五次均被风浪所阻,未能到达。然而,他坚韧不拔,历尽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在公元 753 年乘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的船安抵日本。(鉴真是和阿倍仲麻吕同时东渡的,但不在同一条船上。途中遇到风暴,阿倍仲麻吕所乘的那条船飘流到安南,鉴真所乘的那一条船却平安到达日本。)鉴真的到达,受到日本人士的热烈欢迎。他被安置在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传授佛经和中国的医药学,并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式在奈良兴建了一座宏大的寺院——唐招提寺。鉴真旅日十年,在沟通中日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逝世后他的遗体就葬在唐招提寺。

根据史籍记载,在公元 630 至 894 年这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十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一次是迎接上一次的遣唐使回国,有三次是伴送唐朝派往日本的使节返唐,有两次在任命后未能成行,正式来中国访问的有十三次。唐朝末年,日本停止派遣唐使。但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频繁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经过千百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历法、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医药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典章制度、衣冠文物,都被介绍到日本。公元五世纪,日本出现了以汉字作音符的“万叶假名”。公元 712 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书写,编成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古事记》。公元 720 年,日本仿效中国史书体裁写成《日本书纪》,这部书虽

是用正规的汉文书写，但读法却按日语读。相传留唐学生吉备真备采用汉字的偏旁作“片假名”，留唐学问僧空海采用汉字的草书体作“平假名”，日本开始有了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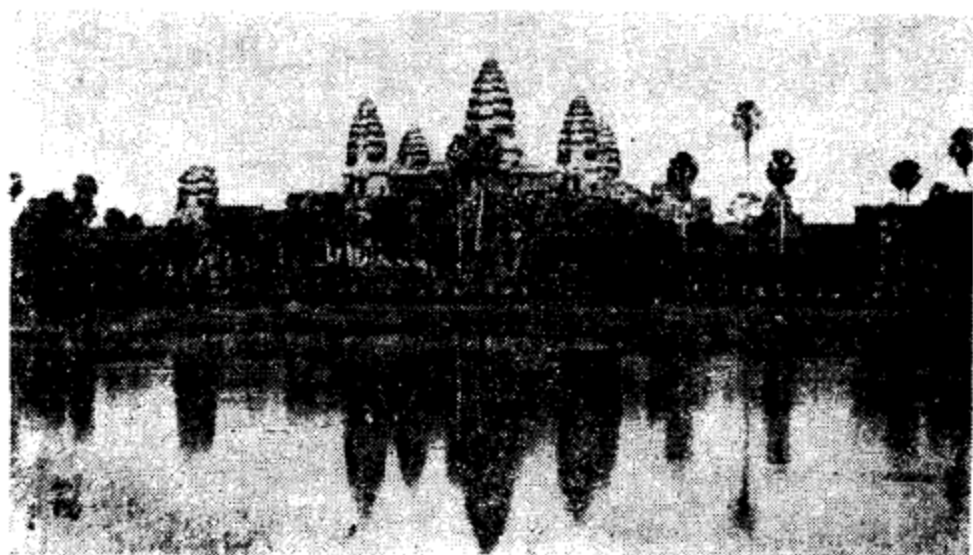
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从1894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吴 哥 窟

——柬埔寨的象征

柬埔寨暹粒城以北不远，有一片茫茫林海。然而，引人注目的，并不是那参天的古木，交错的修藤，和那热带的珍禽异兽，而是隐蔽在里面的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吴哥。当你走进这片林海深处，五座莲花似的中央宝塔，远远映入眼帘，蔚为壮观。这是吴哥古迹中最著名的一组石构建筑——吴哥窟。

整个吴哥窟虽然早已荒废，只遗留下分散的大小六百多



吴 哥 窟

个建筑物，但它那宏伟的石构建筑和精美的石刻浮雕，仍不失为古代东方的奇迹之一。吴哥窟是柬埔寨民族的光荣和象征。

柬埔寨位于印度支那南部，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家。柬埔寨国家的名称，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史书上。汉代称扶南，隋代称真腊，唐代称吉蔑，元代称甘孛智或激浦只，明代万历年间始称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高棉族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此习惯上又称之为高棉。

吴哥是公元九至十五世纪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分为大吴哥和小吴哥。大吴哥，又称吴哥通，是指吴哥城。小吴哥，又称吴哥窟，专指吴哥地区最著名的古迹吴哥石刹。

公元九至十一世纪吴哥王朝的早期建筑，大部分已毁坏了，仅残留个别建筑物。今天所见吴哥城和吴哥窟，均为吴哥王朝的后期建筑。吴哥窟建于十二世纪前半期，吴哥城建于十二世纪后半期。有关当年吴哥窟和吴哥城全貌的记述，现存唯一可靠的文献资料，是我国元代温州人周达观所写的《真腊风土记》。此书也是研究柬埔寨古史的珍贵史料。周达观于1296年随元朝使臣出使柬埔寨，在吴哥居住一年多，回国后写成那本游记。其中描绘了吴哥城和吴哥窟的宏伟建筑，并对柬埔寨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地理、交通、物产、贸易等作了详细的记述。

周达观一行于1296年3月24日，自温州港乘船启程，沿近海南下，经北部湾，过交趾，于4月18日到达湄公河口附近的占城（今越南胡志明市一带）。然后换船溯湄公河、洞里萨

河而上，入洞里萨湖（金边湖），于8月到达吴哥。

周达观所见的吴哥城，绿树成荫，街道宽阔，行人熙熙攘攘，相当繁华。整个城池呈正方形，周边约二十余里。城墙用石块（有的石块达四吨重）垒成，高约两丈。城门也是用巨石垒成，共有五座，东面两座，其它三面各一座。每座城门上有五个面带笑容的石头人像注视着四方。城门两侧各有一只巨大的三头石象。城墙外有护城河，宽达三十多丈。城门外有大石桥跨越在护城河上。桥上有五十四个面目狰狞的石神分别跪坐石桥两旁，石神的手上都抓着一一条石雕大蛇，首尾相连，成为栏杆。

城中心有一名叫巴戎寺的石塔群。石塔群的中央是一座饰金石塔，高十余丈。塔基四周有长方形的石砌回廊，分内外两层。回廊壁上有精致的浮雕——内回廊主要以神话故事为题材，外回廊多表现战争、耕耘、捕鱼、狩猎、集市贸易、婚礼、杂耍等场面。在中央金塔周围列有五十多座石塔，每座塔四周都刻有微笑着的人头像。据说，这是国王显示自己统治权威的象征。

王宫座落在巴戎寺以北约两里处，正门向东。宫殿全部是木结构。按柬埔寨传统宗教观念，只有神能住石头建筑，凡人只能住用木料或竹子建造的房屋。大殿的圆柱上都有佛像浮雕。议事厅的窗棂（líng 凌）镶金，窗两旁方柱上挂着四五十面镜子，厅内金辉夺目。走下议事厅台阶，前面便是广场，有小石塔十二座。整个王宫富丽堂皇。

出吴哥城南门约一里路，便是吴哥窟。它原是高棉国王闍耶跋摩二世的陵墓，周边约十一里。吴哥窟最外面，有宽达

五十多丈的护城河环绕。河内岸有石砌的内外墙各一道。外墙的西面有一门，门楼上有三座石塔。一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庭院，可容纳几千人。然后通过一条长达一百余丈的大道，直达内墙的进门。进内墙后迎面是建于三层台基上的五座尖塔，中间一塔超出地面约二十丈。第二层台基的四角又各有一小塔。三层台基的四边都有石刻的门楼和回廊。回廊高约七、八尺，总长达二百四十余丈。

吴哥窟的回廊集中了高棉浮雕艺术的精华。浮雕的题材有神话故事、战争、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等。画面层次分明，形象逼真。比如，在一组以战争为题材的浮雕中，有的描绘高棉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场面，有的描绘高棉水师驾驶着多桨战船在洞里萨湖破浪前进的图景，还有的描绘高棉将领骑着大象指挥战斗的神态。这些浮雕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再现了当年高棉将士为保卫祖国而勇往直前的生动形象。

吴哥窟的各幢建筑物之间都用石阶梯或走廊连结起来，两边到处都镌(juān 娟)刻着玲珑的莲花形石饰和雕像，估计有一万八千多种。吴哥窟布局和谐，设计紧凑。吴哥窟体现了高棉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无穷的智慧。

吴哥城东北四十多里处，另有一座精美的石塔寺庙，名叫班台斯利寺。它建于十世纪末，是吴哥王朝早期建筑中保留下来的较完整的建筑艺术。寺的中心是三座并列的石塔。因为寺中有许多妇女雕像，因此又叫女王宫。寺内雕刻丰富多采，细腻优美，有人称之为“丛林的珍珠”。

吴哥城东约十里处，有一巨大的人工湖，取名东池，又名东巴莱湖。湖的周长达一百里。湖中有一小岛，岛上有石塔

寺庙。吴哥城北约五里处，另有一个长方形的人工湖，取名北池。湖中的小岛上也建有石塔寺庙。两湖都用于蓄水、灌溉，以利农业生产。

吴哥城郊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沃土，禾苗常绿，村落星罗棋布。这一带及整个洞里萨湖滨地区，是柬埔寨重要的农业区域，主要作物为水稻，一年可三、四熟。吴哥城的商业，尤其是集市贸易相当兴隆。市场上除本地的农副业和手工业产品而外，还有中国的丝绸、漆盘、瓷器、火药、铁锅、木梳等。由此可见当时柬埔寨经济发达的情况。

吴哥窟和吴哥城反映了古代高棉历史的一页。在吴哥王朝之前，从公元一至六世纪，高棉民族居住在柬埔寨的北部，政治上依附于扶南王国（位于柬埔寨南部和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公元六世纪中叶，高棉脱离扶南而独立，称真腊。七世纪中叶，真腊进而兼并扶南。公元八世纪末，真腊曾一度被爪哇王国打败，国王被杀，王子被俘，部分领土被吞并。公元九世纪初，王子从爪哇获释归来，重建高棉王朝，自称阇耶跋摩二世。他第一次把王都建立在吴哥地区，开凿了人工湖，修浚了暹粒河，发展农业生产。吴哥王朝建立之后，真腊逐渐强盛起来。

十二世纪，真腊王国疆域广大，势力达到印度支那中部。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5年）动用三十万民工和奴隶，花了十年时间，从离吴哥一百四十里外的古伦山采运巨石，修筑城墙、石塔、寺庙，扩建吴哥城和吴哥窟。阇耶跋摩七世还修建了许多宽阔的道路，把吴哥城同各省首府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阇耶跋摩七世连年大兴土木，肆意挥霍，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据碑文记载，为建造太后寺庙，花费了黄金和白银十六万两，珠宝四万多颗。结果消耗了真腊的国力，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外族也不断入侵。他死后，真腊开始衰落了。

吴哥王朝时期，真腊保留大量奴隶制残余。当时除国王、官府拥有大批奴隶外，贵族地主和富豪都拥有家庭奴仆，多的有一百余人，少的也有一、二十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农民，深受国王和贵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十二世纪中期，真腊农民曾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杀死了国王，沉重打击了吴哥王朝的统治。

1295年，一个宫廷贵族发动了政变，夺取了王位，称因陀罗跋摩三世。新王朝建立后，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放弃了宫廷的部分特权，停止了大规模的寺庙建筑。周达观一行出使吴哥时，正值这位新王登极不久。

十四、十五世纪，西面的暹罗人接连入侵真腊，掳掠人口，抢劫财富，使吴哥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吴哥王朝被迫放弃吴哥，于1434年迁都金边。此后，吴哥城和吴哥窟又多次遭到战争的蹂躏和洪水的袭击，逐渐无声无息地湮没在丛林之中了。

十八世纪中叶，柬埔寨人民重新发现了吴哥古迹，妥善地加以修复和保护。但是，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柬埔寨，一再盗窃和破坏吴哥的珍贵文物。柬埔寨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東两国自古以来友好相处，两国人民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中国史籍《后汉书》记载，公元 84 年（汉章帝元和元年），柬埔寨曾遣使送来犀牛、白雉等珍贵动物，作为友好交往的礼品。公元 226—231 年间，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柬埔寨，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臣到柬埔寨。归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可惜已失传。康泰著《吴时外国传》，其片断散见于《水经注》和《太平御览》。从这以后，中東两国的友好往来便不绝于途了。

古代中西海上交通

在那碧波万顷的南海海面上，星罗棋布的珊瑚岛礁，宛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点缀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南疆。这些岛礁按其地理位置，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统称为南海诸岛。在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辛勤的开发和经营，并由中国政府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西汉时期，由于中外友好往来的需要，开辟了通过南海至东南亚及印度的海上航路。

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年），中国人乘着装载黄金和丝绸的海船，从广东的徐闻、合浦出发，穿过南海，经印尼、缅甸，远航至印度东海岸，在那里“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差不多同时，印度人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运货到中国来进行贸易。

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怎样才能扬帆万里，远涉重洋呢？

这首先需要建造能征服惊涛骇浪的海船。中国是具有悠久造船历史的国家。远古时代，中国劳动人民看见树叶浮于水面，独木顺流而下，受到启示，于是便“剡(kū枯)木为舟，剡(yǎn演)木为楫”。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造船工

场。船舶不但用于水上运输,而且用于海战。有一次,吴国和齐国打仗,吴国就是从江苏下海打到山东去的。秦汉时代,统治阶级重视“耕战”,造船业得到迅速发展,到打开中印海上航路的汉武帝时,已能建造容纳一千人的楼船。它有稳定航向的“桅”(同舵),有起动船舶的“柁”(zuó 昨),有推动船舶前进的“橹”、“楫”和“帆”。这类大型船舶,具有坚固的船体结构,良好的航海性能,为持续远航提供了条件。

船舶航行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全靠风力推动。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了太平洋季候风(信风)的规律。在夏季,海洋上气压高,亚洲大陆气压低,风从海洋吹向大陆,形成西南季风。到了冬天,亚洲大陆气压高,海洋气压低,风就又从亚洲大陆吹向海洋,形成东北季风。冬天,从中国沿海出发的海船,利用东北季风,通过南海,到印尼,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达印度和斯里兰卡。然后再候得西南季风,从原路返航。如果对季风的规律掌握不好,中途就要耽误时间,甚至还要“苦逢风波溺死”。例如,公元411年9月,到印度去取经的法显和尚,从斯里兰卡搭商船回国。由于这时已是西南季风之末,东北季风将起,因此出发后风向不定,费时三个多月才航行到爪哇,并不得不在爪哇滞留至次年5月,待西南季风再起,才改乘另一艘商船,重新踏上回国的旅程。

中印海上航路开辟之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同时由阿拉伯人作中间人,也间接地沟通了中国同伊朗、阿拉伯和埃及的海上交通。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南临印度洋,

西界红海，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早在公元前几世纪，阿拉伯人民就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奥秘。他们每年于12月中至下年2月底乘东北季风南下东非，然后于3月至9月又顺西南季风返航故国。阿拉伯人也航行于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斯里兰卡之间。南阿拉伯的港口是兴旺的商业区，不仅拥有熟练的水手，而且出现了不少“多财善贾”的商人。他们从印度将东方各国的货物，包括中国的丝绸、印尼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运到红海的苏伊士，然后由骆驼运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转输欧洲。他们又将西方的货物以及非洲的象牙和香料，贩运到印度，再转输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公元45年，一个名叫希帕努斯的罗马水手，探知了印度洋信风的奥秘。从这以后，罗马商人就接连出现于印度洋上。他们沿着阿拉伯人开辟的航路，从埃及出发，航行于印度洋上，“与安息（伊朗）、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每年约有一百多艘商船来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同亚洲商人交易。有人估计，罗马帝国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输出的货物，每年至少要达到一亿赛斯太斯^①。除阿拉伯人外，印度人也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中介贸易。

在汉代，中国同西方的罗马帝国遥遥相对，汉代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或黎鞬。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张骞通西域之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与罗马帝国有了间接的往来。公元166年，一个乔称是罗马帝国使者的叙利亚商人，经海路到达印度支那，然后从那里来到中国，向汉朝赠送了“象牙、犀角、玳瑁”等物，第一次实现了罗马同中国的直接交往。三国和东

^① 古罗马货币名称。

晋时期，罗马帝国陆续遣使中国。公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也是取海路来吴国贸易的。孙权待他以上宾，询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自秦论访问中国以后，吴国派往扶南等国的外交官员康泰，就曾注意有关大秦和通往大秦海路的情况，并在所著《吴时外国传》和《扶南传》中作了记述。

中国船舶何时绕过印度，直达波斯湾的呢？阿拉伯历史学家说，公元五世纪常常看到中国船舶来往于幼发拉底河上。不过，直到公元七世纪以后，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才频繁起来。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是当时世界贸易大都市之一。码头上帆樯林立，长达数里。中国船只比较大，特别引人注目。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和纸张，很受阿拉伯人欢迎。在喧闹繁华的巴格达市场上，有专门出售中国货物的店铺，名为“巴杂儿”。

唐宋时期，中西海上交通盛极一时。广州、杭州和泉州，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南宋时，泉州同许多国家有贸易关系，侨居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其中以阿拉伯人为最多。外侨居住地叫“蕃坊”，外侨子弟学习的学馆叫“蕃学”，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缗，占当时朝廷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访问中国，盛赞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或径称为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也”。

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宋时期不断改进。远航海船一般采用尖底造型，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多帆樯。由于设计优良，配备齐全，船身巨大，“不忧巨浪”，因此深受各国的赞赏。外国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都改乘中国海船来往

于波斯湾和南海之间，这类海船当时有一个专门名称，叫“香料胡椒船”，或者称为“香舶”。因为香料是当时中外贸易的大宗货物。中国商船不仅从印尼的马鲁古进口香料，而且还转运到其他国家，马哥·波罗甚至说：“香料交易，全由中国人为之”。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舱内出土的遗物很丰富，其中以香料为最多，有香料木四千七百多斤，以及胡椒、乳香、龙涎、朱砂、槟榔等。

中国不仅造船技术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是首创用指南针导航的国家。指南针又叫罗盘针，利用磁针在地磁场中能定向的原理制成。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用“司南”辨认方向。“司南”便是指南针的雏形。后来经过改进，将磁石磨成针，放在手指上或碗边上来确定南北。北宋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1030—1093年)觉得上述办法仍不完妥，磁针在摇摆不定的船上容易滑落，于是他建议用蜡将单线缀在针腰，这就是最早的罗盘。因此，到了宋代，中国海船便使用罗盘测定航向了。宋代的朱彧记载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后来，指南针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罗盘用于航海，有力地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中国同东非直接的海上交通，开始于唐代。在这之前，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都是通过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转手。公元977年，阿拉伯使节访问北宋朝廷，有一随员“目深体黑”，这可能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黑人。1071年和1083年，桑给巴尔(层檀国)的使节，经阿曼、南印度和苏门答腊，两度访问中国。这是东非国家同中国建立直接友好往来的开端。在宋

代，中国海船在印度洋上的航程也继续延伸到了亚丁湾和东非。元代大旅行家汪大渊，大约于1329年访问了桑给巴尔，归国后著有《岛夷志略》一书。中国以自己出产的金、银、瓷器、丝绸，换取东非索马里及桑给巴尔一带出产的香料如乳香、肉桂，龙涎，以及象牙、犀角等。近几十年来，在东非海岸，北起索马里，南至莫桑比克，发掘出大批中国铜币和瓷器碎片，其中少量是唐朝的，大量是宋元明三朝的。这些文物，是古代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1405至1433年，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几国，是古代中西海上交通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船队常拥有六十多艘大船，连同中小船只，共有一百多艘。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明尺，下同），阔十八丈，可乘四、五百人至一千人。整个船队载员最多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船队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航行，浩浩荡荡，绵延数里，蔚为壮观。其航行路线是，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印度支那、印尼，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然后或横渡印度洋，直抵东非海岸；或进入阿拉伯海，经波斯湾及亚丁湾，抵达东非。随同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记载说：“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zhuó 茁）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造船及航海技术之发达。

中西海上交通的开辟，在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通过这座友谊的桥梁，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无数友好使者，不畏惊涛骇浪，彼此进行访问，增进了相互之间

的了解。通过这座友谊的桥梁,中国和亚非各国互通有无,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通过这座友谊桥梁,中国和亚非各国彼此进行文化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踉跄东来,到处烧杀掳掠,横冲直撞,在海洋上掀起一阵阵恶浪,从而阻碍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往来。但是,共同的遭遇却加强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相互同情和支援。今天,在反帝、反霸、反殖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在连绵不断的奴隶、隶农起义和日耳曼人入侵这两股力量的合击之下，彻底覆灭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被打翻在地。这一消息传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犹如晴天霹雳，吓得东罗马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丧魂落魄，不寒而栗。他们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并勾结西罗马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封建地主政权。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 年)统治时期，反革命活动最为猖狂。

当时，在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上，日耳曼人先后建立起了一系列封建王国——意大利有东哥特王国，西班牙有西哥特王国，北非有汪达尔王国，高卢有法兰克王国，不列颠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日耳曼封建贵族到处没收奴隶主的土地财产，镇压奴隶主的拚死反抗，发展封建经济。先前的奴隶从新主人手中领得一块份地，并得向新主人纳税，服劳役，虽然所受的剥削仍相当沉重，但一般说来，生命有了保障，经济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新兴的封建制度较之奴隶制度，逐渐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东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国家官僚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奴隶主

阶级在农业及官府中，继续役使奴隶劳动，在小亚细亚、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上，奴隶买卖依旧十分盛行。封建因素——隶农制已相当普遍，但受到奴隶主国家的压抑。隶农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不能自由迁徙，逃跑的隶农要追捕回来。农民的生活也极其困苦。

广大奴隶、隶农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奴隶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在色雷斯和伊利里亚爆发的大规模的“斯卡马尔运动”，公元六世纪初达到高潮，其主力是奴隶和隶农，还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杀死奴隶主，烧毁田庄，占领城市，强烈震动了东罗马的奴隶制政权。

查士丁尼正是在四面楚歌之中，登上皇位的。

查士丁尼是前任皇帝查士丁的侄子，从小被收养在宫廷里，接受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因此，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东罗马帝国境内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深恶痛绝；把西罗马帝国故土上出现的新兴封建政权，视为仇敌。他的反革命志向是，重建雄踞于整个地中海的罗马奴隶制帝国。

查士丁尼上台以后，就纠集一批反动学者、文人，着手编纂一部相当完备的奴隶制法典，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这部法典系统整理了自罗马共和时期至查士丁尼为止所颁布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统称《民法大全》。其中包括四部成文法典：第一部《查士丁尼法典》，搜集了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法令；第二部《法理汇要》，包括历代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第三部《法学总纲》，是叙述法学原理的简要课本；第四部《法令新编》，汇集了查士丁尼即位以后所颁布的法令。《民法大全》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对以后欧洲各

国的法律有较大的影响。

法典大肆美化东罗马帝国的奴隶主专制统治，给它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胡说皇帝是直接从上帝的上帝那里获得“天惠”的，“没有任何东西再比皇帝更高贵和更神圣”了。法典还宣布皇帝的权力高于一切，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臣属朝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不服从皇帝的人要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冒渎皇帝肖像的人也要处以死刑。

法典竭力维护奴隶主对奴隶和隶农的统治，一再强调奴隶和隶农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主人，“服从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地忍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鉴于奴隶劳动已无厚利可图，隶农制已经势在必行，因而在《法令新编》中也出现了允许释放奴隶的规定。

查士丁尼在加强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大力扩军备战，妄图一举消灭西罗马帝国故土上的那些封建王国。为此，公元532年，查士丁尼不惜以一万一千磅黄金为代价，同正在与之交战的波斯订立和约，以便消除后顾之忧，倾其全力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查士丁尼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公元533年，他命令反动将领贝利撒留率领一万步兵和六千骑兵进军北非。当时，汪达尔王国的封建政权并不巩固，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奴隶主反动势力时刻梦想变天，但又感到力不从心。贝利撒留出兵北非，正给他们壮大了力量，于是纷纷蠢动起来，发动反革命叛乱，策应东罗马军队。结果，贝利撒留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灭亡了汪达尔王国。

公元535年，查士丁尼命令贝利撒留移师意大利，进攻东

哥特王国。由于东哥特当局一再屈膝求和，东罗马军队很快占领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然而，广大东哥特人民奋起抵抗，挫折了贝利撒留的锋芒，把他围困在罗马城达一年之久。后来，查士丁尼增派大批援军侵入意大利，才替贝利撒留解了围。公元539年，贝利撒留围攻东哥特首都拉文那。城内东哥特军民坚持了六个月，直至弹尽粮绝。此后，经过长期的抵抗，直到公元555年，东哥特王国才被东罗马灭亡。

公元553年，意大利的战事尚未结束，查士丁尼又分兵进攻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西哥特人民坚决抗击，侵略军只占领了西班牙的东南部。此外，查士丁尼还占领了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撒丁岛及巴利阿里群岛。

东罗马侵略军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据说在北非，贝利撒留在两次战役中，就屠杀了六万居民，另外还把大批人卖为奴隶。意大利惨遭蹂躏，罗马城内水源和建筑都受到严重破坏，所剩居民寥寥无几，一片凄凉。

查士丁尼把奴隶制的枷锁重新套在人民身上。东罗马的侵略军每占领一地，就恢复旧日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把日耳曼封建主一律从国家机构中清除出去。查士丁尼竭力恢复奴隶主阶级的所有制。为此，他曾发布诏令，规定：已被没收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要归还本人或其后裔；奴隶主贵族所受到的其他财产上的损失，都有权要求赔偿；擅自离开原来土地的隶农必须追回，已经释放的奴隶要归还原主。

查士丁尼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得东罗马的奴隶、隶农以及手工业者的处境更为悲惨，而嗜血成性的奴隶主阶级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豪华。查士丁尼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许

多富丽堂皇的宫殿、教堂。他下令建造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占地约二万五千平方英尺，高约一百八十三英尺，外表是罗马式的圆顶和拱门，内部则为大理石的拱柱，四壁用各种金属和彩色玻璃嵌制成金碧辉煌的浮雕。单单建造这座大教堂，就花了五年时间，征用民工一万人，全部费用折合黄金约十八吨。查士丁尼不断增收新税，其中有一项所谓土地“附加税”，更是农业劳动者所不堪忍受的。人民大众除了要交纳苛捐杂税以外，还要服各种徭役。查士丁尼的反动统治，造成东罗马帝国境内土地荒芜，经济衰败，人民痛苦之极，社会黑暗之极。

查士丁尼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公元532年，即查士丁尼上台不久，君士坦丁堡就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尼卡”（希腊语，意即胜利）起义。起义者成份比较复杂，但基本群众为城乡劳动人民，如手工业者、作坊工匠、水手和城郊农民等。起义群众捣毁贵族和富人的住宅，袭击皇宫和官府，攻打监狱。查士丁尼胆颤心惊，一度打算弃城逃走，后施展阴谋，派贝利撒留镇压了这次起义。公元六世纪中叶，“斯卡马尔运动”再起，延续了很长时间。此外，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也不断发生暴动。

同时，意大利和北非等地人民一致奋起，开展了反侵略的英勇斗争。公元534年，北非努米底亚等处发生暴动，反对查士丁尼的血腥统治。暴动参加者袭击东罗马军队，严惩那些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奴隶主贵族。斗争坚持了十五年，动摇了东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也纷纷举行起义，查士丁尼如同坐在维苏威火山口上。

正是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使查士丁尼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公元 555 年，他无可奈何地停止了一切侵略战争。公元 565 年，查士丁尼结束了他那反革命生涯。

查士丁尼死后三年，日耳曼人中的一支伦巴德人从北方攻入意大利，与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将东罗马侵略军赶出了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公元六世纪七十年代，西哥特人民又夺回了东罗马在西班牙的领地。至公元七世纪初，东罗马帝国本身的奴隶制政权，也在人民起义和斯拉夫人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倾覆了。不过，于此时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变的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近一千年，于 1453 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西欧的封建庄园

封建庄园是封建主经营的大地产，在各国的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过。西欧的封建庄园盛行于中世纪早期，即公元九至十一世纪。它既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

公元九世纪，封建制度在西欧已经确立，封建统治阶级——国王、贵族、高级僧侣兼并农民的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农奴。

西欧的封建庄园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领主和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由庄园自己生产，只有少数产品，如盐、铁之类才到庄园以外去交换，一般用不着货币。恩格斯指出：“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封建主或者用劳役形式，或者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谷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①

^①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页。

西欧中世纪庄园

荒地

公共牧地

春耕地

(春季耕种，夏末收获，入秋再耕种)

秋耕地

休耕地

教堂

住宅

榨坊

烘炉

磨坊

公共草地

领主直领地

农奴甲份地

农奴乙份地

荒地

公共牧地

春耕地

(春季耕种，夏末收获，入秋再耕种)

秋耕地

休耕地

教堂

住宅

榨坊

烘炉

磨坊

公共草地

领主直领地

农奴甲份地

农奴乙份地

一般庄园都有城堡式的领主住宅、教堂和教士住宅，有农奴们简陋的茅舍，有加工麦子的磨坊、烘面包的烤炉、制造农具的铁工房和酿制葡萄酒的酒坊以及仓库等。

庄园的土地是条形的，分为领主自用地（通常是庄园中最好的土地）和农奴的份地。领主的自用地并不连在一起，而是和农奴的份地犬牙交错。耕地分为春播、秋播、休耕三部分，每年轮换一次，休耕地在当年作为牧场。

农奴被世代代固着在土地上，是庄园里的主要劳动者。法律上虽然规定：“领主对于农奴的统治权是受着公民权的限制的，农奴的人身和生命受着国王的保护。”但实际上，领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出卖或转让，可以对农奴施以种种酷刑甚至将其折磨至死。

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名目繁多，主要是榨取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农奴一个星期要有三至五天用自己的工具无偿地为领主耕作，余下的时间才可耕种自己那块从领主手里租来的份地。农忙时期，农奴要连续多天为领主干活，“甚至让自己成熟的庄稼浸在雨水中也得去给领主劳动——搬运、耕耘、播种、收割。”平时，农奴还得为领主砍柴伐木，修路建屋，巡逻守卫，甚至夜间驱赶青蛙，使领主得以安眠。

实物地租也相当繁重。公元九世纪时，巴黎郊外一份地产记录中有这样的规定：领有份地的农奴除了每周为领主服三天的劳役外，一年当中还得向领主缴纳半头公牛或四只公绵羊，四个迪纳里^①的人头税，五个牟底^②的谷物，非领主森

① 一个迪纳里约等于十分之一克黄金。

② 一个牟底约等于二百五十公升。

林所产的木板和板条各一百块，六只生蛋的母鸡，等等。每逢节日和婚丧喜庆，农奴要给领主送礼，而且条件又十分苛刻，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农奴送的小鹅如果“吃草的时候趴在地上，样子难看”，得退回重送；农奴送的母鸡如果被怀疑有病，它必须“在受惊时能飞到凳子上”，否则也得退回重送。

领主还利用设立的酒坊、油坊和面包房吸吮农奴的膏血。领主蛮横地规定，农奴不准用自己的磨盘磨麦子，不准用自己的酿酒器酿制葡萄酒，不准用自己的炉子烤制面包，所有这些用具都得使用领主的，而每用一次就得纳一次税。

苛捐杂税之中还有所谓军器税，领主往往借征收这项税款为名，索取农奴最好的马匹或其他牲口，如果没有，则取走一件最值钱的东西。

此外，天主教会对于农奴的剥削也十分残酷。教会规定，农奴必须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给教会，名曰什一税。实际缴纳的往往不止十分之一，达到十分之二、三，广大农奴不胜负担。

农奴终年劳作，为领主当牛做马，而生活十分困苦。他们住的是低矮的茅草屋，而且往往还要兼作牛棚、猪圈，人畜杂居；穿的是破衣烂衫，很多人冬天没有棉衣御寒，最多加件外套，用绳子往腰间一束；吃的一般是麦糊或燕麦粥加一点盐。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世代都是睁眼瞎。他们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领主把男女农奴都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如果妇女嫁到庄园以外去，那么领主就少了一个剥削对象。因此，妇女要和庄园以外的人结婚，事先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而且还须交付一笔领主认为满意的赎金——外婚金，作为“补偿”。

在同一个庄园里，一边是农奴的地狱，一边是领主的天堂。领主及其家属饱食终日，想方设法寻欢作乐，其中以“打猎取乐”最为时行。为了保证有禽兽可猎，领主不许农奴伤害庄园中的一禽一兽，违者甚至要被挖去一只眼睛。领主在行猎中任意践踏农奴的庄稼，其所造成的损失“至少也和他们要猎取的那些野兽相同”。

还有，一个领主的领地往往分散在各处，相隔很远，那些大领主有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庄园，因此领主经常带着他的家属及随从，象一群蝗虫一样，从一个庄园吃到另一个庄园，尽情挥霍。

平时，庄园的具体事务是由一批庄吏管理，庄吏又有庄头、管家、总管之分。庄头管生产，分配生产任务，并进行监督。管家代表领主，主持庄园，征收租税，处理纠纷。总管位于若干管家之上，代表领主每年巡视各地庄园，稽查帐目，处理司法案件。这些庄头、管家、总管与领主狼狈为奸，竞相残害农奴，有人揭露说：“如果领主叫杀头，管家们则吩咐剥皮。”

领主和庄吏为了维护对农奴的统治，无止境地榨取农奴的血汗，在庄园里设有法庭，并豢(huàn)养了一批警察和反动武装。庄园法庭由领主及其代理人担任法官，另有陪审员若干名。陪审员名义上由农奴中间选举产生，实际上全都由领主操纵，充当领主的工具。陪审员若不听从领主的摆布，要受到制裁，甚至财产也被没收一空。农奴如果向庄园法庭告发领主，那“只能是向领主告发领主”。结果，被告逍遥法外，作为原告的受害农奴却轻则遭到罚款、鞭笞，重则被投入监狱。因此，广大农奴是有理无处说，有怨无处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农奴采取各种方式，反抗领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公开申明：“我们是自由人，我们要做自由人。”

领主为了麻痹农奴的斗志，便借助反动的天主教会作为精神工具。中世纪早期，几乎每个西欧人都是天主教徒，否则在社会上便没有立足之地。因此，教会还往往用开除教籍来威胁农奴，胡说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就意味着成了上帝的弃民，死后也就别想升入天国了。但是，广大农奴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即使堕入地狱中去，也胜似忍受那些贡赋的压迫”，表现了农民阶级敢于藐视上帝的革命精神。

从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西欧接连爆发农奴起义。比如，十世纪末，法国诺曼底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历史记载说，农民们和农奴们，从森林中和平原上来的人，二、三十人甚至几百人一堆聚集在一起开会。他们愤怒地控诉道：领主们除了损害我们以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拚命劳动，但却不能从他们那边得到任何收入或报酬。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受折磨的日子，艰苦的日子，忧愁的日子。去年已经够受了，但今年却更坏。我们遭受各种各样旧的和新的榨取。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委屈和冤抑要申诉。我们的耕牛每日都在被牵去抵偿租税，我们被迫作其他的劳动。……四处布满了狱吏、管家吏和武装巡逻队，叫我们没有片时的安宁。这些人每天都在欺压我们，夺去我们的器物，将我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我们没有任何保障足以抵抗那些领主，也没有任何契约可以约束他们。农民和农奴们提出了战斗的誓言：互相帮助吧！如果他们胆敢向我们开战，我们就用三十或四

十个农民来抵抗一个武士，用锄头、弓箭、斧头和杀野猪的长矛，甚至拿石头同他们作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自由地砍伐森林，自由地打野猪，捕野兔，我们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田地里、在河道里、在池沼里或在森林里劳动。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布列塔尼的农奴又揭竿而起。这些起义打击了封建领主的反动统治，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十二、十三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货币与商品经济深入农村，逐渐瓦解了庄园的自然经济；同时，农奴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领主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因此，西欧的封建庄园日趋没落了。

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

公元四世纪末，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即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由于这两个帝国的奴隶主统治集团都要利用基督教来维护各自的利益，因此基督教也在实际上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支（正式分裂发生在1054年，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后，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则延续了一千多年，至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

在东罗马帝国，由于存在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东正教就一直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宗教会议虽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也只有皇帝才有权召集，并且要由皇帝遴选出出席会议的成员，批准会议通过的决议。自公元七世纪中叶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及伊斯兰教的传布，东正教的势力被赶出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及北非一带，以致后来东正教的影响仅限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俄罗斯等地。

在西欧，日耳曼人在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了天主教。罗马教皇和各地的主教，眼见西罗马帝国日益衰败，也转而支持日耳曼人的国王和贵族，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公元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宫廷总管)丕平，得到教皇的赞助，篡夺了法兰克王国的王位。为了酬谢教皇，丕平两次用兵意大利，并于公元756年把意大利中部(包括罗马城)的一块地方赠给了教皇。从此，教皇不仅是天主教的领袖，而且成了一个世俗君主。政教合一的教皇国^①便由此而生了。

随着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地方封建势力各霸一方，割据称雄，不听命于国王。国王只不过是封建领主中的第一人，实际权力往往超不出他的世袭领地。在这种王权微弱的形势下，教皇和天主教会便乘机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甚至凌驾于国王之上，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就曾宣称，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其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西欧各国的主教，而且有权废黜国王和皇帝。教皇权力的扩张势必引起王权与教权之争。1076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在窝姆斯召集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七世。他在给格里高利七世的信上说：“我，上帝保佑的亨利国王，告诉你——给我滚开吧！”格里高利七世立即进行反击，下令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趁此机会，德意志的大封建主纷纷叛离亨利四世。最后，走投无路的亨利四世，不得不于1077年1月，冒着严寒风雪，翻越阿尔卑斯

① 教皇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直到1870年才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此后，教皇国的名称一般不再延用。1929年，在梵蒂冈的拉特兰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与教皇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

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0页。

山，来到意大利的卡诺沙(当时教皇的驻地)请求格里高利七世宽恕。亨利四世蓬头跣(xiǎn 显)足，穿着忏悔者的衣服，立在门外苦苦哀求了三天，才被教皇接见，恢复了教籍。后来，“卡诺沙”或“卡诺沙之行”就成了屈膝投降的同义语。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期(1198—1216年)，教皇的权势达到了顶点。英诺森依照封建等级制，建立了教阶制。教皇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下设大主教、主教等。主教各有自己的辖区，管理本教区的宗教事务。教皇实行集权制，西欧各国的主教完全听命于教皇。对于教皇与国王的关系，英诺森有一句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象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当时，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国王都对教皇俯首称臣，德意志皇帝也受教皇摆布。英诺森三世俨然成为西欧各国的太上皇。

同时，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从其阶级利益出发，必然要维护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和压迫，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①，从而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支柱。教会说，“上帝要人们之中有些人成为主人，有些人成为农奴，并且使主人爱上帝，农奴敬爱他的主人。”如果农奴敢于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就是大逆不道，而且，据说死后不能升入天堂，而是要到地狱里忍受煎熬。当时，每个人一出世，教士就为其举行洗礼^②，成为天主教徒。反之，一个人如果被教会革除教籍，在社会上就几乎没有容身之地。教会把圣经奉为金科玉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0页。

② 基督教的入教仪式。

律，作为人们言论与行动的准则。一切学科都要为神学服务，自然科学也成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①。

天主教会并且垄断了文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教会甚至连圣经也不许老百姓读，得由教士讲解，因为害怕老百姓引证圣经的某些词句，于己不利。为此有人讽刺说，只有教士“生来具有强健的胃，去消化圣经的内容”。在初等学校里，整天让学生死记硬背拉丁文的圣歌和祈祷文，演习宗教礼仪。在高等院校里，主要科目是研究经院哲学，用烦琐的形式主义的推理方法，不着边际地论证圣经训义，研讨一些无聊的问题，如一个针尖能站多少个天使等。

谁若是敌视和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即被斥之为“异端”而加以残酷迫害。十二世纪，法国南部城市下层人民中间，产生了一种异端，他们反对教会拥有财产，主张取消什一税，简化宗教仪式，并且认为那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恶魔作祟的结果。这种异端因以阿尔比城为中心，故称阿尔比派。十三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了一支十字军，对阿尔比派进行血腥镇压。结果，法国南部的许多城市被摧毁，人民被杀害，财产被洗劫。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末，教皇还勾结西欧的封建统治者，对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一场历时近二百年的侵略战争——十字军东侵。十五世纪初，捷克人民在著名的爱国者约翰·胡司的旗帜下，发动起义（史称胡司战争），反对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和德国封建贵族的压迫与剥削。教皇又伙同德国皇帝，将这次起义淹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0页。

没在血泊之中。

为了迫害异端，天主教会还设立了一种秘密法庭，即所谓“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遍布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凡是对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稍有不满意的人，便被加以异端的罪名，交由宗教裁判所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然后处以死刑、徒刑、流放等各种刑罚。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信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反对天主教所宣扬的地心说，宗教裁判所为此把他逮捕起来，活活烧死。宗教裁判所还在布鲁诺的判决书里无耻地说：“本着一切仁慈的精神，让他受不流血的惩罚”。英国有一个名叫威克里夫的异端领袖，生前幸免于难，死后三十一年，教会还把他的尸骨从坟墓里挖出来，烧成灰烬，扔到河里去。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活动最为猖獗。1483至1498年，仅十五年间，在西班牙就有八千二百余人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另有八万九千余人被处以其他刑罚。

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还是最大的封建剥削者。西欧各国地产的三分之一为教会所霸占。上自教皇，下至大主教、主教，个个田连阡陌，残酷剥削领地上的农奴。对于广大的城乡劳动者，教会规定他们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名叫什一税。此外，教皇和天主教会还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聚敛钱财，其中一项是出卖“赎罪券”。赎罪券是教皇印制的一种特殊文书。教皇胡说，凡是有罪的人，只要出钱买了这种赎罪券，就可赎罪。视罪恶的大小，赎罪券的价目分为几等。这种赎罪券从罗马源源运往西欧各地，由教士在教堂附近及人们聚集的地方，象小贩一样高声兜售。出卖赎罪券的收入，成为

教皇的一项重要财源。依靠剥削所得，教皇和高级教士骄奢淫逸，糜烂不堪。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深刻揭露了德国天主教僧侣的贪婪：“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①。

总的说来，在西欧中世纪，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所采取的种种倒行逆施，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的苦难，加剧了西欧各国的封建割据状态，阻碍了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光明战胜黑暗，新生战胜腐朽，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也改变不了的。十六世纪以后，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在西欧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了。

^①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91页。

十字军东侵

在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境内，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耶路撒冷。传说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死后就葬在那儿，因此，耶路撒冷被基督教徒视为“圣地”。自1096至1270年，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主，打着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圣地”的宗教旗帜，向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了一场历时近二百年的侵略战争。这就是十字军东侵。

十一世纪的西欧，城市兴起了，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日用手工业品，以及东方出产的绸缎、珠宝、香料等。封建主从领地上的剥削所得，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奢望。那些小封建主，即骑士更是入不敷出。西欧当时盛行长子继承制，封建主的遗产全部传给长子，余子一无所得，这些人就成了所谓“穷光蛋”骑士。他们经常单枪匹马或成群结队横行于西欧各地，打家劫舍，但总是欲壑难填。因此，西欧的大小封建主们都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一心想在那里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

另外，西欧封建主矛头东向，还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当时，西欧农奴的处境日益恶化，农奴每周要为封建主服劳役三天以上，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1089到1095年，西

欧连续七年遇到灾荒，广大农村一片荒凉，十室九空，各地农奴不断燃起反抗的烈火。封建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对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侵略远征，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

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企图，得到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支持。在西欧，天主教会不仅是西欧封建制度的支柱，也是最大的封建主。教皇除了想借东侵掠夺财富，缓和西欧内部的社会矛盾而外，还想进一步扩大天主教会的势力，控制东罗马帝国境内的东正教。

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局势如何呢？当时东地中海沿岸有两个大国。一是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塞尔柱土耳其人原居于中亚细亚，以游牧为生。十一世纪初西侵，经过半个世纪，先后占领了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建立了塞尔柱土耳其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并不巩固，十二世纪初即分裂为许多小国，如在中亚细亚有鲁姆苏丹国。各小国互不相属，经常发生摩擦，削弱了各自的力量。东地中海沿岸的另一个大国是东罗马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兴起后，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领土不断被蚕食，内部政局不稳，地方封建势力尾大不掉，不听命于中央。东罗马皇帝为了抵抗塞尔柱土耳其人，竟向罗马教皇求援，甚至同意将东正教置于罗马教皇的统制之下。这样，就使得教皇发动十字军东侵有了一面蛊惑人心的大旗：“拯救”东方的教胞，驱逐塞尔柱人，收复“圣地”。东罗马帝国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给它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城召开宗教大会，为十字军东侵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对聚

集在克勒芒城外平原上的人群说：“上帝的孩子们啊，我们东方的圣地，给异教徒占领了，这将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上帝要你们赶快去夺回我们的圣地。”停顿了一会，他又声嘶力竭地喊道：“东方国家土地上遍地是蜜和乳，简直是第二个天堂！”在乌尔班二世的煽动下，到会的千余名教士、封建主和骑士如痴如狂，高呼：“神意如此！神意如此！”争先恐后地涌上前去向教皇领取十字军的证章——红布做的十字，戴在自己的胸前或肩上。

1096年秋天，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开始了。由法国、意大利、德国西部的封建主和骑士组成的十字军约三、四万人，分别出发。于次年春天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会合，然后渡过黑海海峡向耶路撒冷进军。6月，十字军攻占了尼西亚城。7月，在多里列会战中，又大败塞尔柱土耳其人。当十字军穿过多山的小亚细亚地区时，正值夏日酷暑，断水缺粮，路途艰险，而且经常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的伏击，死伤甚众。然而，追求财富的贪婪欲望，驱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前挣扎。

1097年10月，十字军进抵东地中海沿岸的大城市之一——安条克近郊。守城军民顽强抗击十字军的疯狂进攻，坚持达七个月之久。后来只是由于城内一部分守军哗变，十字军才于1098年6月占领该城。接着，十字军沿着海岸继续南下，于1099年7月15日攻陷了耶路撒冷。

这时，十字军完全撕下了拯救“圣地”的宗教外衣。他们冲进伊斯兰教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将里面的珍珠财宝一扫而光，然后把它当作刑场，在那里杀害了一万多无辜的穆斯林。十字军还竞相抢劫居民的财产，谁先闯进某一宅院，谁就

是这座宅院的主人。历史记载说：“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这种权利。许多穷光蛋都变成了富翁。”

十字军为了维持其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一带的统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另外还建立了三个附属于耶路撒冷王国的小国。

十字军把西欧的一整套封建制度强加于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不论是伊斯兰教徒或基督教徒，统统沦为新来的西方领主的农奴。领主可以将农奴连同土地一起转让或者出卖。农奴除了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役和捐税。

十字军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1125年，贝鲁特和西顿两地农民抗租抗税，继而发展成为武装起义。1131年，的黎波里一带的农民也发动起义，处死了恶贯满盈的的黎波里伯爵蓬斯。人民的反抗斗争吓得侵略者失魂落魄，不得安宁。西欧封建主为了巩固他们在东方的统治，又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侵（1147—1149年），结果以失败告终。

十二世纪后半叶，塞尔柱土耳其人的一个军事首领萨拉丁，以埃及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1187年7月初，萨拉丁率军六万在提庇利亚湖附近击溃十字军主力，生俘了许多十字军高级将领。10月2日，萨拉丁部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耶路撒冷。消息传到西欧，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各国封建主和罗马教皇，于是他们慌忙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89—1192年），但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

1198年，英诺森三世一登上罗马教皇的宝座，就野心勃勃地策划新的十字军东侵。他写信给东罗马皇帝，要东罗马征



萨拉丁领导人民抗击十字军

集士兵参加十字军，联合进攻埃及，并将东正教从属于罗马教皇。这一要求遭到东罗马皇帝的拒绝，英诺森三世对此耿耿于怀。这时，威尼斯商人又趁火打劫。

早先，威尼斯商人为了在东地中海沿岸建立商站，排挤商业上的劲敌东罗马，曾积极支持十字军东侵，并分得大量战利品。为了进一步垄断整个地中海的商业，1201年4月，威

尼斯与十字军秘密缔结一项条约，把矛头指向东罗马。英诺森三世批准了这个条约。于是，第四次十字军改变了原定进攻埃及的计划，前去掠夺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东罗马，从而彻底暴露了十字军东侵是所谓宗教战争的虚伪性。

1204年初，十字军乘船进抵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包围了这座城市。4月9日，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城里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打退了十字军的进攻。仅在城外一座楼宇前，十字军就留下了近一百具尸体。4月12日，十字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由于东罗马统治集团的软弱无能，十字军攻入城内，次日占领了全城。如狼似虎的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劫掠。他们冲进宫殿、教堂、商场，将无数艺术珍品和金银财宝搜为己有。据历史记载，每个十字军人“所分得的财物太多了，简直无法计算。其中有黄金、白银、宝石、金银器皿、丝绸衣服、贵重毛皮，凡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都有。”不能掠走的东西就加以大肆毁坏，甚至付之一炬。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也在一片火海之中化成了灰烬。他们还野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强奸妇女，把儿童卖为奴隶。

1204年，十字军在它所占领的那部分东罗马的土地上，按照西欧国家的型式，建立了拉丁帝国。西欧封建主恣意奴役东罗马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

但是，广大的东罗马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经常袭击小股十字军，攻打十字军的城堡。1205年3月，一些城市还曾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退守小亚细亚的东罗马的残余势力又逐渐

恢复起来，依靠人民的力量，逐渐收复了许多失地。1261年，拉丁帝国终于被推翻，东罗马帝国重新恢复。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也就这样失败了。

西欧封建统治阶级不甘失败，散布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无罪”的儿童较“有罪”的成年人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因而可以奇迹般地夺回“圣地”。接着，教皇和西欧封建主丧心病狂地组织了一次儿童十字军东侵。1212年，为数约三万名年龄都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其中大量的是农民的孩子，从法国北部到马赛集中，分乘五艘商船出发。船队航行到撒丁岛附近时，遭到风暴的袭击，两艘船沉入海底。其余船只航行到埃及后，船主将所有儿童全部卖为奴隶。另外，还有两万名儿童，在他们从德国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途中，已经饿死大半，不了了之。

后来，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又组织了几次十字军。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和第七次（1248—1254年）都是侵略埃及，第八次（1270年）侵略突尼斯，结果也都失败了。

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发动的十字军东侵，是在宗教旗帜掩盖下的一场血腥的侵略战争。它给东地中海沿岸的各族人民，尤其是给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东罗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人民死于非命，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十字军东侵对于西欧各国人民，也是一场无穷的祸害。十字军东侵从反面教育了各国人民，尤其是教育了西欧人民，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封建反动势力的狰狞面目，推动了反教会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的高涨。

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

贞德是法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民族英雄。在她生活的年代里，英法两国在法国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还在继续。因为这场战争从1337年爆发，至1453年结束，延续一百多年，所以历史上称作“百年战争”。百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的封建王朝为争夺佛兰德尔^①而引起的。英国与佛兰德尔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它所生产的羊毛主要输往那里，从中获取巨大收益。英国统治阶级一心要将佛兰德尔占为己有。法国统治阶级也早就对佛兰德尔垂涎欲滴了。因此，起初战争对英法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

然而，到了十五世纪初叶，英国利用法国两大封建主集团——奥尔良公爵集团和勃艮第公爵集团的内讧，派遣六万大军入侵法国，占领了法国北部和首都巴黎。1428年10月，英军又倾其全力围攻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城。奥尔良是通往法国南部的门户，它一旦失守，英军就将长驱直入，整个法国就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因此，战争对法国来说，这时已具有明显的反侵略的性质。

法国人民，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致奋起，决心把

^① 佛兰德尔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大部分位于今天的比利时境内，并包括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佛兰德尔工商业比较发达，十分富庶。

英国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在沦陷区里，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纷纷行动起来，积极组织游击队，用各种方法频频打击侵略者。诺曼底一带的游击队最为活跃，参加游击队的不仅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且还有许多妇女。惶惶不安的英国侵略者野蛮镇压游击队的活动，并悬赏捉拿游击队的人，但均未得逞。相反，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游击队更加活跃。正是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在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中，出现了著名的女英雄贞德。

贞德，约于1413年出生在法国香槟和洛林交界处的杜列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童年时代，她曾经多次目睹英国侵略者蹂躏自己家乡的暴行。后来，在火热的斗争中，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决心和广大人民一起，驱逐英国侵略者，拯救祖国。

1429年春天，年仅十七、八岁的贞德，往见避居南方的法国王子查理（法王查理六世于1422年病逝），要求参军，去解救奥尔良。当查理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农村姑娘时，他疑惑了。这时贞德坚定地说：“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武装部队，就一定能解除奥尔良的围困，打倒英国强权，解放法国。”处境困窘的查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意了贞德的要求，委以解救奥尔良城的军事指挥权。

贞德身披盔甲，装扮成一个男子，率领军队来到奥尔良城下。奥尔良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有的拿起长矛大刀，集合在贞德的旗帜下，有的为部队运送粮草和弹药。贞德在作了必要的部署后，写信给英国国王，严正指出：如果英国不把侵略军撤回国内，“我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英王不作答复。贞德



贞德进入奥尔良

决定向英军发起进攻。

敌人环绕奥尔良城筑了许多堡垒，把城门都封锁起来。法国的一些将领说，法军要进入城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贞德认为，敌人的堡垒一定能够摧毁，沦陷的国土一定能够全

部收复。胜利永远属于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法国人民。

奥尔良解围战打响了。贞德不畏险阻，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向英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战斗中，贞德受了伤，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士兵们把她抬下战场，进行急救。在一阵厮杀声中，贞德惊醒过来，忍着伤口的剧痛，猛然站立起来，骑上马，又冲进了战场。在她的鼓舞下，战士们百折不回，浴血战斗。5月8日，法军终于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解了奥尔良之围。当贞德率领部队雄赳赳地开进城的时候，人们欢呼跳跃，热泪盈眶，整个奥尔良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通过奥尔良一战，贞德的名字传遍各地，人民把她誉为“奥尔良英雄”。

奥尔良战役之后，贞德竭力主张查理王子加冕继位，以进一步团结抗英力量。按照法国的习惯，里姆斯教堂是法国历代国王加冕的地方。为此，贞德于6月1日又率军向里姆斯城进军。一路上，贞德冲破了各种障碍，打败了英国军队，解放了里姆斯。7月17日，查理王子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加冕礼，正式继承法国王位，称查理七世。

为了把侵略者统统赶出法国国土，完成解放祖国的神圣事业，贞德又向法王建议向巴黎进军。但是，查理七世既与英国统治者有矛盾，不甘屈从于英王，同时又害怕以贞德为代表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他施展诡计，企图收买、牵制以至陷害贞德。查理先赐贞德以爵位，并对她说：“你已经挽救了法兰西，你需要什么尽管说吧。”贞德断然拒绝，坚持进军巴黎。查理继而威胁道：“向巴黎进军！难道你忘了一路上布满英国堡垒吗？”贞德答道：“那是你对侵略者堡垒的看法。前些日子我们从奥尔良城到里姆斯城，两地之

间同样布满着英国堡垒，而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的。”贞德认为，她所率领的法军士气高昂，斗志旺盛，而英军则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法军理应乘胜追击，夺取最后胜利。后来，法王表面上同意了她的建议，但又不给予任何实际支持。8月23日，贞德率领队伍向巴黎进发了。

26日，贞德在收复了一些地方之后，进抵巴黎城下。9月间，贞德率领军队向巴黎发动进攻，但由于孤军奋战，未能攻克，她本人再次负伤。1430年春，在离巴黎不远的康边城附近，贞德与英国侵略者及其在法国的帮凶勃艮第集团展开激战。法军不断失利，贞德且战且退，准备退入由法军据守的康边城。但当她退到城门口时，城内的奸细突然拉起吊桥，关闭了城门，断了贞德的退路。在这困难的时刻，贞德和她身边的战士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最后不幸失败，贞德被勃艮第集团俘虏。

贞德被俘以后，在监牢里受尽了折磨。查理七世竟袖手旁观，不设法营救，甚至听任勃艮第集团以四万法郎的代价把贞德卖给了英国人。

贞德被英国侵略者囚禁在一只铁笼子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来，敌人策划了一场审讯。在法庭上，贞德大义凛然，神态自若，而那些法官们却非常局促不安。法官大略说了一下案情之后，在贞德的装束上做起文章来：“是谁叫你穿男子衣服的？”贞德理直气壮地答道：“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打败侵略者，我扮成一个男子，这是我的自由。”这下可触犯了法官，他们狂叫起来：“如果你执迷不悟，就要宣判你是异教徒，把你烧死在火刑柱上。”面对这些张牙舞爪的敌人，贞德义正

辞严地回答说：“为了法兰西，我视死如归！”法官们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审讯一连进行了几天，贞德始终立场坚定，威武不屈，敌人一无所获，狼狈不堪。最后，法庭以“女巫、妖术惑众、异教徒”等罪名，判处贞德以火刑。

1431年5月30日，是贞德就义的日子。这天，英国侵略者在法国卢昂城的广场上，竖起一座火刑柱，周围堆满干柴。贞德戴着手铐，来到刑场，她轻蔑地瞥了刽子手一眼，向火刑柱走去。刽子手点燃了干柴，火焰在贞德脚下熊熊燃烧，这时敌人又狂吠：“你还不改邪归正？！”贞德微微一笑，怒斥敌人说：“你们烧死我一个，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法兰西！”这位年轻的女英雄就这样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贞德的激励下，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熊熊的烈火越烧越旺，各地都出现了抗英斗争的新高潮，最后终于把英国侵略者赶出了国土。

百年战争以后，法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复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来，巴黎成为法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到了十五世纪末叶，法国基本上消除了封建割据状态，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英国在百年战争之后，由于集中力量于国内，到十五世纪末叶，也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恩格斯指出：“英国之所以能实现统一，只是因为它被迫放弃了象德国人远征罗马那种对法国的唐·吉珂德式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会使它一蹶不振，就象远征罗马使德国一蹶不振一样”^①。

^① 《关于德国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647—648页。

瓦特·泰勒起义

英国伦敦的东部，有一座古老的城堡——伦敦塔，占地十三英亩。塔的南面濒临太晤士河，东西北三面围着深水壕沟，它的内城是环形碉堡，碉堡上均匀分布着十三个瞭望塔。内城的中心有一座白塔，高达九十英尺，是伦敦塔的主堡。主堡的四角还筑有四个很高的角塔。这座壁垒森严的城堡，从十一世纪起，一向是幽禁和处死政治犯的地方。同时，由于伦敦塔深沟高垒，所以有的英国国王还把它作为策划反革命阴谋的营垒。1381年，就在这座伦敦塔下，由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英王理查二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呢？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来，对外贸易也日益活跃——主要是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和谷物。商品经济深入农村，逐渐破坏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些封建贵族，尤其是中小封建贵族为了购买手工业品和奢侈品，为了与佛兰德尔进行贸易，迫切需要货币。因此，封建地租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原先实行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这时，一般说来，农民不再给贵族服劳役了，也不要缴纳粮食、牲畜、家禽等实物了，主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追求货币，不断加重剥削，农民的负担不是轻

了，而是更重了。货币地租的流行，加速了农民的两极分化，少数农民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变得更穷困了，被迫去给贵族当雇工或短工，因此雇佣劳动制在农村盛行起来。但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改收货币租，有些大贵族，尤其是英国东南部的一些教会大贵族，仍然保留劳役地租。

1348—1349年间，欧洲流行一种瘟疫——黑死病（即鼠疫）。英国亦在1348年8月发现这种病。整个英国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一说二分之一）。1368年和1375年又两度流行起来。经过这场灾难，英国人口直线下降，据不完全统计，1348年人口为三百七十万，三十年后的1377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只剩下二百二十万了。

黑死病引起了城乡劳动力的锐减，社会经济濒于破产，物价飞涨。城市中的帮工、学徒及农村中的雇工要求增加工资，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但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却于1349年颁布敕令，规定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女，没有土地或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必须受雇于需要他做工的人，其工资一般不得超过瘟疫流行前的标准。支付高额工资的雇主和接受高额工资的工人都要处以罚金。1351年正式颁布了一项“劳工法案”，规定破坏雇佣法的工人要带枷坐牢，雇主则处以罚金。136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进一步规定，擅自离开雇主的工人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用灼铁在身上烙印。

广大城乡人民深受劳工法案之苦，反抗的怒火到处在燃烧。当时有一个生活于下层人民中间的贫穷牧师约翰·包

尔，猛烈抨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为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他愤愤不平地说：“他们（封建统治阶级）穿的是天鹅绒，而我们穿的是破衣衫；他们喝的是美酒，而我们喝的是白水；他们住的是豪华的邸宅，而我们却露宿街头，……”这种贫富的悬殊，是从来就有的吗？不是。他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启发大家，说：“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接着，包尔进一步指出，要把英国的事情办好，就必须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尤其是贵族与农奴之间的差别。恩格斯说包尔“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①。包尔的话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到处都有成群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他宣讲。教会对包尔恨之入骨，几次把他逮捕下狱。但即使是在狱中，包尔仍坚持斗争，不断从狱中捎出书信，继续鼓动起义。

英国当局征收人头税一事，成了起义的导火线。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统治集团为筹集浩大的军费，于1377年首次开征人头税，规定凡十四岁以上的男女都须交纳，税额为每人四便士。1379至1380年又连续征收。1380年征收的税额为初征时的三倍。这一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身上。

1381年5月，英国南部的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农民奋起抗交人头税。起义农民杀死了几个民愤很大的税吏，打开监狱，释放那些触犯劳工法案或漏交人头税的无辜人民。约翰·包尔也被从狱中营救出来，并被推举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的主要领袖是瓦特·泰勒。他出生在埃塞克斯郡（一说肯特郡），是个农村的泥瓦匠，参加过英法百年战争，懂得一

^①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3页。

些军事。

瓦特·泰勒善于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在起义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6月10日起义军占领了肯特郡的政治中心坎特伯雷。全城人民兴高采烈，夹道欢迎起义队伍。瓦特·泰勒骑着高头大马，热情向群众招手致意。起义者捣毁了罪大恶极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将里面保存的债据、帐册等统统烧毁。

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农民的革命举动，得到广泛的响应。6月间，全国四十个郡中，约有二十五个郡发生了起义。

6月12日，瓦特·泰勒率领一支起义队伍到达伦敦郊外，扎营于同伦敦塔隔岸相望的太晤士河南岸。与此同时，东埃塞克斯郡的农民也从东北方进抵伦敦。汇集在伦敦城下的起义军共约六万人。他们虽然只有棍棒、锄耙和刀斧之类的简陋武器，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士气高昂。13日，伦敦市民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为自己的队伍打开了城门，瓦特·泰勒率领起义队伍迅速越过吊桥，开进城里。另一支来自东埃塞克斯郡的起义军从东北方向进入城内。两支农民军在伦敦胜利会师了。起义者在伦敦焚毁法院档案，打开监狱，释放阶级兄弟，捣毁贵族的邸宅，处决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大臣和法官。伦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接着，起义军包围了反动堡垒——伦敦塔。躲在里面的英王理查二世及他手下的一些大臣乱作一团。

13日下午，理查二世战战兢兢地登上白塔东面的角塔，往下一看，只见旌旗招展，人如潮涌。此时，他猛然想到，历史上不知有多少顶王冠被革命人民砸烂，不知有多少个王朝被

革命人民推翻。他越想，心越寒。然而，他又强作镇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塔外的人群说：“你们各自回乡，既往不咎”。话音未落，起义农民怒不可遏，吼声震天。理查二世心里明白，伦敦塔虽然防卫森严，但抵挡不住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于是，他施展缓兵之计，走出伦敦塔，与起义农民举行谈判。

第一次谈判于6月14日早晨，在伦敦东北的迈尔恩德村举行。一些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徭役，以低额货币地租代替农民对封建主所负担的一切义务；确立自由贸易；大赦起义者等。但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工法案。显然，这些要求只是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理查二世满口答应下来，并当场命令三十个书记官赶制批准文书，加盖国王印玺，发给农民。那些富裕农民轻信了国王的诺言，拿了一纸空文，当晚离开了伦敦。以瓦特·泰勒为首的广大贫苦农民，不以此为满足，继续留在伦敦，坚持斗争，并一举攻占了伦敦塔。

理查二世被迫退往伦敦的御衣库，筑垒固守，同时加紧调集各郡的骑士武装来伦敦，准备对起义军实行武力镇压。

6月15日下午，理查二世与起义军举行第二次谈判，地点在伦敦北面的斯密菲尔德广场。瓦特·泰勒提出没收教会和寺院的土地分给少地农民；废除领主的一切特权；收回领主圈占的公共森林和沼泽；取消劳工法案等条件。“斯密菲尔德纲领”反映了贫苦农民的利益。但正当谈判进行的时候，国王的随员、伦敦市长借着夜色，突然拔出匕首向瓦特·泰勒的背后猛刺一刀，其余的骑士也手持凶器蜂拥而上。瓦特·泰勒身负重伤，英勇牺牲。这时候预先埋伏在伦敦城内的骑士武

装，一齐杀了出来。失去自己领袖的起义农民，处境十分危急，他们且战且退，被迫向城外转移。

6月18日，理查二世用武力重新控制了伦敦，下令逮捕所有“作乱的人”，禁止一切集会。他还亲自带领大批反革命武装，巡行埃塞克斯、肯特等郡，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并恶狠狠地对农民说：“你们以前是农奴，将来还是农奴，而以后的情况还不如现在”。结果，又有许多起义农民和好几个起义领袖被杀害。约翰·包尔被判处绞刑。行刑前，伦敦主教曾予以缓刑两天，妄图使包尔屈膝求饶。然而，包尔确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完全正义的，宁死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广大农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倒。1381年9月，肯特郡的农民曾再度起义，逮捕和惩处了郡长及其他一些封建贵族。以后十年间，各地的起义仍然连绵不断，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封建统治阶级。

瓦特·泰勒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通过长期的英勇斗争，逐渐挣脱了对封建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了自耕农民。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①。随着封建农奴制度的解体，十五世纪以后，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迅速的发展，并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22页。

马哥·波罗 及其《东方见闻录》

一谈到历史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人们总会想起十三世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马哥·波罗和他口授的一部游记《东方见闻录》。历史上，他第一次详细、生动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从而扩大了欧洲人的眼界，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亚洲和欧洲是毗连在一起的一片大陆，其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通往来是很困难的。

公元前139至前126年，中国的使臣张骞奉命通西域（古时西域包括中国新疆以西及中亚细亚一带），返国后，讲述了他西域各地的见闻。公元前119至前115年，张骞再度通西域，并遣副使至安息（今伊朗）。此后，中国人到西方去的就逐渐增多了。

在汉朝，中国和罗马帝国有过一些贸易往来。当时从中国到欧洲，有一条经过天山、中亚、伊朗、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期，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最珍贵的衣料。当时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利加”，意思是产丝之地。中国人称罗马为“大秦”，亦称“犁鞞”

或“海西国”。

公元一世纪后期，班超再次通西域，并自西域遣副将甘英往通罗马帝国。甘英走到伊朗西部，中途折返。关于这件事，《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道：“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抵条支（原指叙利亚，但这里大概是指美索不达米亚），临大海（大概是波斯湾）欲渡，而安息（帕提亚，即波斯）西界船（chuān 传）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jī 机）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在公元二世纪初期，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疆界已经包有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大部分。于是，罗马商人得以从波斯湾泛海，经印度洋来到东方。公元 166 年，有一个乔称是罗马使臣的叙利亚商人，从现今的越南来中国通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罗马与中国的直接交通。《后汉书》上记载道：“……其王（罗马皇帝）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zēng cǎi 增彩）与之交市，故遮阂（hé 何）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这是指奥蕾利士）遣使自日南（越南）徼（jiào 叫）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象牙、犀角和玳瑁都是越南的土产，可见那位商人是临时在越南就地采购，用为觐见之礼，而不是从西方带来的。

及至唐朝（618—907 年），中国和东罗马帝国已经有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中最重要的事迹便是中国育蚕治丝法的西传。

从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垄断着东方和西方之间

的贸易，他们的足迹遍于亚、非、欧三洲。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经过阿拉伯人之手而逐渐传布到西方去的。不过直到这时，欧洲人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形还知道得不多。

十三世纪时，蒙古游牧封建贵族肆行武力扩张，把亚洲的大部分和欧洲东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1237—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兵西侵，征服了俄罗斯，在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1252—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wù 务）率兵征服波斯（伊朗）、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在亚洲西南部建立了伊儿汗国。这样，蒙古帝国的疆域，在西边就达到了黑海、高加索、叙利亚一带。

这时地中海区域的形势是：第四次十字军东侵（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邦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了起来，这种形势便有利于马哥·波罗的东来。

马哥·波罗（约1254—1324年）出身于威尼斯的商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叔父玛竇·波罗都是威尼斯的富商大贾。在带他来中国之前，他的父亲和叔父已经到过中国一次。

1260年左右，尼古拉·波罗和玛竇·波罗兄弟二人到君士坦丁堡经商，认为如果和新成立的蒙古汗国进行贸易，必有厚利可图。他们采办了一批珍贵货物，渡过黑海，在克里米亚半岛南端舍舟登陆，前往金帐汗国的首都撒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他们把所带的货物献给别儿哥汗，得到数倍于原价的赏赐。接着，这两位威尼斯商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亚的大

城市布哈拉，在那里住了三年。有一天，一个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到伊儿汗国执行任务的使团在归途中经过布哈拉，看到这两位威尼斯商人，大为惊奇。因为在这以前，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欧洲人。那些使臣对这兄弟二人说，大汗很想知道外国的情况，并邀请他们一同往见大汗。这样，尼古拉·波罗和玛竇·波罗便跟随这个使团东行，经过足足一年的旅程，才到达大汗的驻所上都（即和林，元朝诸帝的夏宫所在地，今仅存废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对这两位威尼斯商人的到来颇为欣喜，对他们优礼有加，询问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

尼古拉·波罗和玛竇·波罗在中国稍事逗留，即西行归国。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年多，于1269年回到威尼斯，与离别了约十年之久的家人团聚。这时，尼古拉·波罗的儿子马哥·波罗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了。

约于1271年11月，马哥·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踏上来中国的迢迢万里的旅程。他们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跋山涉水，穿过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横越伊朗全境，北上到阿姆河的上游之地，穿过中亚的沙漠地带，翻过帕米尔高原，再迤邐（yǐ lǐ 以里）东行，经过喀什、于阗（今和田），掠过罗布泊，到达敦煌、玉门一带。他们在中国境内所走的这一段路程，大致上就是我国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时所走过的路程，不过方向相反罢了。玄奘的西行，在时间上约比马哥·波罗东来早六百年。

1275年5月，波罗家族的这三个旅行家终于到达蒙古大汗的驻所上都。尼古拉·波罗和玛竇·波罗带着马哥·波罗

觐见大汗忽必烈。

从1275至1292年这十七年间，马哥·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一直在元朝供职。马哥·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深受忽必烈器重。他除了在京城大都（今北京）视事以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有一次，他曾穿行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经过川、藏边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到云南去执行任务，并且到过缅甸北部。他的足迹遍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据说他还曾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在东南各省驻了三年。后来，他奉命出使南洋，到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可能也到过斯里兰卡、印度。马哥·波罗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状况，向大汗报告。

波罗家族的这三个人一直受到大汗忽必烈的信任。然而，他们毕竟是威尼斯人，久想西归。后来终于找到了机会。1286年，波斯汗阿鲁浑（即伊儿汗，旭烈兀的继位者）的宠妃死了，遗言要由她本族的蒙古贵族之女来继为王妃。阿鲁浑派来一个使团，请大汗忽必烈赐婚。忽必烈选定了一位蒙古贵族少女，名叫阔阔真，要由海道送往波斯嫁与阿鲁浑。而这时马哥·波罗刚从南洋出使归来，熟悉海上航行情况。于是忽必烈决定让马哥·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护送阔阔真到波斯，然后便道西归。

1292年初，这三个威尼斯人连同其他的随从共六百余人，护送阔阔真前往波斯。这一行人分乘十三艘四桅帆船从福建泉州扬帆启航。船队经过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在印度南部停泊了一段时间，再继续航行到波斯。当时旅途的困难，可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这一行六百多人，绝大多数都

在途中失事遇难或病亡了，只有阔阔真、波罗家族的这三个人以及其他少数几个人幸存下来。这次从中国泉州港航行到波斯，费时两年又两个月。

马哥·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终于把阔阔真护送到了波斯，完成了大汗所交付的使命。但这时阿鲁浑已死，阔阔真乃被立为阿鲁浑之子合赞的王妃。这三个威尼斯人由波斯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经过君士坦丁堡，回到意大利。

1295年末，波罗家族的这三个旅行家回到他们在威尼斯的故居。这时距他们离家之日，已经整整二十六年了。他们因为从中国带回去无数金银财宝和奇珍异物，俨然成了威尼斯的豪门巨富。

在十三世纪这一百年中，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常常为了商业利益而发生战争。1298年，热那亚派一支舰队攻打威尼斯，威尼斯也组织了一支舰队应战。当时马哥·波罗既为威尼斯的富豪，乃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舰，并亲自担任舰长，加入威尼斯舰队对热那亚作战。该年9月7日，这两支敌对的舰队在亚德里亚海上进行激战，结果威尼斯大败，马哥·波罗的那艘战舰被热那亚人俘获，他本人也被投入热那亚狱中。

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马哥·波罗在意大利已经有点名望了。当他被关在热那亚狱中时，经常有人要他讲述他在东方各国的经历。马哥·波罗大概是厌于一一答复，就原原本本地把他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所见所闻，口授给同狱中一位名叫罗思蒂谦的人，然后由这个人用当时欧洲

比较通行的法文笔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哥·波罗行纪》，或《东方见闻录》。

1299年7、8月间马哥·波罗获释，回到威尼斯。在这以后，他的情况便不大为世人所知了。他死于1324年1月，葬在威尼斯圣劳伦索教堂的墓地上。

马哥·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马哥·波罗东来时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亚美尼亚、两河流域、波斯(伊朗)、中亚、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等地的风土人情。第二部分记载了元朝初年的政事和大汗忽必烈所进行的那些战争，描述了大汗朝廷的威仪和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等名城的繁华。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包括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泰国)、爪哇、苏门答腊、印度和斯里兰卡，此外还提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第四部分讲成吉思汗以后蒙古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概况。《东方见闻录》给欧洲的知识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人们争相传诵。它不脛(jìng 劲)而走，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不过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业，《东方见闻录》起初都是手抄本。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难免不有所损益，所以到后来，《东方见闻录》竟有五、六十种不同的版本。

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主要是根据《东方见闻录》中所提供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这种世界地图当然是不象样的，只歪歪斜斜地画出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轮廓)。哥伦布早年曾细心阅读过马哥·波罗的《东方

见闻录》，并且在书页旁边批注了他自己的意见。1492年哥伦布那次著名的航行，原是要来中国和印度，只是无意中航行到美洲。哥伦布以为他到了印度，所以称当地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而且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还以为他所到过的古巴岛就是马哥·波罗所说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哥伦布是在马哥·波罗的影响下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的。

捷克胡司战争

捷克，又叫波西米亚，十世纪建国，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半部。十四世纪末叶，由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和波澜壮阔的反封建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农业，耕地面积扩大，三圃制普遍推广。手工业，尤其是采矿业相当发达。库特纳山是银矿业的中心，那里铸造的货币“格罗什”通行于全欧洲。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有一百多个。布拉格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有“金色的布拉格”之称。

捷克与德国相邻。德国的封建贵族，对富饶的捷克垂涎不已。从十二世纪起，他们就大规模向捷克殖民，与捷克国王和大封建主勾结起来，奴役捷克人民。

德国的僧侣贵族把持了捷克教会的主要职务，占有捷克地产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除了通过地租和什一税榨取农民的血汗外，还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有人揭露说：“甚至藏在穷老太婆身上最后一个铜币，都被无耻的牧师搜刮出来，如果不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恕罪上，不花在恕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难道不能说牧师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吗？”捷克的无数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

德国僧侣贵族和罗马教皇的钱柜，这不仅成为捷克人民的沉重负担，也损害了捷克中小封建主的利益。

德国商人也纷纷涌到捷克，建立自治城市，经营矿山，垄断贸易，成为大权在握的城市贵族。捷克的手工业者无以立足，纷纷破产，成了赤贫者，其总数约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捷克的中产阶级也受到德国城市贵族的歧视。

德国的贵族和商人在捷克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他们享有种种特权，不受捷克法律的约束，有的甚至出入捷克宫廷，俨然以捷克的太上皇自居。而捷克的王公贵族则争相与德国人攀亲结眷，模仿德国的语言和风俗。十三世纪时，一个名叫瓦茨拉夫的国王，竟以只讲德国话为荣。因此，捷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

捷克的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到处酝酿起义，以驱逐德国在捷克的殖民势力。捷克的中产阶级及中小封建主，也想趁机抬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斗争矛头首先指向由德国僧侣贵族直接控制的天主教会。领导者是捷克著名的爱国者约翰·胡司。

胡司(约1369—1415年)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在农村度过。139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文学系学习。毕业后，于1401年担任了该校文学系主任，次年又被推选为布拉格大学校长。此外，他还充任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的传教士。胡司作为中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情地揭露僧侣贵族的腐败堕落，并指出其根源在于教会掌握了大量的地产。1412年，教皇派人在布拉格兜售“赎罪券”，胡司怒斥教皇的这一无耻行径，号召人们拒绝购买。同年6月，胡司的学生哲罗姆在布拉格组织了一次反

对教皇的示威游行。布拉格大主教为此开除了胡司的教籍。

不久，胡司被迫离开布拉格，来到捷克南部的山羊堡一带。在那里，他深入郊区农村，广泛接触农民。他写道：“起先我在城里和街上讲道，现在我在围墙附近，在名叫山羊堡的堡寨附近，在通路和村道上讲道。”胡司虽然猛烈地抨击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并不主张消灭封建制度。然而革命农民却从胡司的说教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即不但要反对天主教会，而且要埋葬整个封建制度。

1414年，欧洲的一些封建统治者——教皇、主教、皇帝、国王以及大批达官显贵，在德国南部的康斯坦次举行宗教会议，主要目的是策划镇压日益高涨的“异端”运动。会议“邀请”胡司出席，德国皇帝西吉斯孟德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胡司为了伸张正义，毅然赴会，但一到康斯坦次，即被逮捕，关押在一个阴湿腥臭的地窖里。在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面前，胡司坚贞不屈。1415年7月6日，会议以“异端”的罪名，将胡司烧死在火刑柱上。

胡司遇害的消息传到捷克，顿时激起了一片抗议声浪，焚烧胡司的火花在捷克的土地上点燃了燎原的革命烈火。

1419年7月22日，来自捷克各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共四万二千多人，聚集在捷克南部的塔波尔山上，树起造反大旗。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是在胡司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通常称之为胡司战争。

塔波尔山的惊雷，震撼了整个捷克的大地。7月30日，布拉格警钟齐鸣，市民们举行武装起义。起义者到处捣毁教堂寺院，惩治反动官吏，驱逐德国贵族，并攻占了市政厅。国王



塔波尔军的统帅杰士卡(中)

瓦茨拉夫惊惧而死。布拉格的起义迅速波及到捷克的许多城市和广大农村。

胡司战争的参加者,成份复杂,基本上分成两派,即塔波尔派和圣杯派。

塔波尔派因其根据地在塔波尔而得名,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另外还包括一些破产的骑士。塔波尔派是革命阵营中的激进派,它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国中既没有国王与臣民之分,也没有主人与奴仆之别,一切租税都将取消,一切剥削都将废除。塔波尔派的成员相互之间都是平等的,并实行财产公有。其中一部分人从事战斗和戒备,另一部分人从事生产劳动,定期轮换。无论作战和生产,均有妇女参加。约翰·杰士卡(1378—1424年)是塔波尔派杰出的领导者。

圣杯派是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其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

和中小封建主。布拉格城是圣杯派的活动据点。圣杯派的主要目标是想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夺取由德国人霸占的教会财产，建立捷克民族教会，从而把捷克城市及教会的管理权抓到自己手中。他们的口号是：俗人也应领受两种圣餐——面包（代表耶稣的肉体）和红酒（代表耶稣的血液）。因为按原来的规定，只有教士才能领受这两种圣餐，俗人只能领受面包，而不能领受红酒。争得领受这两种圣餐的权利，就象征着中产阶级和中小封建主与教士是平等的。于是，盛酒的“圣杯”就成了这一派的名称。

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于胡司战争的滚滚洪流，惊恐万状。1420年夏，德皇西吉斯孟德亲率几十万名十字军，分兵数路，杀气腾腾地扑向布拉格。布拉格的安危，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全体捷克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入侵者。7月14日，在布拉格城郊的维特科夫山，杰士卡亲自率领塔波尔军，重创十字军，解救了布拉格。第一次十字军入侵被粉碎了。为了纪念杰士卡的卓越功绩，捷克人民将维特科夫山改名为杰士科夫山。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421年秋和1422年夏，又先后发动第二、第三次十字军入侵。杰士卡领导塔波尔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接连取得反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

塔波尔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几倍于自己的敌人，除了以杰士卡为首的塔波尔军将士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英勇作战而外，他们发明的一种“大车战术”，在战胜顽敌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战术的大致情形是：把普通的木制大车，改造

成一种非常灵活的战车，行军时用以运载輜(zī 孜)重粮秣，乘坐伤员妇孺；交战时用锁链将若干大车连成一个圆形阵地，装上轻便的火炮，战士隐身其间，巧妙地打击敌人。这种战车战术对付十字军的骑兵十分有效。十字军一听到塔波尔军战车的隆隆声和塔波尔战士的雄壮歌声，就胆战心惊，望风而逃。

1424年10月11日，杰士卡不幸病逝，大普罗科普被推举为塔波尔军的统帅。

1427年夏，德皇西吉斯孟德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分兵四路疯狂进犯捷克。6月16日塔波尔军与十字军会战于拉贝河上的乌斯提城郊。十字军拥有七万多人，塔波尔军不足二万人。大普罗科普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术，猛击敌人的精锐骑兵，结果以少胜多，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西吉斯孟德仓皇逃回德国。

塔波尔军为巩固胜利成果，1429年底，在大普罗科普的统帅下，分兵五路开入德国境内，攻占了萨克逊、图林根和巴伐利亚大部分地区，逼近德国南部的重镇纽伦堡。塔波尔军所到之处，宣传革命真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严惩德国封建贵族。1430年2月，塔波尔军在取得重大战果之后，返回捷克。

德国皇帝贼心不死，稍事喘息之后，1431年8月，又发动了第五次十字军入侵，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德国侵略者在穷途末路之时，变换反革命策略，由赤裸裸的武装进攻，改为从革命堡垒内部找寻代理人。圣杯派就是他们的意中人。圣杯派虽与德国僧侣贵族有矛盾，但更害怕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会危及自身的利益。胡司战争之初，圣

杯派尚能与塔波尔派结成暂时的同盟，共同对敌。但是，当塔波尔军击退了第三次十字军的进攻，圣杯派的利益得到部分满足之后，便与塔波尔派发生分裂。

1433 年冬，在德国南部的巴塞尔城召开的另一次宗教会议上，德国贵族同意圣杯派在战争中夺得的教会财产不必退还，俗人可以领受两种圣餐。圣杯派心满意足，公开投入敌人怀抱。1434 年 5 月，圣杯派在德国的资助下，向塔波尔派发动进攻。两军会战于布拉格附近的里旁。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塔波尔军内部出现叛徒，致使战局急转直下，一万八千名塔波尔军，英勇战死者达一万三千人，大普罗科普也壮烈牺牲。此后，塔波尔派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斗争，直至 1452 年。

胡司战争，是“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①。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英勇无畏，顽强战斗，给予德国以及捷克的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争得了捷克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独立，从而大大促进了捷克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捷克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章。

^① 《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 199 页。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十字军东侵》一篇中，我们曾经谈到，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主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曾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不过，国都虽破，东罗马帝国并没有灭亡，其残余势力退居小亚细亚，在那边建立了尼西亚帝国。过了半个多世纪，至1261年，尼西亚依靠人民的力量，并得到热那亚的支援，赶走十字军，收复君士坦丁堡，恢复了东罗马帝国。

本篇所要介绍的，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又一次陷落。

东罗马帝国复国以后，其领土已大为缩小，只包括小亚细亚的西北角、色雷斯、马其顿、爱琴海北部的一些岛屿和伯罗奔尼撒的若干据点。经济状况也远非昔比，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优惠。十四世纪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城边建立的加拉太据点（见附图），每年关税收入达二十万金币，而东罗马在君士坦丁堡的关税收入，每年只不过三万金币。复国以后，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内讧迭起，混战连年。1321年，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1282—1328年）取消他的孙子（后为安德洛尼卡三世）的继承权，祖孙之间发生战争，一直延续到1326年，以安德洛尼卡

三世取得王位继承权而告结束。安德洛尼卡三世死后，其子约翰五世(1341—1373年)刚一继位，贵族约翰·康塔库尊就在色雷斯自立为帝，于是爆发了为期六年的争夺王位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借机大举向东罗马进攻。

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十字军东侵》一篇中提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原先都居于中亚细亚，以游牧为生。十一世纪初叶，一道西侵。十二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鲁姆苏丹国，奥斯曼土耳其人投附其下，并在萨卡利亚河沿岸得到一块封地。酋长奥斯曼(1282—1326年)袭封后，宣布独立，并积极向外扩张，蚕食东罗马在小亚细亚的领土。1326年，奥斯曼占领了布鲁萨(布尔萨)城，定为首都。后来，这个新国家就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最高统治者称苏丹。

奥斯曼的儿子乌尔汗统治时期(1326—1359年)，建立了常备军，包括步兵和骑兵。依仗这支武装力量，乌尔汗于1331年占领了尼西亚城。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海峡欧洲沿岸的加利波里，并以此为桥头堡，向色雷斯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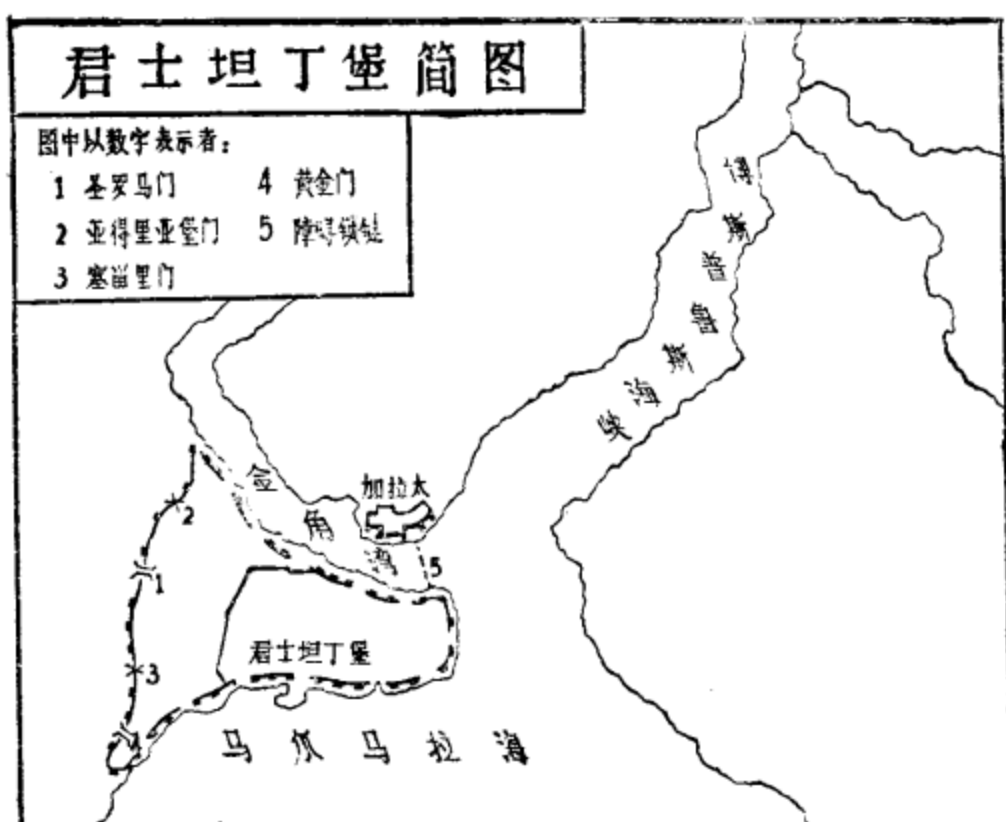
穆拉德一世在位时期(1359—1389年)，土耳其占领了整个色雷斯东部。1367年，移都亚得里亚堡(今埃迪尔内)，从而切断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半岛其它地区的联系，使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陷于孤立。1371年，土耳其在马里查河附近打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匈牙利的联军。1389年，将塞尔维亚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1393年，又征服了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1396年，迫使瓦拉几亚向土耳其称臣纳贡。至此，土耳其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须向封建主缴纳苛重的实物地租。另外，信奉伊斯兰教的农民要缴纳什一税，非伊斯兰教徒除缴纳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的土地税外，还须缴纳人头税。因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小亚细亚和色雷斯一带的农民，相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苏丹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才把各地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一登上王位，便立即着手围攻君士坦丁堡，以便彻底推翻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为此，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岸边设立了一座名为“切断咽喉”的要塞，封锁了海峡。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1448—1453年)对此提出抗议，穆罕默德却傲慢地对东罗马的使臣说：“博斯普鲁斯两岸是属于我的。既然东岸住着奥斯曼人，那么你们就不可能守卫西岸。告诉你们的君主，如果他再派人来纠缠，那我就要活剥使臣的皮。”同时，穆罕默德二世重金聘请工匠铸造攻城重炮和各种武器，建立庞大的舰队，筹措粮草，并召集熟悉君士坦丁堡地形的幕僚研究攻城方案。

君士坦丁堡位于一个海岬上，整个城市呈三角形，北濒黄金角海湾(金角湾)，南临马尔马拉海，东面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小亚细亚相望，只有西面，即三角形的底部与陆地相连，宽度约十八公里。东罗马当局在君士坦丁堡西面易受攻击的陆路防线上，构筑了两道城墙，城墙上每隔一百七十呎筑有一座堡垒。墙外是条深一百呎的护城壕。金角湾入口处用铁链封锁。城内居民约十万人。守备部队有七千人，战舰二十艘。

1453年4月6日，君士坦丁堡上空大炮轰鸣，硝烟弥漫，



疾矢如雨。穆罕默德二世亲率二十万大军和三百艘战舰，从西线对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进攻。城内东罗马守军奋起自卫，土耳其官兵始终没能越过护城壕。

随后，土耳其改用三门重炮轰击城墙。这种炮重三十三吨，长十二公尺，每发石弹重五百公斤。接着，数万名土耳其士兵带着树枝，滚动着木桶向护城壕冲去，企图把护城壕填平，以便铺平攻城的道路。君士坦丁堡守军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护城壕，打乱了土耳其人这一部署。

强攻不成，土耳其人着手挖掘一条地道，从护城壕和两道城墙的下面穿过，直通君士坦丁堡城里。但是，地道还没有挖

好，就被君士坦丁堡居民发现，用炸药把它炸毁了。

土耳其人又使用了一种活动堡垒来攻城。这种堡垒装有轮子，可以移动。堡垒外面包有三层牛皮，不易着火燃烧，里面备有充足的弹药，另备有一架用滑轮升降的云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活动堡垒，集中火力攻击圣罗马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土耳其人也没能攻入城内。

土耳其人从海上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也遭到挫败。一天，四艘热那亚军舰冲破土耳其的封锁，进入马尔马拉海，为君士坦丁堡送来补给物资。穆罕默德二世立刻派出一百四十艘土耳其战舰进行拦截，他本人亲自在岸上督战，甚至催马下到海滩。热那亚水兵在东罗马军队的配合下，击沉了土耳其的许多舰只，然后冲出包围，胜利地驶入金角湾。穆罕默德二世气得暴跳如雷，传令将土耳其舰队司令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

在陆海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土耳其认为，东罗马在金角湾的防线比较薄弱，如果能在那一带偷袭成功，将使东罗马措手不及，陷于被动。但是，金角湾的入口处防守严密，无法逾越。穆罕默德二世采纳了这样一个建议，即借道热那亚商人控制的加拉太据点。为此，土耳其人以保障热那亚在加拉太的商业特权为条件，买通了贪婪的热那亚商人。在加拉太，土耳其人用坚厚的木板铺设了一条道路，板面上又涂抹了大量牛、羊油，以减少磨擦。然后经过一夜的努力，八十艘土耳其战舰通过这条滑板，运入了金角湾。土耳其人还很快在金角湾上架设了一座浮桥，在岸边筑起了炮台。东罗马人对土耳其战舰的突然出现惊恐不安，匆忙从西部城防上抽出一部分

兵力，加强金角湾防线。

虽然军事形势对东罗马越来越不利，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军民仍然顽强战斗，打退了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5月26日至28日，土耳其人连续三天用大炮猛轰君士坦丁堡城墙，并在圣罗马门附近炸开了一个缺口，炸毁了四座堡垒。

决战的时刻逼近了。

28日这天，穆罕默德二世分三批检阅了土耳其军队，接见了海、陆军指挥官，许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土耳其官兵可以肆意劫掠三天。他说：“我给你们一座宏伟而人口众多的城市，古罗马的首都，世界的中心，任你们劫掠……你们将成为这座世界名城的征服者。”

29日拂晓，土耳其人从海上和陆上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总攻。在金角湾，土耳其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扛着云梯猛烈攻城。虽遭到东罗马士兵的反击，战果不大，但牵制了东罗马相当一部分兵力。君士坦丁堡西线的战斗最为激烈：土军分左右两翼，右翼十万人，左翼五万人，穆罕默德二世亲率一万二千名御林军坐镇中路。土军一连两次冲锋均被击退。接着，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指挥一万二千名御林军发动了第三次冲锋。由于君士坦丁堡弹尽粮绝，又无后援，土军攻入城内。东罗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看到大势已去，急忙脱去皇帝的服饰，夺门而逃，结果在混战中被土耳其人击毙。君士坦丁堡居民仍然顽强地与土耳其人展开巷战，历史记载说：“街道上和宅院中的人民都没有向土耳其人投降，而是同他们进行战斗。妇女和儿童则向土耳其人投掷瓦片……”当天夜里，土

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全城。

土耳其士兵在君士坦丁堡大掠三天，历代的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许多居民被卖为奴隶。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延续达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灭亡了。

土耳其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继续向外扩张，又先后征服了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至十六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阿尔巴尼亚的民族 英雄斯坎德培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中心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约 1405—1468 年)的雄伟铜像。它再现了斯坎德培在距今五百年前，身跨战马，手握军刀，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威武英姿。

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民族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伊里利亚人就开始定居在亚得里亚海岸一带。在历史上，阿尔巴尼亚曾长期遭受异族的野蛮侵略和奴役。公元前一世纪，为罗马帝国占领。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后，被划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东罗马帝国衰落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又乘机入侵，成为阿尔巴尼亚的大敌。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兴起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其最高统治者称苏丹。土耳其人先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然后于十四世纪中叶渡过黑海海峡，侵入巴尔干半岛。至十四世纪末，占领了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巴尔干半岛的各族人民一起，同土耳其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斯坎德培就生



斯坎德培塑像

活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斗争年代里。

阿尔巴尼亚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主力军。同时，一些有爱国心的贵族也参加进来，斯坎德培的父亲吉昂·卡斯特里奥蒂大公就是其中的一个。吉昂·卡斯特里奥蒂不甘心匍伏在土耳其苏丹脚下，曾谋取独立，不幸被敌人察觉，苏丹令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送往奥斯曼帝国的京城亚得里亚堡。就这样，1423年，十八岁的斯坎德培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可爱的祖国。

斯坎德培原来的名字叫乔治·卡斯特里奥蒂。土耳其苏丹见乔治身强力壮，灵活机警，于是送他到军事学校学习，想把他培养成忠实的奴仆。苏丹还给他起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叫斯坎德。乔治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光复祖国的坚

强决心，默默地刻苦学习骑马、击剑等军事技术，取得优异成绩。毕业后，苏丹赐以“培”的称号（一种封建军衔），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叫他斯坎德培。1438年，苏丹任命他为阿尔巴尼亚克鲁亚城的苏巴什（军事行政长官）。斯坎德培到任之后，以公开的官职作掩护，秘密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串联，积聚力量，决心赶走土耳其侵略者。1443年秋天，有利时机终于到来了。

在这前一年——1442年，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前线遭到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抗击，战事吃紧，苏丹派军驰援，同时命令斯坎德培带领一队骑兵同往。1443年11月3日，匈牙利军队渡过多瑙河，猛攻土耳其据点尼什城。土军惊慌失措，狼狈溃逃。斯坎德培决定趁机发动反对土耳其人的总起义，并立即率领三百名骑兵，风驰电掣（chè 彻）般地返抵阿尔巴尼亚中部，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克鲁亚城。

克鲁亚背山临水，形势十分险要，不宜强攻，最好智取。于是斯坎德培先把部队隐藏在克鲁亚附近的森林里，然后带领少数警卫，直闯克鲁亚。他利用一纸伪造的军令，声称苏丹再次任命他为克鲁亚的苏巴什，取得守兵的信任，进驻城内。待到夜深人静，敌军酣睡的时候，斯坎德培在群众的支持下，打开城门，引进伏兵，直捣土耳其军营。经过一夜奋战，全歼土耳其守军。11月28日清晨，斯坎德培庄严宣告：自由的阿尔巴尼亚公国光复了！接着，在这座雄伟的山城上升起了一面鲜艳的双头鹰红旗。那双头鹰象征着阿尔巴尼亚南方和北方的团结统一，象征着阿尔巴尼亚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和国徽，仍然以双头鹰作为主要

图案。

克鲁亚大捷之后，斯坎德培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乘胜前进，12月底解放了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和许多城镇。为了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1444年3月2日在莱什城，斯坎德培召开了阿尔巴尼亚各地封建领主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阿尔巴尼亚联盟”，并决定组织阿尔巴尼亚军队。斯坎德培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之后，斯坎德培巡视全国各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向广大农民进行动员，在较短的时间里，征召了近八千人的新兵。他还积极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号召战士常备不懈，时刻警惕土耳其人卷土重来。

土耳其苏丹穆拉特二世得知阿尔巴尼亚人民起义的消息，坐立不安，急忙于1444年6月，派阿里·巴夏率兵二万五千前往镇压。斯坎德培佯作退却，把敌军诱入伏击圈，出奇制胜，一举全歼来犯之敌。

1450年5月，穆拉特二世亲率大军十万，杀气腾腾地再次扑向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军民，在斯坎德培的领导下，不畏强敌，协同作战，使得土耳其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克鲁亚城下。斯坎德培将一万八千名阿尔巴尼亚军队分作三支：一支约一千五百人，由优秀将领乌兰指挥，留城坚守。另一支约八千人，由他亲自率领，驻扎在克鲁亚以北的山上。其余的人编成几支小分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土耳其人依仗自己的优势兵力，妄图迅速攻占克鲁亚。他

们在猛烈的炮火配合下，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当地农民密切配合起义军，袭击敌人的运粮队。正当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的时候，斯坎德培率领八千轻骑兵，利用有利的地形主动出击。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奋勇杀敌。穆拉特二世围攻克鲁亚四个半月，除了在战场上留下两万多具尸体而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亚得里亚堡。不久，穆拉特二世抑郁而死，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继位。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穆罕默德二世在继续进犯阿尔巴尼亚的同时，费尽心机从革命阵营内部寻找代理人。1456年，斯坎德培的侄儿、起义军的重要将领哈姆萨叛变投敌。土耳其苏丹如获至宝，任命这个叛徒为克鲁亚的苏巴什，并命令他和土耳其的将领伊沙克一起，于1457年春末，率八万军队再度入侵阿尔巴尼亚，围攻克鲁亚。斯坎德培变换战术，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实行长时间的迂回作战，最后又巧妙地把部队隐蔽起来。9月7日，当土耳其人以为大功告成，聚集在克鲁亚附近的平原上开祝捷会的时候，斯坎德培率领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会场上，杀得敌人措手不及，大获全胜。哈姆萨也被生擒，受到叛徒应得的惩处。

以后，越战越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又接连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进攻，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胜利。

1468年1月，正当斯坎德培在莱什城举行全阿尔巴尼亚大会，准备进一步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力量，坚持神圣的抗土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这位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不幸于

1月17日在莱什城病逝。

斯坎德培在近二十五年的艰苦岁月里，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抗击奥斯曼帝国的野蛮侵略，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功绩卓著。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来自酷爱独立和自由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他们所从事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斯坎德培留下的著名诗句也是这样说的：

“自由不是我给你们带来的，
是我在你们身上找到的。
不是我武装了你们，
你们早已武装好了，
自由的火焰在你们心中燃烧。”

斯坎德培所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抗土救国战争，也有力地支援了巴尔干半岛的各族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阻止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续向中欧扩张。因此，在匈牙利、波兰、德国、捷克、意大利等国的人民中间，斯坎德培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这些国家曾经出现过许多歌颂斯坎德培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艺作品。

今天，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继承和发扬斯坎德培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航路的开辟

——殖民掠夺的开始

地球是个椭圆形的，可分作东半球和西半球。东半球有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西半球有北美洲和南美洲，统称美洲。此外，在南极地方，还有一个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南极洲。在今天，这是普通的常识。然而，在距今约五百年前，东半球的人不知道西半球有大陆，西半球的人也不知道东半球有大陆，相互之间被那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海洋隔绝了。直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通过哥伦布、伽马和麦哲伦的一系列重要航行，人们才开始对地球及地球上的大陆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那末，哥伦布等人为什么要冒险远航，又带来些什么后果呢？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西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那些新兴的商人和工业资本家，狂热追求货币和铸造货币的贵金属——黄金，然后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封建贵族也到处寻求黄金，以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哥伦布曾赤裸裸地说过：“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

它，谁就能支配他所欲的一切。有了黄金，要把灵魂送到天堂，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欧洲黄金的开采量有限，而且还要用这有限黄金的一部分换取东方出产的丝绸、香料、珠宝等，因此使得欧洲的黄金十分短缺。到哪里去寻求黄金呢？

前面已经讲过，早在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哥·波罗，曾旅居中国近二十年，还到过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归国后著成《马哥·波罗行纪》一书，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东方诸国“黄金遍地，香料盈野”。后来，这本行纪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激起欧洲的商人、贵族对东方财富的贪欲。恩格斯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①

不过，到东方去的商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那时，沟通东西方的重要商路有三条：一条从中亚细亚经里海、黑海到达小亚细亚；另一条先由海路至波斯湾，然后经过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东岸；还有一条先由海路至红海，然后再由陆路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但是，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切断了欧亚之间唯一的一条陆上商路。另外两条商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东方的商品经阿拉伯人一转手，价格往往提高八至十倍。因此，欧洲各国的商人和贵族迫切希望绕过中东地区，探索一条径直通往印度

^①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0页。

和中国的海上航路。

当时,天文地理知识的扩大和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也为探索新航路提供了条件。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早已提出的地圆学说,此时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直西行可以到达东方。但没有谁知道在欧洲和东方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大陆,即后来所称的美洲大陆。十三世纪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传入西欧,从那时起,即使在茫茫大海中航行,也不致迷失方向了。造船业又为远航制造出多桅快速帆船。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完成了政治统一,实现了中央集权化。两国的贵族和商人,在本国封建专制王权的支持下,扮演了第一批近代殖民主义者的角色,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个。

哥伦布(约1451—150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城,年轻的时候就参加航海活动,坚信地圆学说。他曾细心阅读过《马哥·波罗行纪》,并且在书页旁批注了他自己的意见。1486年,他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了探寻由大西洋西航直达印度和中国的计划。1492年,西班牙国王决定给以赞助,并且封他为“在各海洋中由他亲自发现或取得的一切岛屿及大陆的海军上将”。

1492年8月3日拂晓,哥伦布率领八十七名水手,分乘三艘帆船,自西班牙南端的巴罗士港启程。不多时,海岸便消失在薄雾之中。此刻,哥伦布站在旗舰“圣玛丽亚”号的船头上,望着那漫无边际的海洋,不禁感到前途渺茫。但是,神话般富庶的东方,吸引着哥伦布和他所率领的八十七名水手径直向西驶去。

航行途中每遇到一群海鸟或一片水草,他们都以为已经

接近陆地了，然而，每次都大失所望。在水天相连的大西洋上飘泊了两个多月以后，1492年10月12日的凌晨，一名水手借着皎洁的月光，隐约看到前方有陆地。太阳升起以后，果然有一个绿树成荫的岛屿展现在这群冒险家的面前。哥伦布立即带领几个随从离舟登陆。一上岸，他首先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宣布这个岛为西班牙所有，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后来据考证，即今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误认为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印度，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接着，哥伦布又继续向南航行，到达古巴和海地。

这些贪婪的不速之客大肆诈骗当地居民的财物。哥伦布在其日记中供认：“西班牙人贪得无厌，不知满足。他们给印第安人……玻璃碎片，碎碗破盆，或别的无用之物作交换。甚至什么东西也不给，把印第安人的一切东西都抢到手上，据为己有。”在海地，哥伦布留下部分人员并从船上搬下了大炮，构筑了西班牙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他本人带着掠夺来的财富和十名印第安人于1493年3月15日回到巴罗士港。在这以后，哥伦布又曾三次横渡大西洋，到过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牙买加，洪都拉斯，巴拿马一带，并且用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加以占领，对当地居民实行殖民统治。

哥伦布直到临死之前，还以为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印度。后来，有一个名叫亚美利哥的意大利冒险家于1499—1502年到美洲活动，证实了哥伦布所到的地方并非是印度，而是欧洲人过去所不知道的一块“新大陆”。于是，欧洲人就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

哥伦布航行成功的消息，轰动了整个欧洲。野心勃勃的

葡萄牙不甘落后，加紧探寻绕过非洲南端直达印度的航路。早在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曾航行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7月8日，另一个葡萄牙人伽马(1469—1524年)率领帆船四艘，从里斯本出发，循着迪亚士走过的航路前进。同年11月，绕过好望角。1498年3月，抵达东非的莫桑比克。以后由一名阿拉伯水手领航，于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岸的卡里库特。伽马等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采购当地的香料、丝绸、宝石等，运回国后所获得的纯利相当于全部航行费用的六十倍。后来，葡萄牙人长期垄断了这条航路。

西班牙的贵族和商人对于葡萄牙人获得的惊人利润垂涎三尺，决意继续向西探寻通往东方的航路。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人麦哲伦(1480—1521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领帆船五艘，水手二百六十五名，从西班牙南部的圣卢卡港出发，横渡大西洋，再沿美洲海岸南下，穿过南美大陆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后来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了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因在当地居民之间制造不和而被杀。其余冒险家逃至马鲁古群岛，然后渡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这次航行，从实践上证明了地圆学说。

以后，欧洲各国的冒险家，又先后开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航路，如1642—1644年间，荷兰人塔斯曼两次航行到澳大利亚沿岸。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给这三大洲的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葡萄牙是一个小国，因此它不可能大规模向海外殖民，而

重点是在从欧洲通往东方的航路沿岸，建立许多坚固的军事据点和商站，如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印度西岸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以及中国的澳门等，用抢劫、走私、诈骗等方式掠夺财富。据统计，在十六世纪内，葡萄牙单从非洲就掠走了二十七万多公斤黄金。葡萄牙建立的唯一广袤的殖民地是位于南美的巴西。

西班牙重点是对美洲进行殖民征服，奴役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土著居民，当哥伦布第一次到美洲时，总数估计约有三千万。他们分成许多部落、部族或民族，散布于整个美洲。墨西哥一带的阿兹特克人，秘鲁和智利北部一带的印加人，都曾经创造了发达的文化。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后，西班牙很快占领了西印度群岛。接着，1519年，殖民强盗科泰斯入侵墨西哥，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大肆烧杀掳掠。1531年，另一个殖民强盗皮萨罗入侵秘鲁，灭印加帝国。皮萨罗一伙，仅在1532年11月16日这一天里，就血腥屠杀了一万多印第安人。不久，西班牙又征服了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等地。除了公开劫掠印第安人的财富而外，西班牙殖民者还强迫印第安人开采金银矿，种植甘蔗，致使无数印第安人被活活折磨而死。至十六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只剩下一千五百万人了。欧洲殖民者又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自1545至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掠走黄金五千五百公斤，白银二十四万六千公斤。

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争夺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为此，罗马教皇于1494年和1529年两次出面斡旋，为它们划定了分界线，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教皇子午线”。大致说来，美洲为西

班牙的势力范围，非洲和亚洲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是西方殖民主义第一次瓜分世界。然而，两国没有、也不可能严格遵守那项规定。后来兴起的英、法、荷兰等国，更是不予承认。因此，各个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

新航路的开辟，及随之而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给欧洲本身的经济生活也带来巨大影响。欧洲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昔日繁华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商业地位一落千丈。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尼德兰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逐渐发展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埠。另一个经济后果是所谓“价格革命”。掠夺殖民地的大量金银流入欧洲后，使得欧洲市场上硬币的流通量在十六世纪增加了三倍以上，从而引起商品价格飞涨，货币购买力降低。自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至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上涨四倍多，英、法等国上涨两倍至两倍半。资产阶级一方面剥削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另一方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价格革命”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新航路开辟后对欧洲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时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32页。

达·芬奇

山峦起伏的意大利半岛，象一只靴子伸进碧波万顷的地中海。在中世纪，意大利曾经是西欧与东方贸易往来的枢纽，工商业比较发达。十四、十五世纪，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个随之而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狂热地聚敛资本，残酷剥削雇佣工人；同时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以揭露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腐朽与黑暗，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为日后推翻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舆论准备。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①。

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十六世纪达到高潮。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达·芬奇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1452年4月15日，列奥纳多·达·芬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做芬奇的小镇上。他父亲是个殷实的公证人。芬奇从小喜爱绘画。1466年，十四岁的芬奇进入佛罗

^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它还不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而是打着“再生”和“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旗号，反对封建神学。“文艺复兴”即由此得名。

伦萨著名画师安德烈·弗罗基俄的画坊，专门学习绘画。芬奇在这里学习、工作了十多年。

在意大利各城邦中，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和艺术流派十分活跃，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反映得特别强烈。在佛罗伦萨，芬奇不只是走进了一个画坊，而且是投入了阶级斗争的滚滚激流。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下，芬奇迅速成长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名战士。他痛斥封建统治者“骄横是无约束的”，不满资产阶级的屈辱地位，说：“疏忽大意的自然！你为什么这样偏心，对于你的某些儿女是慈祥的生母，对于你的另一些儿女却是顶酷毒无情的庶母？我看到你的儿女们做了旁人的奴隶，没有受到一点好处，替他们服劳后不但得不到报酬，而且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芬奇用他的画笔鞭笞封建阶级，反映资产阶级的希望和理想。

当时西欧的绘画艺术，处在封建神学的严重束缚下。天主教会宣扬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以灵魂；人有现世和来世，现世的人如果满足肉体的欲望，灵魂就会堕落，因此必须实行禁欲主义，抛弃现世的一切欢乐和享受，以期来世升入天堂。从这一反动说教出发，天主教会反对人们从事文学和艺术活动，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享受，与禁欲主义格格不入。虽然教会有时也利用文学艺术为神学服务，但是要加以严格的限制。比如，画中题材多为圣经故事，而且为了显示神的威严，吓唬人民，总是把婴儿时代的耶稣画成干瘪的小老头，把成人时代的耶稣画成可怕的判官，而圣母则画得冷漠、呆滞，没有丝毫感情。当时画家笔下的人物往往苦涩憔悴，暮气沉沉。

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同封建阶级和天主教会相对抗，打出了人文主义这面旗帜。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宣扬的来世说和禁欲主义，肯定现实生活，重视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发展个性，即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才能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总之，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

当然，正如封建阶级所鼓吹的“神性”，不是别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封建阶级的阶级性一样，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性”，也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其核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芬奇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在绘画艺术中，着眼现实生活，热爱大自然，努力创作真实、生动而又健美的艺术形象。为此，他曾精心观察大自然，对鸟类的飞翔、昆虫的形态、植物的枝叶，都作过仔细的分析、写实，并从理论上对透视、光线等，作了探讨。尤其可贵的是，芬奇为了确定人体的正确比例和结构，亲自解剖尸体。他积累下来的厚厚一本尸体素描中，先是勾画出全身骨骼结构，随后添入神经，最后加上肌肉，每一部分都密密麻麻地写满文字解说。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所有文字都用左手自右至左书写。这种“怪字”，只有少数几个知己借助镜子才能读懂。

芬奇不屑临摹旁人的作品，认为这样做将会使艺术趋于衰落。他说：“画家如果拿旁人的作品做自己的典范，他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努力从自然事物中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芬奇虽然注重学习自然，但并不主张机械地反映自然，他说，如果画家“只是凭眼睛和技术作画，而没有任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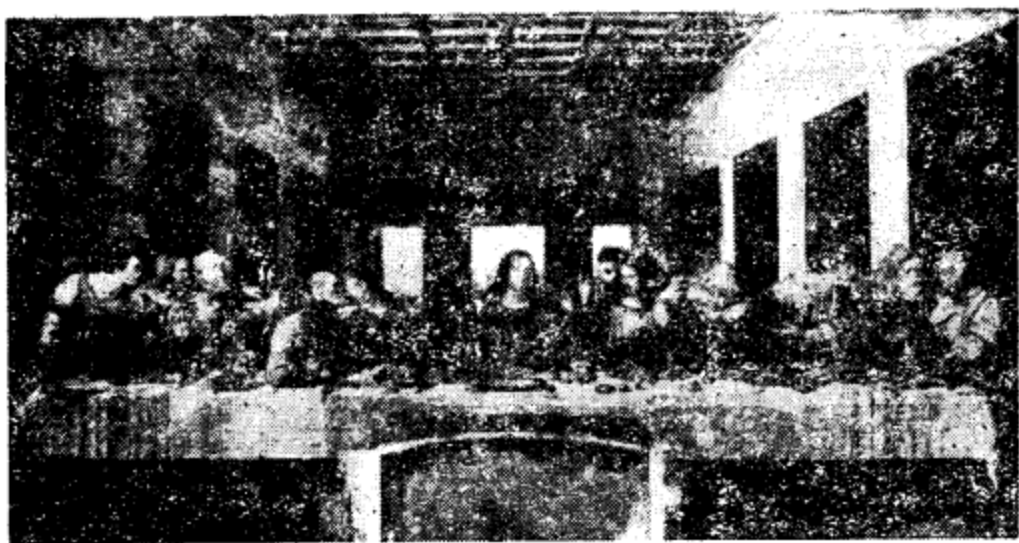
想,就好像一面镜子,只是将放在面前的事物原封不动地照进去,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物的存在”。

1476年,芬奇的老师弗罗基俄承担制作一幅画卷的任务,由芬奇作助手。弗罗基俄是个拘泥于教会思想的画家,手法迂腐守旧,枯燥平淡。而芬奇在画卷上绘作的一个天使,神态自然而活泼,典雅而生动。这一崭新的艺术形象,使得弗罗基俄绘作的部分黯然失色。弗罗基俄见芬奇有如此高的才华,惊叹不止。但弗罗基俄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政治上代表进步的社会力量,艺术上才能有所创新。

约1482年,芬奇离开佛罗伦萨来到米兰。他除了挥笔作画而外,还研究了各种学科,如数学、解剖学、生物学、光学、力学、地质学等,并发现了许多科学原理。芬奇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只有通过实验证实的科学知识才是可靠的。芬奇还设计过磨坊、漂布机,绘制过房屋建筑的蓝图,研究过清除港口淤泥和汲水的办法,甚至还设计过飞翔机器。恩格斯曾指出:“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①

芬奇的代表作是《最后的晚餐》,这是他为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食堂所作的一幅壁画,作于1495至1497年间,取材于新约全书上犹大出卖耶稣的传说故事。画面表现当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十二门徒表情的激烈变化。画面向人们展示,耶稣的话音一落,犹如一块巨石掷进平静的湖面,晚餐的气氛立即以耶稣为中心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445页。



《最后的晚餐》

激荡起来。

在整个构图上，餐桌两端的门徒左右呼应，把全部人物引向中心。左端的三个门徒，面向耶稣，自成一组，似乎在谈论刚才耶稣所讲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尤其是左端第一个门徒，手按桌面，怒不可遏，仿佛要立即把叛徒揪出来，将他碎尸万段。与之相对的右端的三个门徒也在议论纷纷。紧靠耶稣右侧的三个门徒，心地比较单纯，或作怀疑，或作惊讶，或在表白自己的忠诚。紧靠耶稣左侧的彼得，情绪激昂，好象在问坐在身旁的约翰，谁是叛徒？手中的餐刀，无意识地对着叛徒犹大。犹大这个恶棍，犹如突然遭到雷殛，惊慌失措，身体向后倾倒，脸色灰白，右手紧握钱袋。整个画面在犹大身上显得特别阴暗。坐在中央的耶稣，庄严、静穆、安祥，背后衬以明亮的窗户，更显得光明磊落。芬奇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借宗教题材，画出世俗社会中活生生的斗争，表现了他对正义力量的颂扬和对叛徒的谴责。为了这幅画，芬奇呕心沥血，有时大半天

坐在画前沉思，提炼画中的人物形象。修道院的主教唠唠叨叨，催他赶快画完，认为象他那样深思熟虑完全没有必要。米兰公爵也曾把主教的意思婉转地告诉芬奇。芬奇不屑辩解，只说画中还缺两个人的头像，一个是耶稣，因为还想不出救世主应该具有怎样的容颜；另外还缺一个犹大，因为很难找到一副合适的相貌，足以表现这个败类。芬奇辛辣地说，后一空缺，万一找不到，只好把主教的头借来一用。芬奇这幅画在构思的戏剧性，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和现实生活的表现力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效果，做到了确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张人物画，或其他形式的人物表现，应该做到使人一看就很容易从他们的姿势中，觉察他们的思想，……就好象一个聋子看人讲话，虽说他不能听见，但依然可以从两人说话的动作姿态中，揣度他们讨论的主题。”

芬奇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约1503年，他完成了著名的肖像画《蒙娜丽莎》。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代表作品之一，现存巴黎卢佛博物馆。那时，作者已经不再取材于宗教传说了，而是直接描绘现实社会里的一个贵妇人。画中的蒙娜丽莎嘴角微皱，脸带微笑，显示出某种青春的活力，而她那双别具神采的眼睛，使得发自她内心的喜悦之情跃然画面。当时的资产阶级生气勃勃，对资本主义的明天充满着希望。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但是，资产阶级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也绝不是象蒙娜丽莎那么温文尔雅。资产阶级的本质与特征，是在“自由”“平等”的面纱下，血腥地榨取剩余价值。就在芬奇诞生之前及其生活的年代，意大利曾爆发过数次雇佣工人反对工场

资本家的起义，结果都被残酷镇压下去了。芬奇无视这种现实，把资产阶级吞噬劳动人民的血盆大口，完全掩盖在“微笑”的后面了。

芬奇的创作题材虽然较中世纪宗教画家广泛，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必然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人民排斥于画面之外。

芬奇的一生，作为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始终受到意大利封建贵族的冷落和天主教会的迫害。1517年，白发苍苍的芬奇被迫离开意大利，移居法国。1519年5月2日死于法国。

芬奇以自己的绘画为资产阶级呼号，资产阶级却并不珍视芬奇的作品，而是把它当作商品买卖牟利。芬奇的名画《圣母、圣子与圣安尼》素描稿，是芬奇的杰作之一，它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珍藏了一百八十三年之后，于1962年6月被标价一百万英镑拍卖掉了。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和天主教会，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了舆论准备。芬奇的艺术生活，反映了这个运动的一个侧面。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1967年版第624页。

哥 白 尼

著名的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尼古拉·哥白尼，于1473年2月19日诞生在波兰托伦城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十岁那年，他失去父亲，此后便由在弗洛恩堡大教堂担任教士（后升任主教）的舅父抚养长大。哥白尼读了小学和中学，又于1491年离别故乡托伦，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学习。

克拉科夫是当时波兰的首都，也是东欧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文化中心。同时，由于它地处东西欧交通要冲，因此比较早地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在克拉科夫大学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与封建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两派学生甚至发展到在大街上相互械斗。年轻的哥白尼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思想深处理下了向经院哲学挑战的种子。教师当中，对哥白尼影响较大的，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天文学和数学教授勃鲁采夫斯基。哥白尼经常去向这位教授请教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一起使用天文仪器观测天象。这一时期，哥白尼还搜集和阅读了许多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书籍，并在书的空白处作了注解。

哥白尼自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后，他的舅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外甥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和对于天文学的爱好，决定为哥白尼谋求一个教士的职位，以便忠实地为天主教会和封建制

度服务。而要当好一个教士，必须通晓管理教会的法律。因此，1496年，哥白尼受舅父之命，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留学。

意大利是罗马教皇的驻地，天主教会的反动中心；同时又是新兴资产阶级同没落封建地主阶级激烈斗争的重要战场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哥白尼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便立即卷入时代的漩涡，“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①。

那时的西欧，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和它所宣扬的宗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凡是违背宗教教条的一切言论和学说，都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残酷迫害。恩格斯指出，当时“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②。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是突出的一例。

地球中心说，最早是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加以推演和论证，使之系统化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形体，地球静止不动居于中心，而日、月、星辰均围绕地球运转。地心说较之最初的天圆地方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封建教会却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它来维护封建制度。教会胡说上帝创造的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而日、月、行星只不过是上帝创造出来点缀宇宙的装饰品，正如地球上的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446页。

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0页。

江河、森林、五谷、牲畜，是上帝为满足他的“子民”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样。因此，托勒密的地心说逐渐和神学融为一体，成了宗教神学的重要理论根据，被教会奉为金科玉律，统治了欧洲一千多年。

然而，哥白尼所生活的时代，西欧尤其是意大利，已经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一天天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扩张，势必要开展一场反对封建宗教束缚的斗争，而无情地批判作为宗教神学婢女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成了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随着哥伦布西渡大西洋，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功，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在茫茫的海洋上确定船只的位置，计算时间，就需要精确地测定天体的位置，计算其运行轨道，以便编出切合实际的航海历书。

另外，观察天象的仪器制造业，在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也有了相当的进展。各地技术熟练的工匠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如星盘、日晷、子午仪、象限仪、春分仪、屈光仪、浑天仪等，这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哥白尼正是在社会已经为宇宙概念的革命准备了条件的背景下，开始了批判地心说、创立日心说的斗争。

哥白尼来到意大利以后，先入波伦亚大学学习教会法。但是，他的兴趣根本不在教会法上。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外，他把相当大的精力用来攻读天文学和数学。哥白尼还结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波伦亚大学天文学教授达·

诺法拉，并得到他不少有益的启示。他们经常在一起遥测宇宙，记录数据，研讨前人的天文学著述，作新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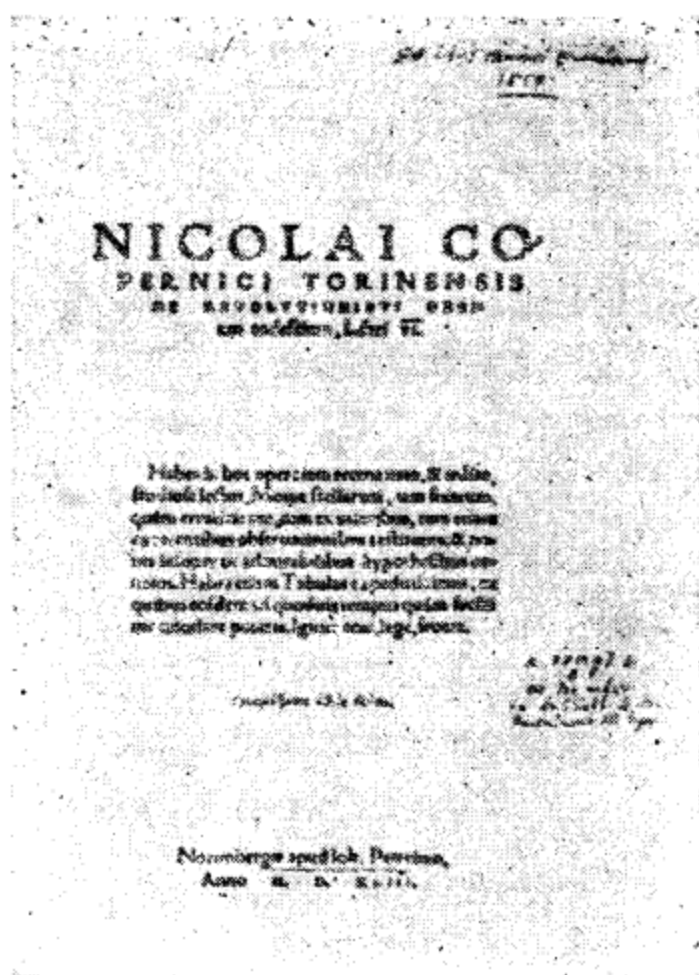
为了直接阅读古希腊的著作，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哥白尼学会了希腊文。从古希腊的著作中他了解到，早在公元前，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就提出了地球在自转和绕太阳运动的观点。

1500年，哥白尼到罗马住了一年。在那里，他坚持观测天体，作了多次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讲演，还与一批天文学家交换了对宇宙结构的新认识。后来，哥白尼又先后进入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和法拉腊大学学习教会法和医学。不过，他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天文学。

1506年，哥白尼满怀资产阶级的革新精神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回到自己的祖国。此时，他被批准加入弗洛恩堡大教堂的教士团。这使他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障，并获得充裕的时间来从事科学实践活动，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

哥白尼先是在黑耳斯堡他那担任主教的舅父身边，充当私人医生和秘书。1512年，舅父去世后，哥白尼回到弗洛恩堡大教堂担任教士。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哥白尼特意选择教堂围墙上的箭楼作为宿舍，并在里面设置了一个小天文台，用自制的简陋仪器，坚持观测天体达三十余年。他所著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内中选用的二十七个观测事例，有二十五个就是哥白尼在箭楼上亲自观测记录下来的。

《天体运行论》是一部长达六卷的巨著。在这部书中，哥白尼记录了日食，月食，火星冲日，黄赤交角，春分点的移动等将近30种观测情况。他大胆地提出：一、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天体运行论》扉页

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二、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普通行星，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远比地球与其他恒星的距离为小；三、人们每天看到太阳由东向西运行，是因为地球每昼夜自转一周的缘故，而不是太阳在移动；同样，天上的星体看上去在不断移动，也是因为地球本身在转动，而不是星体围绕着静止的地球转动；四、火星、木星等行星在天空中有时顺行，有时逆行，这是因为他们和地球一起各依自己的轨道绕太阳转动，而不是因为他们动作奇特，行踪诡秘；五、

月亮是地球的卫星，一个月绕地球转一周。这样，哥白尼通过他所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把被地心说颠倒了一千多年的日地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

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还对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一些“论据”作了批驳。托勒密及其信徒说：倘若地球在空间运动，地球上的一切东西就应随着地球的运动而飞散；现在地球上的东西并没有飞散，可见，地球是静止的。对此，哥白尼指出，地球在运动，而地球上的东西没有飞散，这是一种“自然法则”（由于时代的局限，哥白尼还不能用地心引力来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笼统地归之于“自然法则”）。他还指出：“为什么不承认天穹的周日旋转只是一种视运动，实际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呢？正如维尔吉尔（古罗马诗人）的史诗中艾尼斯的名言：‘我们离港向前航行，陆地和城市后退了’。因为船只静静地驶去，实际上是船动，而船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是静止的，船外的东西好象都在动。由此可以想象，地球运动时，地球上的人也似乎觉得整个宇宙在转动。”这是多么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

哥白尼深深意识到，他的《天体运行论》一旦发表，必然会遭到封建教会的反对，因此在踌躇了三十六年之后，才同意拿去付印。而当拿到书时，他已在病榻上躺了一年多了，据说，他只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了，其时是1543年5月24日。

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不只是宇宙观的重大革命，而且在社会革命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因为这一学说根本改变了地球在旧宇宙观中的特殊地位，揭穿了宗教神学伪造的谎言，使上

帝这个不可侵犯的偶像，也随之而动摇了。从此，封建神权受到沉重打击；被宗教迷信窒息的自然科学获得了新生。

伟大导师恩格斯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给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①。

然而，“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② 日心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反动保守势力诬蔑和围攻。《天体运行论》还在印刷时，出版商就曾匿名伪造了一个序言，假说日心体系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连赫赫有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攻击日心说背叛圣经，“颠倒了全部天文学”。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是，真理的光辉决不是一纸禁令所能遮挡的。继哥白尼之后，布鲁诺、伽里略及牛顿等人，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

当然，哥白尼也受到时代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他只是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移到了太阳，而不能最终地放弃宇宙中心和宇宙有限论。那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只达到直径为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446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389页。

三十亿公里的太阳系。这就是哥白尼所谓的宇宙。以后人们逐渐“跳”出了太阳系,认识到直径为十万光年的宇宙(一光年等于九万四千六百零五亿公里),即包括着一千多亿颗恒星的银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观测技术的提高,人们的认识又超越了银河系,了解到在银河系外面,还有许多与银河系不相上下的星系。这些星系又分别组成了不同等级的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总星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观察所及已达一百亿光年以上的空间范围,记录到的河外星系达十亿个以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宇宙是没有中心的,是无限的。

莫尔及其《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所著《乌托邦》(全名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第一次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所说的“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①,就是指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1568—1639年)的《太阳城》。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源出希腊文 ou (无)和 topos (处所),意即“乌有之乡”,中文按其意思,译作“空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莫尔,1478年2月7日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三岁那年,父亲把他托附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府邸经常“高朋满座”,广泛谈论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问題。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

牛津大学是英国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荟萃(huì cuì 慧脆)于此。人文主义,源于人文学科,本是指区别于传统神学的大学学科,如天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后来,人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58页。

文主义泛指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人文主义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所谓人性和个性自由,用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代替教会的禁欲主义。人文主义反映了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为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制造舆论。因此,当时它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莫尔在牛津大学期间,受到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后来,他还结识了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兹莫(约1466—1536年),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494年,莫尔受父命从牛津退学,转入新法学院,研究法律。不久,莫尔作为一名律师,在伦敦崭露头角。1504年,莫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英王亨利七世以给女儿购置嫁妆为名,向国会索取一笔巨额补助费。莫尔在国会发言,表示反对。亨利七世因而对他怀恨在心。之后,莫尔被迫脱离国务活动,重操律师旧业。

1509年亨利七世死去,其子亨利八世即位。亨利八世罗致各方面的人才为其服务。1510年,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1515年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①,调解商业纠纷。《乌托邦》一书就是以第二次出使为背景,于1516年写成的,并于同年在尼德兰的卢文城出版。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得到亨利八世的器重。1521年莫尔被任命为副财政大臣,1523年被任命为下议院议长,1529年又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

1533年,亨利八世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与罗马教皇决裂,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国会通过

^① 加来是法国领土,位于多佛尔海峡(加来海峡)之滨。当时为英国占领。

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莫尔虽然一贯激烈抨击教会的黑暗腐败，但对于英王所实行的宗教改革，则认为只会进一步加强英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而表示反对，并且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英国教会的首脑。为此，亨利八世把莫尔逮捕起来，幽禁在伦敦塔。一年多以后，1535年7月6日，将莫尔处以死刑。

莫尔所生活的年代，即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正是英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由于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羊毛需求的急剧增加和羊毛价格的不断上涨，养羊比耕作更为有利可图，一英亩牧场比两英亩耕地的收益还大。于是，地主贵族竞相用暴力把农民赶出他们的家园，然后用篱笆将大片土地圈作牧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称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英国，圈地运动延续了几个世纪。

失去家园的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者，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英国封建王朝担心大批农民的破产会影响政府的税收来源和兵源，危及社会治安，因此制定了一系列血腥立法，残酷迫害和镇压流浪者。广大的无产阶级前身——破产农民，到处掀起了反对圈地运动的斗争。

莫尔目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和人民的流离失所，很为愤慨，他在《乌托邦》一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草就满足了，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马克思在论述圈地运动时，引用了莫尔关于“羊吃人”这一生动比喻。

十六世纪初，正值哥伦布开辟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以后不久，那些远航归来的冒险家，纷纷将在美洲等地的见闻介绍给欧洲人。这当中有大量的关于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景的报道，比如，他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鄙视黄金珠宝等。莫尔从这些原始公有制的材料中得到启发，并联系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

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采用了他与一位远涉重洋归来的葡萄牙水手希斯拉德谈话的形式，由希斯拉德来讲述他所亲眼见到的有关乌托邦社会的情景，以便增强真实感。其实，希斯拉德和乌托邦都是莫尔设想出来的。

《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莫尔激烈抨击当时的英国社会。他指出，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象雄蜂一样”，好逸恶劳，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广大劳动人民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

莫尔从分析大量的社会现象中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他说：“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家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他主张社会改革要治本，不能治标，局部性的改革，无济于事，根本的问题在于废除私有制。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中，莫尔以丰富的想像力，精心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

乌托邦社会建筑在一个叫阿布拉克萨的岛上，四面海水环绕，全岛分布着五十四个城市，规模都差不多，语言、风俗、

制度、法律完全一样。首府亚马乌罗提位于岛的中心，以便于四方代表聚会。

乌托邦是个公有制社会，一切土地、房屋、生产工具都为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对居民的房屋每隔十年要抽签调换一次。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劳动产品在各城市之间可由国家无偿调拨，互通有无。乌托邦社会不存在商业和货币，人们鄙视金银，把金银做成便桶、溺器。莫尔指出：“乌托邦人不使用金钱，对于金钱就根本不会起贪心，因而也就省去了无数的烦恼！而且这就铲除了一个多么大的罪恶根源！”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莫尔第一个设计了人人关心集体富裕，没有个人私有财产的理想社会。

乌托邦的主要生产部门为农业和手工业。农业不是一种专门职业。农业劳动采取义务劳动制，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两年，学会耕种技术。农忙季节，还可以从城里抽调劳动力参加突击。城里居民每人要选择一种手艺作为专门职业。在这里，莫尔已经考虑到消灭城乡差别问题。但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劳动基础上的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

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家庭成员不限于血缘关系。农村每户成员不少于四十人，城市不少于十六人，外加儿童若干人。家长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户与户之间人口不平衡的可以相互调整。城市每个家庭只从事一种手工业生产。乌托邦的家庭，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生产队或手工作坊。当时在英国，无论是农业或是手工业，都是小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莫尔关于乌托邦家庭的设想，显然是受到这种历史条件限制的。莫尔也不可能了解，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

主义和私有观念。

乌托邦人“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里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农田里实习。”劳动者除了工作以外，业余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有益的娱乐。这有利于体力劳动者知识化。但是，脑力劳动者，包括少数管理人员及学者却可以免除体力劳动。而且，乌托邦岛上还存在奴隶，其来源是本国罪犯和买来的外邦人。奴隶身戴枷锁，从事最肮脏最粗笨的劳动。很明显，保留奴隶劳动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

乌托邦岛上人口增殖多了怎么办？莫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向外扩张，强占别国土地，建立殖民地。他说：“乌托邦人宁可让殖民地式微凋零，却不愿看到自己岛上的城镇衰落下去。”这种殖民者的言论，是莫尔思想中的糟粕之一。

莫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受到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主张国家要由哲学家当国王。莫尔说，乌托邦必须由“贤人”来统治。在《乌托邦》里，他描写了一个名叫马托普的开国英雄，乌托邦的一切制度都是由他创立的。莫尔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列宁指出：“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①。因此，莫尔的乌托邦，只是一种仙山琼阁、海市蜃楼。

莫尔对阶级斗争的无知，必然导致对革命的恐惧。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反对闵采尔所领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特别攻击在农民战争爆发前受到闵采尔支持的异端教派——再

^①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九卷，第431页。

洗礼派。他说：“德国现在每天所产生的妖怪比非洲一向所产生的还要多，还有比再洗礼派更荒谬的吗？可是这场疫病不到几年居然到处蔓延开了”。这种对于人民革命运动的敌视态度，注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破灭。

总之，托马斯·莫尔通过《乌托邦》一书，批判了英国的社会制度，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设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实行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莫尔的乌托邦客观上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无产阶级的先驱者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继莫尔之后，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给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了具体途径和必须依靠的阶级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①空想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时候走向反动，并逐渐没落，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空想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从根本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路明灯。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83页。

欧洲的宗教改革

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威登堡大教堂门口，几个天主教會的僧侶正在為教皇修繕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兜售“贖罪券”，聚斂錢財，口里還不停地喊着：「當購買贖罪券的“錢幣”扔在錢櫃中叮噠作響的時候，靈魂即應聲飛入天堂」。這時，一個三十多歲的神甫走過來，猛然朝教堂的正門上貼了一張紙，上面寫滿了字。附近的人們紛紛圍上前去，以為教會又發布告示了。可是識字的人一看，不禁十分驚愕。這不是教會的告示，而是一份反對教皇出售贖罪券的論綱，共有九十五條。其中第八十六條這樣寫着：「教皇是一切富人中的最富有者，為什麼不用他自己的錢來修繕聖彼得教堂，而必須花費可憐的信徒們的錢呢？」張貼這份九十五條論綱的年輕神甫，就是歐洲宗教改革的倡導者馬丁·路德。

歐洲的宗教改革盛行於十六世紀。它不是一般的宗教之爭，而是市民^①和資產階級反對天主教會和封建制度的一種社會改革運動。

十五、十六世紀，在西歐各國，資本主義因素發展起來，早期資產階級也跟着出現了。他們為了擴張其經濟政治勢力，

^① 在中世紀西歐，市民，又叫市民階級，通常指城市中的工商業階層，即資產階級的前身，不泛指全體城市居民。

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制度的支柱天主教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中世纪欧洲，“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①。

宗教改革为什么首先在德国爆发呢？这就要具体介绍一下当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德国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在一些生产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手工工场日见增多。采矿业和冶炼业相当发达，矿工人数达十万人。白银是当时欧洲的主要交换手段，而德国一国的产量就占了整个欧洲的大半。德国地处东、西欧交通要冲，商业也比较兴盛。

但是，与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德国的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农业不及英国和尼德兰，工业逊于意大利和英国。德国经济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的分散性。德国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象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那样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

德国经济的分散性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宗教改革前，德国有七大选侯——德国皇帝由这七大诸侯选举产生。此外还有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他们各霸一方，混战不已。国内关卡林立，币制不统一，达千种以上。这种政治上的分裂转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①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1页。

德国的分裂，给教皇和天主教会扩展其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可乘之机。教会占有德国地产的三分之一，许多高级僧侣，如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本身就是帝国诸侯。七大选侯中，僧侣选侯就占了三人。教会在德国征收的什一税，名目繁多，有大什一税（谷物）、小什一税（蔬菜）、血什一税（家禽），以及葡萄酒什一税、牧草什一税及开垦什一税等。此外，教皇还在德国大肆兜售赎罪券。教皇胡说，凡是有罪的人，只要买了这一纸空文，死后灵魂即可升入天堂，免受地狱之苦。根据罪恶的大小，还订出了赎罪券的价格表，如赎杀人罪是七个杜尔登（币名），赎抢劫教堂罪是九个杜尔登，赎谋杀双亲和兄弟姐妹罪是四个杜尔登。出售赎罪券收入的相当部分，要奉献给教皇，其数目每年达三十万杜尔登，因此德国有“教皇的奶牛”之称。那些披着袈裟的僧侣，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群众讥讽他们是“贪得无厌的禽兽”。

封建诸侯及天主教会的反动统治，和对人民群众的巧取豪夺，使得德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决不是偶然的。

宗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1483—1546年），出身于矿主家庭。十八岁那年，他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法律，接触到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法学的研究，进入寺院学习神学。从1508年起，担任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曾周游各地，并到过罗马，耳闻目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腐败糜烂。路德基于德国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提出要改革天主教会。路德宗教思想的主要之点，亦即后来路德教的核心，是所谓信仰得救。本来，天主教会宣扬说，

人死后要使灵魂得救，即升入天堂，必须履行由教士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而路德则认为，一个人只要虔诚信仰上帝，死后灵魂就可得救，根本不需要通过由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因此他提出取消教阶制和教会的繁文缛节，建立所谓“勤俭教会”。1517年，他在威登堡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0年，他当众焚毁了教皇开除他教籍的诏谕，并且宣称教会没有教皇也能存在，要求建立摆脱教皇控制的德国的民族教会。

路德点燃的星星之火，在到处布满干柴的德国，立即形成燎原之势。除市民和资产阶级而外，以托马斯·闵采尔为领袖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也积极投入到宗教改革运动中来。不过，他们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路德宗教改革的范围，公开提出要摧毁封建制度，消灭一切诸侯、骑士和城市贵族，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差别的理想社会。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闵采尔领导的这场运动直接发展成为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

但是，路德在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面前，退缩了，背叛了。他公然投入了诸侯的怀抱，出谋划策，镇压起义农民。他狂叫：“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路德背叛后，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为世俗诸侯的工具。

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路德教，在欧洲到处遇到合适的土壤，很快由德国传布到欧洲各地。挪威、丹麦和瑞典最先接受了路德教。此外，在英、法、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出现了路德教的信徒。人们通常把路德教和后来的加尔文教等，称为新

教，把天主教称为旧教^①。加尔文教产生于邻近德国的瑞士。

瑞士是欧洲中心的一个山国，工商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许多工商业中心，如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等。资产阶级不满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反动统治，也要求实行宗教改革，其领导者是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1509—1564年)，出身于法国北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在布鲁日大学研习法律。后移居巴黎，受到路德的影响。由于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他被迫逃亡到瑞士。1536年，加尔文发表了《基督教信仰典范》一文，对新教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

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与路德相似，都主张信仰得救，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教会的繁文缛节。但加尔文比路德激进，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先定论上。他宣称，上帝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是上帝精心挑选的人，应当发财致富，弃民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应当忍受剥削和压迫。而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很明显，加尔文企图以先定论来掩盖剥削的实质。这种宗教学说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

^① 在中国，通常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称旧教为天主教。

布”^①。自1450年起，加尔文成为日内瓦教会的首领，并且在这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国。

加尔文派遣传教士往欧洲各国传教，因此有人把他称为“日内瓦的教皇”，而把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加尔文教得到广泛的传布，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个有力武器。尼德兰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于1566—1609年，爆发了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尼德兰的北部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加尔文教也得到了传布。

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而外，英国也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国教，又叫“圣公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而且改革后的英国国教，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以及宗教仪式，所不同的只是不再服从罗马教皇管辖，而把英国国王奉为英国教会的首脑。英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建立英国民族教会的任务，并不完全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因此后来在英国又出现了类似加尔文教的所谓“清教”，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清教的旗帜下进行的。

总的说来，宗教改革作为市民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宗教改革中创立的新教，既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工具，又是资产阶级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精神枷锁。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1页。

马克思在谈到路德的新教时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①同历代剥削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为榨取人民的血汗，维护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除了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而外，也总是利用宗教作为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工具。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9页。

托马斯·闵采尔

1524—1525年，在德国的大地上，风雷激荡，硝烟弥漫，深受封建领主和天主教会压迫与剥削的广大农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动了欧洲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伟大德国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



闵 采 尔

闵采尔，约 1490 年生于德国施托尔堡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里。中学时代，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从事反对天主教会的活动。1507 年，闵采尔进入来比锡大学，专修哲学和神学。

闵采尔生活的年代，正值德国的多难之秋。当时，德国处于严重的分裂割据状态，境内有七个大诸侯（又叫选侯），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以及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天主教会占有全国地产的三分之一。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司法、税收、铸币等特权，拥有常备军，可以独自对外宣战和媾和，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在封建领主和天主教会的反动统治之下，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农民担负的租税、徭役及其它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在有的地区，租税高达收获物的百分之四十，徭役一周达六天之多。原先属于公共使用的牧场、山林、池沼，也大部分被领主占为己有。此外，教会还向农民强征苛重的什一税。农民在政治上更无权利可言。领主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本人及其妻子儿女。农民稍有反抗，领主就对他们施以各种残酷的刑罚，如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

农民的悲惨处境，迫使他们一再掀起反抗斗争。1476 年，一个名叫汉斯·贝海姆的年轻牧人，活跃于法兰克尼亚地区，他说，人间不应该有高高在上的皇帝、诸侯和教皇，人人亲如兄弟，没有贫富之分，各人靠自己的劳动为生。贝海姆密谋起义，但事前起义组织遭到破坏，贝海姆本人被捕，惨遭杀害。1493 年，在阿尔萨斯地区出现了一个农民的秘密结社“鞋会”，会旗图案是一只农民穿的草鞋，因此而得名。鞋会提出

拒绝缴纳捐税、贡赋、什一税，废除农奴制，没收教会地产等主张。1503年，在士瓦本地区出现了另一个秘密结社“穷康拉德”。1504年，穷康拉德发动起义，但不幸也失败了。

从各地农民所开展的斗争中，闵采尔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使他认识到在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

1517年，德国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了其主要内容是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闵采尔积极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且成为一名路德教徒。1520年4月，由于路德的推荐，闵采尔担任了茨威考城的神甫。

茨威考是德国的采矿业和纺织业的中心之一。在闵采尔来到茨威考之前，那里的矿工和纺织工组织了一个异端教派，因主张信徒到了成年必须再度接受洗礼，故名“再洗礼派”，其领袖是尼古拉·施托黑。他们宣称“尘世上的天国”就要到来了，在这个天国里没有贫富差别，没有剥削，实行财产公有。闵采尔不是再洗礼派教徒，但积极参加了该派的活动。1521年，茨威考工匠曾发动起义，失败后闵采尔及许多再洗礼派教徒被逐。

1522年，闵采尔在德国的图林根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前来归附他。这时，闵采尔的政治观点更为激进了。路德只不过是主张信仰得救，要求取消教阶制和教会的繁文缛节，建立所谓“廉俭教会”。闵采尔则不然，他不仅反对天主教会，而且主张摧毁封建制度，消灭一切诸侯、骑士和城市贵族，在现世建立一个天国。恩格斯说：“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

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①

闵采尔发表了一些著述，宣传革命主张。在一篇著作的结尾，他写道：“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诸侯们对此怕得要死，强令对闵采尔的著作实行检查。但是真理是封锁不住的，广大人民从闵采尔的言论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闵采尔还曾到过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并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武装起义作了必要的准备。1524年夏，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终于爆发了。

德国农民战争的烈火，燃遍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全德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投入到斗争中来。起义主要发生在三个地区，即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逊和图林根。

1524年6月，士瓦本的施图林根堡附近的农民由抗租抗税发展到武装起义，揭开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那里的农民组成了三千五百人的武装，并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提出了第一个斗争纲领“书简”，号召农民和城市平民团结起来，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建立一个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公正社会。士瓦本的诸侯起先以和平谈判为缓兵之计，调集反革命武装，妄图一举把起义镇压下去。1525年1月，起义军识破了诸侯的阴谋，宣布中止谈判，把起义推向整个士瓦本。3月初，起义军发展到三、四万人，共有六支队伍。3月6日至7日，六支农民军的领导人聚会门明根城，制定了另一个斗争纲领“十二条款”。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农奴制度，限制赋税和徭

^①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14页。

役；收回被领主强占去的属于公共所有的山林、牧场；取消什一税。这个纲领只是希望改善一下农民的处境，而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封建剥削。同时，各路起义军也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

1525年3月底，法兰克尼亚又爆发了起义。那里的农民组织了几支队伍，占领了上百个城堡，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起义参加者的成份比较复杂，许多市民和骑士投机革命，其中有些人还掌握了起义军的领导权。这就不能不给起义带来严重的后果。1525年5月，起义军在海尔布琅城制定了“海尔布琅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十四条，主要内容为：将没收来的教会的地产分给骑士；废除国内的关卡，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取消农奴制，但农奴必须偿付赎金，其数额相当于长年租额的二十倍。很明显，这个纲领所反映的主要是市民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海尔布琅纲领‘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其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①。由于德国市民政治上十分软弱，往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发生动摇和叛卖，从而给起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是由闵采尔直接领导的，斗争最为坚决。参加者除农民外，还有许多矿工和纺织工。1525年3月，起义军攻占了缪尔豪森城，推翻了该城的贵族会议，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

^①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59页。

等。起义农民到处焚毁城堡寺院，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封建领主。

缪尔豪森建立革命政权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积极响应。闵采尔并派遣人员到各地，进一步作好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然而，斗争是十分艰苦的。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的倡导者马丁·路德，被农民革命的怒涛吓破了胆，公然投入了诸侯的怀抱，诬蔑和攻击起义农民。闵采尔愤怒地斥责路德已成为“威登堡的行尸走肉”。

各地诸侯慌忙组成以菲利浦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军，于4月底杀气腾腾地向缪尔豪森扑来。闵采尔率领一支八千人的起义队伍，开赴缪尔豪森以北的弗兰肯豪森城近郊，准备迎敌。

5月16日，两军接触了。菲利浦首先施展诱降的诡计，他对起义农民说：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交出闵采尔，就将被赦免。这时，混入起义队伍的一个骑士和一个僧侣跳出来，要接受招降。闵采尔说：“大家把我绑起来送交诸侯，请求赦免吧！”话音一落，起义农民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宁可全部牺牲，也决不交出闵采尔！”接着，在起义农民一致要求下，闵采尔将那两个叛徒斩首示众，显示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菲利浦诱降失败后，向起义军发动猖狂进攻。起义农民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是，起义军数量有限，装备不足，又缺少训练，经过一场鏖战，八千起义军，牺牲了五千，闵采尔头部受伤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闵采尔坚贞不屈，最后终于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五岁。5月25

日，繆尔豪森城被诸侯联军攻陷，又有许多起义农民遭到杀害。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起义，也于1525年4月和7月，先后失败了。

轰轰烈烈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在闵采尔的领导下，沉重打击了德国的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闵采尔作为农民战争的一位杰出领袖，永远活在德国人民心中，并且鼓舞德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

在十六世纪，西班牙是一个头号殖民强国。除西班牙本土外，它还领有尼德兰，意大利南部，美洲的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北非的突尼斯，1581年又兼并了葡萄牙及其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全部殖民地。因此，西班牙的殖民势力遍布欧、亚、非、美四大洲，并确立了海上霸权。

同时，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金银和其他财富源源流入西班牙，刺激了西班牙工商业经济的高涨。塞维利亚是呢绒工业中心，从业人数一度达到十三万，丝绸、瓷器、制革等工业，也都具有一定规模。在有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盛极一时，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有商船一千艘，航行于各大洋。

但是，自十六世纪下半叶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统治时期起，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不是继续发展，而是迅速衰落下去，其原因在于：

西班牙的封建统治阶级，只满足于用掠夺自美洲的金银，购买国外的廉价商品，供自己挥霍，而不关心国内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金银的大量流入，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从而使得西班牙商品丧失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因为英法等国商品价格虽也有上涨，但上涨的幅度比较小，只及西班

牙的一半。

腓力二世的重税政策，也加速了工商业的衰落。出售商品要纳一种特别税，税率为商品价值的百分之十。西班牙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纳重税。城市代表在议会中申诉说：一千杜卡特的资本要纳三百杜卡特的税，怎么能经营商业？

腓力二世还利用宗教裁判所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压制工商业者的不满情绪，并借此没收富裕商人和工业家的资财。在他统治期间，执行过一百多次火刑，有几次一下子就烧死了八、九十人。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的政治情况时写道：“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①。

西班牙日益衰落之际，遇到一个正在兴起的殖民国家——英国的严重挑战。

十六世纪初，英国还是一个小国，除英格兰本土以外，只在爱尔兰拥有一块不大的领地。英格兰与它的北邻苏格兰，当时分属于两个王朝，各自为政。就经济发展而言，英国落后于尼德兰；军事力量远逊于西班牙。

但是，就在十六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发展起来。在毛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酿酒业等行业中涌现了一大批手工工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内大规模剥夺农民的土地，即所谓“圈地运动”，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

^①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462页。

英王伊丽莎白(1558—1603年)统治初期,英国的军事力量还比较薄弱,因此它不与西班牙展开正面冲突,而是利用海盗豪金斯、德雷克等人,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劫掠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扰乱西班牙的航路。德雷克于1577年率领五艘船,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在智利和秘鲁海岸直接从西班牙人手中掠得价值为一百五十万英镑的金银,然后横渡太平洋,绕道非洲于1580年回到英国。德雷克把劫掠所得的百分之四十献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则封德雷克为海军大将,还亲自访问他的船队,用他献的钻石装饰自己的王冠。英国的海盗活动,成为西班牙的心腹之患。伊丽莎白的一名宠臣曾比喻说,德雷克的“航海活动路线,就象一根绞索套在西班牙国王的脖子上”。1566年,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英国出于削弱西班牙的目的,给以援助,允许尼德兰的海上游击队使用英国的港口。

因此,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伊丽莎白恨之入骨,誓不两立。在诉诸武力之前,腓力二世勾结英国的天主教势力^①,企图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利^②扶上英国王位,取代伊丽莎白。玛利早于1568年因苏格兰发生政变而避居英国,被伊丽莎白长期囚禁。1586年,在西班牙的纵容下,英国的一些天主教徒密谋刺杀伊丽莎白,营救玛利出狱,立为英王。伊丽

① 英王亨利八世于1533年实行宗教改革,摆脱了罗马教皇对英国教会的控制,建立了英国国教,又叫圣公会。后来天主教势力一度复辟。伊丽莎白继位后,最后确立了英国国教。

② 玛利·斯图亚特为英王亨利七世长女、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的孙女。英国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不承认伊丽莎白为合法女王,认为玛利有权继承英国王位。

莎白事先得到消息，为了杜绝后患，于1587年处决了玛利。腓力二世在这一计谋失败之后，决定发动战争，用武力征服英国，以维护西班牙“海上霸王”的地位。

为了征服英国，腓力二世花费巨额资金，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踌躇满志地命名为“无敌舰队”。这支舰队由约一百三十艘舰船组成，其中大型战舰约六十艘。这种大型战舰，船身呈满弓状，象楼宇一样高耸水面，外形巍峨壮观，实际上十分笨重，行驶缓慢，正是英国大炮瞄准的目标。整个舰队共三万人，其中船员和水手七千人，步兵二万三千人。舰队总司令麦狄那·西顿尼亚，原是个陆军将领，对于海战毫无经验。

腓力二世还命令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帕尔玛，率领一支陆军远征队协同行动。具体作战计划是，西班牙舰队应避免在英吉利海峡与英国舰队遭遇，径直驶往尼德兰海域，护送帕尔玛的军队在英国登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无敌舰队”于1588年5月30日从里斯本扬帆启航，沿着西班牙海岸蹒跚北驶。途中因遇到风暴，曾开进西班牙西北海岸的拉科鲁尼亚港休整。7月21日，“无敌舰队”驶进英吉利海峡，停泊在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附近。

英国早已探知了西班牙的作战计划，并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英国舰队约有一百四十艘舰船，其中大型战舰二十余艘。这种大型战舰和西班牙的不同，已经过豪金斯的改进，增加了船的长度，去掉了船楼结构，装备了许多大炮。其余的舰船性能也都比较好，具有快速轻便的特点。整个舰队的作战人员约九千人，没有步兵，全部是船员和水手，霍华德为舰队总司令，豪金斯、德雷克也都分别担任分舰队司令或舰长。当

“无敌舰队”驶近英吉利海峡时，英国舰队已经作好了迎战的准备。

7月22日清晨，两支舰队正式接触了。英国舰只航行自如，炮火猛烈，主动进攻。“无敌舰队”为了发挥步兵的作用，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力图接近英国舰队，但总是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下午，“无敌舰队”的一支分舰队的旗舰中炮，战局对西班牙十分不利，于是西顿尼亚决定脱离战斗，顺着海峡向东驶去。英舰咬住不放，穷追猛打。黄昏时，“无敌舰队”另有一支分舰队的旗舰被撞伤，分舰队司令被英军俘获。此后数天，西班牙舰队不断遭到英舰的攻击，损失很大。到了交战后的第七天，“无敌舰队”驶进多佛尔海峡（加来海峡）。这时，西顿尼亚急切地等待帕尔玛率军来援。但是，他哪里知道，英国的一支分舰队早已封锁了尼德兰海面，帕尔玛已经爱莫能助了。

7月28日午夜，乌云密布，西风渐紧，“无敌舰队”上的西班牙士兵已经昏昏入睡。借此时机，霍华德施展了一条火攻的妙计。他挑选了八艘旧商船，在船身上涂满了柏油，船舱里装满了易燃物，然后将放火船划入西班牙舰队密集的地方，顿时火舌飞舞，烈焰熊熊。西顿尼亚慌忙命令断缆起航，在一片混乱之中，又有许多西班牙舰船或着火烧毁，或相互撞沉。

29日黎明，两支舰队在格雪夫兰斯附近海面展开激战。英国舰队始终占据上风，打得“无敌舰队”溃不成军，士兵的鲜血从甲板上的排水管流到海里，连海水都染红了。至下午，西顿尼亚且战且退，向佛兰德尔沿海驶去。英国舰队上的炮弹都打光了，因此也暂且收兵。

格雪夫兰斯会战中，西班牙被打死或淹死的官兵达四千人，受伤者不计其数。五艘大型战舰失去战斗力，其余战舰也是弹痕累累，帆破桅折，狼狈不堪。西顿尼亚眼见大势已去，遂决定绕道苏格兰和爱尔兰，返航西班牙。霍华德跟踪追击，直至苏格兰的福思河口方折回。

西顿尼亚在苏格兰北部海岸遇到风暴，又折损了一些舰只，在岩石重叠的爱尔兰西海岸又有许多船只触礁沉没或搁浅失事。直到9月下旬，西顿尼亚才率领残兵破船回到西班牙。

这次大海战，本质上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与老牌殖民强国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结果，西班牙“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英国总共只战死一百余人。此后，西班牙丧失了海上霸权，急速衰落下去，英国则一跃而为海上强国，加紧殖民掠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592至1598年，日本派遣水陆大军侵略朝鲜，并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宰，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大帝国。英勇的朝鲜人民奋起抗战，并得到兄弟邻邦中国的大力支援，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因为1592年是壬辰年，所以这次卫国战争在朝鲜历史上称为壬辰卫国战争。

日本自大化革新后，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十六世纪后半叶，出身于中等封建主的日本统治者织田信长（1534—1582年）及其后继者、部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约于1590年初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丰臣秀吉对内实行高压政策，下令收缴民间兵器，严防人民造反；对外肆行武力扩张，掠夺土地财富。他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并为此在九州的名护屋设立了大本营。

朝鲜地处亚洲大陆东缘，三面环海，北与中国山水相连，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约公元一世纪，境内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奴隶制国家。公元七世纪，新罗统一三国，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公元918年，贵族王建灭新罗，改国号为高丽，建立高丽王朝。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拥兵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建立李氏王朝。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正值李氏王

朝统治时期。

1592年4月，丰臣秀吉任命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领陆军十几万人，九鬼嘉隆率领水师九千人、战船七百余艘，渡过朝鲜海峡，在釜山登陆，然后分兵三路向北窜犯。

朝鲜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国防松弛，军队缺少训练，因此在敌人的突然进攻面前，措手不及。日寇长驱直入，仅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攻陷了京都汉城及开城、平壤等重要城市，侵占了朝鲜大片国土。朝鲜国王避居鸭绿江边的义州。

朝鲜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到处组织义兵，抗击日本的野蛮侵略。1592年4月，日军在釜山登陆后，庆尚道人民就首先举起义兵抗战的大旗。接着，忠清道、全罗道、京畿道及咸镜道的人民，也相继组织了义兵。各地的义兵运动，虽然都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领导，但由于义兵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奋勇作战，前赴后继，因此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他们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烧毁敌人的粮库，袭击敌人的兵营，甚至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一些城市。当时朝鲜政府有个官员，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就曾这样说：“灭倭（即日寇）救国，实义兵之力也”。

李氏王朝的一些爱国将领，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也积极投身于抗日的行列，和广大军民一起英勇杀敌，保家卫国。水师将领李舜臣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舜臣（1545—1598年），字汝谐，京畿道开丰人，曾任全罗道井邑县县监。战争爆发前，被提升为全罗道左水使这一水师要职。他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判断日本将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因此上任后积极整顿所属水师，赶造兵船、器械。战争

爆发后，他立下誓言：“愿以一死为期，直捣虎穴，扫尽妖氛，欲雪国耻之万一”。部下将士深受鼓舞，个个义愤填膺，敌忾同仇。

1592年5月初，李舜臣率领兵船八十五艘，在巨济岛的玉浦港海面，大败日本水军。当时停泊在港内的日寇兵船五十多艘，而大部分水兵都上岸烧杀劫掠去了，因此毫无作战准备。5月7日，当日军突然发现朝鲜水师后，慌忙登船逃跑。李舜臣抓住战机，向敌人发起猛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在这次海战中，朝鲜水师共击毁、击沉日寇兵船四十多艘，击毙敌官兵不计其数，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朝鲜水师方面，没有损失一船一卒。在这次海战中，经过李舜臣改进的龟船，发挥了很大作用。龟船长十余丈，宽丈余，甲板上装有坚固的外壳，形似龟背。船头上装有一个龙头，上穿两个炮眼，船身四壁有许多枪眼、炮穴，船身两侧各有十面划桨。龟船形状灵巧，行驶敏捷，火力猛烈。

丰臣秀吉原指望日本水师迅速控制朝鲜的沿海地区，掌握制海权，保障日本陆军所需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以便水陆并进，一举灭亡朝鲜。但是，朝鲜水师在玉浦海战中的胜利，阻遏了日本水师对陆军的配合与支援，打乱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部署。

继玉浦海战之后，李舜臣又率领朝鲜水师，接连取得了几次海战的胜利。7月间，在离巨济岛不远的闲山岛附近海面，朝鲜水师击毁日本战船约百艘，歼灭了日本水师的主力。陆上，日本陆军在占领平壤后，也被迫停止前进。

日本水师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到国内，丰臣秀吉极为震惊，

但又不甘心失败。

中国与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后，朝鲜政府即遣使赴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深知丰臣秀吉侵朝之目的“实所以图中国”，决定派兵援朝抗日。

1592年12月，明将李如松率大军四万三千人，渡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1593年1月，朝中联军经过激烈战斗，收复了平壤。驻守平壤的日将小西行长率领余众，狼狈南逃。朝中联军又乘胜收复了开城。李舜臣配合陆上朝中联军的猛烈进攻，率领朝鲜水师袭击日寇在朝鲜的海军基地釜山，取得重大战果。义兵也到处开展游击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日寇惊恐万状，不得不撤出汉城。这样，朝鲜国土大部光复，日寇退守南部沿海一带。

丰臣秀吉在走投无路之中，一面训令小西行长在庆尚、全罗两道沿海地带修筑工事，作长期顽抗的准备；一面遣使与朝中方面进行议和活动。于是，从1593年4月起，在朝鲜出现了将近四年的所谓和平交涉时期。明朝政府为了争取谈判能顺利进行，将大部援军撤回国内。

丰臣秀吉在和谈中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比如：朝鲜八道中允许日本占领南部四道；朝鲜国王应宣誓永不背叛日本；朝鲜须将王子及大臣各一、二人送至日本作为人质等。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朝鲜方面的拒绝。同时，丰臣秀吉以和谈为幌子，扩充军备，蓄谋扩大侵略战争。

李舜臣对敌人的和平烟幕有所警惕。当他被朝鲜政府任命为全罗、庆尚、忠清三道水军统制使后，积极整顿水师，培养

军事指挥人员，赶造大批枪炮兵船，并在沿海地区实行军事屯田。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了朝鲜水师的战斗力。

丰臣秀吉一心要除掉李舜臣，瓦解朝鲜水师，为此不惜施展阴谋诡计。1597年初，日寇派遣一名奸细，潜入朝鲜政府内部，散布谣言说：侵朝日将加藤清正乘船在釜山附近一小岛遇险，在岛上滞留七天，而李舜臣不派人前去捉拿。朝鲜国王信以为真，竟以所谓“欺瞒国王，放走敌将”的罪名，于1597年2月将李舜臣逮捕起来，命令元均接任统制使。元均是一个贪图禄位，昏庸无能，整日寻欢作乐的无耻之徒。李舜臣苦心整饬的朝鲜水师，在他手上弄得军纪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丰臣秀吉趁此时机于同年2月底，借口谈判破裂，令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领十四万日军，另派兵船数百艘和水兵几万名协同行动，再次大举侵略朝鲜。

日寇为了消灭朝鲜水师，再施阴谋诡计，派遣上面提到的那个奸细打入朝鲜军队的指挥部，假惺惺地献策说：目前，日本大军已开至对马岛，即将在釜山登陆。朝鲜水师善于海战，如果日军驶抵釜山附近海面时，给予迎头痛击，必获全胜。朝鲜海陆军总指挥竟听信了奸言，命令元均率领五百艘兵船出海迎敌。结果元均遭到日本水师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接着，日本侵略者按原定计划，水陆并进，攻占了朝鲜的著名谷仓全罗道。朝鲜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明朝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再次派遣四万大军，渡过鸭绿江，与朝鲜军队会合，组成朝中联军，向南挺进。1597年9月，联军抵达汉城，与北犯的日军遭遇。朝中联军在朝鲜人民的积极支援下，连战连捷，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南退却。

同时，朝鲜政府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于1597年8月重新任命李舜臣为统制使。李舜臣复职后，大力重整朝鲜水师，建造兵船，使朝鲜水师的战斗力逐步得到恢复。

1598年7月，由陈璘、邓子龙率领的中国水师入朝与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师会合。从此，朝中水师并肩作战，屡败日寇水师。

日本侵略军在朝中联军的沉重打击下，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8月，丰臣秀吉在忧伤之中死去。侵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再次提出和谈要求，遭到朝中方面的严正拒绝。

9月，朝中陆军分成左中右三路进攻日军的三大据点——蔚山、泗川和顺天，迅速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分别围困在顺天和蔚山。小西行长无计可施，只得派人突围至泗川请求援兵。11月17日，盘踞在泗川的日将岛津义弘率领五百多艘兵船和大批士兵去解顺天之围。李舜臣获悉后，随即将朝中水师布置在日寇援军必经的水路——露梁海面上。18日夜，日寇兵船驶抵露梁海面，李舜臣一声令下，朝中水师立即发起进攻，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敌兵船，有些战士还勇敢地跳上敌兵船，杀得日寇横尸满舱。海面上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岛津义弘在损失了四十多艘战船的情况下，设法逃遁。朝中水师紧紧咬住不放，战斗十分激烈。忽然，李舜臣左胸中弹，鲜血直往外涌，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战斗的胜利。他对身边的下属说：“战斗正紧，不要管我，你们要继续奋战”。说完，这位朝鲜的著名爱国将领停止了呼吸，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这次海战中，七十多岁的中国水师将

领邓子龙也英勇牺牲。

朝中水师化悲痛为力量，誓向侵略者讨还血债。战斗一直进行至19日中午，朝中水师共击沉和击毁敌兵船四百五十艘，歼敌一万多名，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辉煌胜利。陆上负隅顽抗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迫于朝中联军强大攻势，不得不带着残兵败将，滚出了朝鲜。至此，朝鲜人民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胜利地结束了为期六年的壬辰卫国战争。

沙俄吞并乌克兰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当俄国刚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它的领土还仅限于东欧平原上的一隅之地。此后，野心勃勃的沙皇，疯狂地侵占别国领土，宰割弱小民族，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殖民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沙皇除了穷兵黩武，对别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外，还采取另一种卑鄙手段，即乘人之危，以“援助”为名，强力加以吞并。十七世纪中叶沙皇吞并乌克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沙皇吞并乌克兰，还曾打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文”“同种”的旗号。为了说明问题，先让我们追溯一下斯拉夫人的历史。

在遥远的古代，斯拉夫人散居在维斯瓦河以东、波罗的海以南的辽阔平原上。后来逐渐向四处迁徙，一支向西移动直至易北河流域，称为西斯拉夫人，并进而形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另一支向南渡过多瑙河，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称为南斯拉夫人，并进而形成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等民族。还有一支向东移动，分布在东欧平原上，称为东斯拉夫人。

公元九世纪末，东斯拉夫人以今天乌克兰的首府基辅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国家，名叫基辅罗斯。但它并不是一个巩固

的政治统一体，国内各地区之间缺少经济联系，地方割据势力各霸一方，混战不已。至十二世纪上半叶，基辅罗斯解体了，分裂为十几个大公国。从这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蒙古、立陶宛、波兰接连入侵，将基辅罗斯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东北部为蒙古人所控制，西南部由立陶宛占领，最西部隶属于波兰。就在这一时期，东斯拉夫人分别以基辅、莫斯科和明斯克为中心，逐渐形成三个各自独立的民族，即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后来，沙皇竟然大事张扬这一历史渊源，作为它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口实^①。

俄罗斯是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莫斯科城建于11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时，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并于1480年摆脱了蒙古的控制。俄罗斯全境的统一，完成于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统治时期。莫斯科的当权者们，以古罗马帝统的继承人自居，狂妄地宣称：“莫斯科是伟大的世界首都古罗马及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以后再不会有第四罗马。”伊凡四世（1533—1584年）即位时年仅三岁，成年后于1547年加冕为“沙皇”。此后，历代沙皇便以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国策。沙俄在其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处心积虑要吞并乌克兰。

乌克兰的境况又怎样呢？乌克兰曾长期处在立陶宛的统治下。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为了遏制俄罗斯的扩

^① 更有甚者，十九世纪初，沙俄又炮制了一个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妄图把全部斯拉夫人置于沙皇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西起易北河，东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南迄亚得里亚海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

张势头，联合为一个国家——波兰立陶宛王国。从此，大批波兰封建主闯到乌克兰，对乌克兰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侵夺乌克兰的土地，奴役乌克兰农民；垄断城市工商业，限制乌克兰人经商；禁止使用乌克兰语，等等。

波兰封建主对乌克兰的蹂躏，不断激起乌克兰人民的反抗。他们多次举行起义，争取民族独立。1648年春，一个名叫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的乌克兰小贵族，集结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在第聂伯河下游发动反对波兰的起义。乌克兰各地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迅速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起义人民攻打波兰封建主的城堡，英勇抗击波兰国王派来的侵略军。

当时，波兰是东欧的一个大国，有一定的力量，因此乌克兰人民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贵族出身的赫米尔尼茨基对沙俄的“援助”寄予希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沙俄却利用乌克兰人民的困难处境，以“援助兄弟邻邦”为名，乘机把魔爪伸进了乌克兰。起义刚一爆发，沙皇就派遣大批商人和间谍潜入乌克兰，大量收集有关乌克兰事态的情报，并假惺惺地向起义军提供有限的粮食和武器“援助”。

同时，沙俄竭力笼络赫米尔尼茨基。沙俄使臣一再向赫米尔尼茨基提出“建议”，要他尽快把乌克兰归并俄罗斯，以便“共同”对波兰“采取行动”。1651年春，沙俄又威胁说：“没有俄国的帮助，乌克兰是不能保卫自己的！”真是又骗又压，无所不用其极。

乌克兰人民是坚强的人民。他们表示，即使没有沙俄的“援助”，也要同波兰封建主战斗到底，“或者我们全部战死，或

者把波兰人全部歼灭!”如火如荼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一如既往地迅猛向前发展。

至1653年春，乌克兰人民经过近六年的英勇奋战，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波兰侵略军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长期的侵略战争使波兰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波兰国内危机四伏，饥荒严重，瘟疫流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波兰封建主对乌克兰的殖民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此刻，沙俄也加紧活动，酝酿对波兰宣战。它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步骤，一是因为波兰已经精疲力竭，沙俄可以稳操胜券；二是因为那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在密切注视着乌克兰同波兰的战争，企图乘虚而入。这是沙俄十分顾忌的。

10月1日，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臣会议。会上，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正式决定吞并乌克兰。几天以后，沙俄宣布将对波兰宣战。

同时，沙皇再次派出高级代表团去乌克兰，对赫米尔尼茨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乌克兰“同俄罗斯联合，乌克兰人民将找到任何别国都不能提供的最富裕的安身之处和保护”。沙俄并且作出保证，合并以后，乌克兰仍将享有自治权。

1654年1月8日，在乌克兰的彼列雅斯拉夫城，召开了乌克兰代表会议。会议在沙俄代表的直接插手之下，通过了将乌克兰并入沙俄的决议。

以上事实说明，是沙俄靠强力和阴谋吞并了乌克兰，而决不是乌克兰人民“自愿请求”做沙皇的臣民。斯大林曾经指出：乌克兰等地区“是被强迫并入全俄政治机体的单位，……这些

地域‘联合’的历史就是旧俄当局施行暴力和压迫的整幅图画”^①。

苦难深重的乌克兰人民刚摆脱了波兰封建主的统治，又沦于沙俄贵族地主的铁蹄之下，正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甚至认为“乌克兰”一词带有叛逆性，而代之以“小俄罗斯”。他们还无耻地宣称：“蒙上帝恩宠，我们俄罗斯人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占有者……在许多其他的民族中间，俄罗斯民族是天生最坚强最有才干的民族。历史本身已经证明，那些小民族是不能和我们讲平等的！”

彼列雅斯拉夫协定规定，乌克兰在军事和行政方面享有自治权。但是，协定墨迹未干，沙皇就借向波兰宣战（1654年）的机会，派遣军队开进基辅等大城市，对乌克兰实行军事占领，用刺刀监督乌克兰实行“自治”。1663年，沙皇在莫斯科设立了专管乌克兰事务的机构，派出了大大小小爪牙严密控制乌克兰各级政府的活动，镇压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斗争。沙俄还规定，没有沙皇的指令，乌克兰的代表会议不得改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这样，彼列雅斯拉夫协定关于乌克兰自治权利的规定完全成了一纸空文。

本来，在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乌克兰农民获得了自由。但是，彼列雅斯拉夫协定签订不久，大批沙俄贵族地主连同野蛮的农奴制度一起涌进了乌克兰，重新给乌克兰人民套上了沉重的封建枷锁。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保罗一世赐给沙俄贵族地主的乌克兰农奴就有二百万，而当时整个乌

^①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64页。

克兰的人口总共才不过七百多万。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终生为俄罗斯贵族地主当牛作马，稍有反抗便遭到鞭笞拷打，或者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绞死。乌克兰人民恨透了沙皇，他们在一首民歌中控诉道：“叶卡特林娜，你这个母夜叉，看你干的好事：你把快乐的家乡，广阔的草原，糟蹋得一片荒凉……”

沙俄还打着“地区分工”的幌子，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掠夺。它强迫乌克兰种植甜菜、亚麻和大麻，限制乌克兰发展工业，把乌克兰变成了沙俄所需要的煤、铁、矿石等工业原料和农牧产品供应地。这种“地区分工”的结果，使得乌克兰的民族经济严重单一化，以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乌克兰还只有一些老式、陈旧的工厂。

沙俄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疯狂摧残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它公开声称：“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已经被征服了。”为此，沙皇强令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乌克兰人改信东正教；强制推广俄语，在乌克兰的政府机关和学校教育中只准用俄语，不准用乌克兰语，许多用乌克兰文出版的书籍纷纷遭到封闭和查禁。十八世纪，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乌克兰开办了许多所谓“民众学校”代替乌克兰的民族学校，对乌克兰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她恶毒地说：“只要民众学校建立起来，得到巩固和发展，愚昧（指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就会自行消灭——就不需要武力了。”乌克兰在并入俄罗斯以前，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所民族学校，文盲很少。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民族学校的数目减少了十分之九，文盲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苏联于1936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也指出：“在并

入俄罗斯之前，乌克兰在文化上是高于大俄罗斯的。而到上一世纪(十九世纪)末期，乌克兰各省文盲的百分比，甚至就整个沙皇俄国来说，也是高得惊人的。”

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民。酷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反抗沙皇的殖民统治。1666年，彼列雅斯拉夫的农民发动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震动了沙俄统治集团。沙皇惊恐万状，急忙派出反动军队前去镇压，并狂吠：“只要有人不肯完全接受同化……政府在这种半控制着的省份，必须把权力建立在巩固的军事设施上。”后来，乌克兰人民反抗的怒火越烧越旺，起义浪潮此伏彼起。1830至1835年间爆发的一次起义，参加者达二万人，对敌人发动了上千次进攻。

1917年，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在列宁领导下，终于推翻了老沙皇的反动统治。在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乌克兰人民真正成了乌克兰的主人。但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民族政策，把苏联重新变成沙俄式的“各族人民的监狱”^①，使乌克兰人民再度陷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奴役之下。

苏修新沙皇为了替他们所推行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辩解，公然篡改历史。他们把老沙皇吞并乌克兰说成是乌克兰“自愿归并”俄罗斯帝国，把老沙皇对乌克兰人民两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说成是使“乌克兰人摆脱深重苦难而开始幸福生活的新时期”。但是，历史不容篡改，谎言更遮盖不住新沙皇的狰狞面目。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终将推翻新沙皇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赢得自身的解放。

^①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92页。

斯捷潘·拉辛起义

“鲜红的太阳啊，你升起来吧，
照在高耸的山岭上，
照在碧绿的密林上，
温暖着我们穷人，
我们虽然贫穷，但我们不愿身受压制；
我们不是窃贼，不是强盗，
斯捷潘·拉辛——我们是由他领导着的。”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的领袖就是斯捷潘·拉辛。这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反映了俄罗斯人民不甘忍受沙皇的残暴统治，集合在拉辛的旗帜下，奋起造反，高歌猛进的豪迈气概。

十七世纪，沙皇不断强化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1649年，沙皇米哈伊尔制定新“法典”，用法律的形式把农奴制确立下来，加深对农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原先，农奴从地主庄园里逃脱之后，经过一定期限，即可获得自由。当然，这条规定往往也是流于形式。但是，新法典则明文规定，地主追缉逃亡农奴不再受时间的限制，一旦追缉到手，连人带财产全归原主所有。在庄园里，地主把农奴当牛马一样驱使，强迫他们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农奴终年不得温饱，有许多农奴“大半

年吃不到盐”。

新法典还进一步加强沙皇的权力，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刑罚十分残酷，历史记载说：“割舌、斫手及处死刑是常有的事。反对宗教的罪犯，则要活活烧死。”

以沙皇为首的一小撮地主贵族，依靠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反动政权，作威作福，鱼肉人民。他们穿的是意大利、英国的丝绸、呢绒，喝的是法国的香槟酒，家中的陈设也都是进口货。有个名叫莫罗佐夫的大贵族，他一家就有约五百个村庄，四万多名农奴和七百多名仆役，年收入单是现金一项就有一万卢布，仓库里堆积的粮食达几十万普特^①。至于沙皇霸占的地产和拥有的其它财富，更是不可计数。

罪恶累累的沙皇对内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肆行侵略扩张。当时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内陆国家，沙皇为了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进而称霸欧洲，同波兰、瑞典展开了长期的战争。沙皇把战争的重担都压在人民身上，一面从农奴中征召新兵，充作炮灰，一面横征暴敛，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

富于革命传统的俄罗斯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逃亡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早自十五世纪，大批农奴和手工业者便逃出虎口，流落、定居到沙皇势力尚未扩张到的顿河流域。他们自称“哥萨克”，意为“无拘束的人”或“酷爱自由的人”。起初，哥萨克组成一个个村社，主要从事打猎、捕鱼、养蜂，内部实行团结互助，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别。十六世纪末叶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加强，逃亡到顿河流域的农奴日益增多。同时，在哥萨克中间，也逐渐出现了阶级分化，少数哥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

萨克剥削致富，广大的哥萨克成为富有哥萨克的奴役对象。有些富有的哥萨克还和沙皇相勾结，充当沙皇的鹰犬。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农奴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地主贵族的剥削收入，因此他们纷纷上疏沙皇，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为此，沙皇一方面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哨卡，加紧搜捕逃亡农奴；另方面收买顿河流域富有的哥萨克，令他们不得收留逃亡者。

这样，广大的贫穷哥萨克和农奴再也生活不下去了。为了砸碎身上的锁链，求得生存的权利，他们在斯捷潘·拉辛领导下，发动了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斯捷潘·拉辛是顿河哥萨克的子孙。由于他同情人民的疾苦，敢于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成为起义的领袖。

1667年早春的一天，在顿河上游的一个村子里，身材魁伟的拉辛正在对贫穷的哥萨克作起义的政治动员，他铿锵有力地说：“受奴役和被轻视的同胞们，顿河的乡长和富人都成商人了，他们会把我们象羊群一样出卖给莫斯科贵族的。我们的祖先为了挣脱农奴的枷锁，获得自由幸福，离开了故乡来到这儿，可是贵族富人又夺走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是酷爱自由的人，我们要夺回幸福！”说到这儿，人们顿时沸腾起来，齐声说：“对！我们要夺回幸福，把吸血鬼消灭掉！”

这时，一位年老的哥萨克站起来说道：“拉辛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是要消灭吸血鬼，夺回幸福。可是眼下咱们是要粮没粮，要武器没武器，而贵族地主却粮足武器好，要同他们干，咱们可得想法子筹措粮食和武器啊！”经老人这一提醒，

人们议论开了，把希望的目光一齐投向拉辛。拉辛思索了一会，说：“顿河和伏尔加河上经常有沙皇及富商的船队来往，那船上装的都是粮食和武器，我们夺得那些船只，不就有粮有武器了吗！”人群又活跃起来，一致赞同拉辛的意见。于是，村上的以及邻村闻讯赶来的受苦人，在拉辛的率领下，向伏尔加河进发。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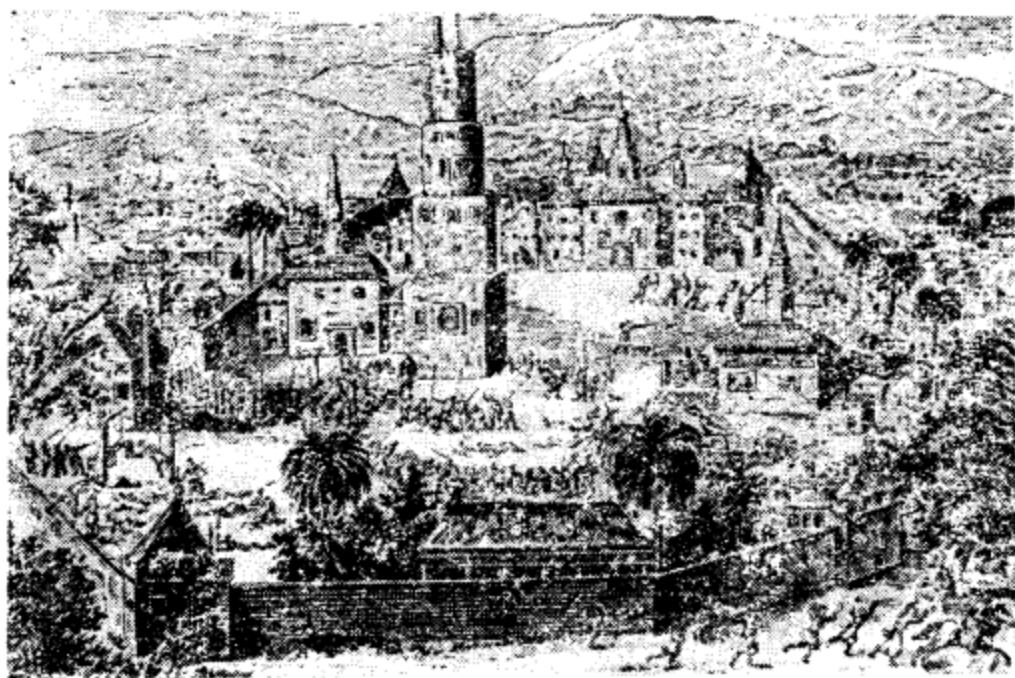
起义者在伏尔加河上勇敢地袭击沙皇政府的船队，夺取粮食和武器，释放那些被沙皇流放的“囚犯”。拉辛对他们说：“你们都自由了，到你们愿意去的地方去吧。谁愿和我在一起，也就将是一个自由的哥萨克。我们只打击大贵族地主，对于穷人，我们则与他们分享一切，犹如兄弟一般。”

接着，起义队伍乘船由伏尔加河驶入里海，直抵叶克河（乌拉尔河）河口，夺取了设防的叶茨克城。拉辛在这里度过冬季。1668年春天，拉辛为了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渡过里海，转移到波斯（伊朗）境内。

1669年秋，拉辛率领队伍由波斯回到顿河流域。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投奔拉辛，起义队伍不断壮大。惊恐万状的沙皇企图从起义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希望主要寄托在混入起义队伍的富有哥萨克身上——以达到分化瓦解起义队伍的罪恶目的。然而拉辛及时察觉到这一阴谋，果断地将沙皇派来进行诱降活动的使臣投入水中。

1670年春，拉辛再度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并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攻占了察里津城。

拉辛计划向俄罗斯内地进军，但要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在伏尔加河下游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因此，拉辛决定首先攻打



拉辛攻占阿斯特拉罕

位于伏尔加河口的重镇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当局一得到消息，慌忙派出一支警卫队去攻打拉辛。警卫队的士兵大多是强征入伍的农奴及城市下层居民，早就向往拉辛，于是杀了带队官佐，公开投奔起义军。阿斯特拉罕的贵族闻讯后，慌忙加强城防，负隅顽抗。

1670年6月的一个傍晚，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突然，阿斯特拉罕教堂的钟声大作。以此为信号，起义军大队人马喊声震天，向城前移动。守城的沙皇军队以为是起义军攻上来了，急忙上去抵挡。就在这同时，在城的另一边，起义军在城内居民的积极支援下，悄悄竖起云梯，迅速攻入城里。

天色黎明时，阿斯特拉罕解放了。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起义军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坚决镇压了一批怙(hù 护)恶不悛(quān 圈)的沙皇官吏和反动贵族。

阿斯特拉罕解放的消息，犹如春风迅速吹遍了俄罗斯大地。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拉辛留下部分人马守卫阿斯特拉罕，自己率领起义军主力向俄罗斯腹地进军。一路上，起义军的两百艘船只溯伏尔加河而上，河两岸由两千多乘骑并进掩护，浩浩荡荡，所向无敌。

拉辛同时派人到各地秘密地散发文告，号召受沙皇政府奴役的各族人民起来造反，争取自由解放。

1670年8月，沙皇下令莫斯科和外省的贵族全力镇压起义，并募集了一支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骑兵团作为反革命武装的骨干，恨不得一下子扑灭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9到10月初，起义军与沙皇的雇佣骑兵在辛姆比尔斯克附近展开激战。敌军在武器和兵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起义军不畏艰险，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在一次战斗中，拉辛不幸中弹负伤，从马上跌下来。一群敌人狂叫着向拉辛扑去，情况万分危急。刹那间，起义军战士立即围拢来，在拉辛的周围筑起一道人墙。拉辛忍着剧痛，重又跨上战马，高喊着“弟兄们，坚持到底！”飞也似地向敌人冲去。在拉辛的鼓舞下，起义军战士杀得敌军抱头鼠窜，鬼哭狼嚎。正在酣战之时，冷不防一个敌人骑兵窜到拉辛的侧旁，对准拉辛的头部砍了一刀，拉辛不幸再次负伤。情势不宜久战，于是，起义军护卫着拉辛撤出战场。

之后，起义军继续活跃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同时，在俄国的其它地区，如莫斯科附近和白海沿岸，广大农奴也纷纷响应拉辛起义。但是，由于起义队伍分散，装备也差，抵挡不住敌人的猖狂进攻。1671年11月，拉辛的最后一个堡垒——

阿斯特拉罕失守，起义不幸失败了。

残暴的沙皇竖起一个个绞架，对起义者实行血腥的大屠杀。据估计，仅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沙皇就处死了一万一千人。起义者在酷刑之下，在死亡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刽子手气势汹汹地问起义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回答是那样的斩钉截铁：“我们要夺取莫斯科，杀死你们一切大小贵族和官吏！”

拉辛自从负伤以后，一直在顿河流域一带养伤。1671年4月14日，哥萨克上层分子逮捕了拉辛，并把他解往莫斯科，出卖给了沙皇。

沙皇抱着对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决定对拉辛处以四裂之刑。6月6日，拉辛被解到洛布台^①。只见拉辛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衣衫，但他步履坚定，大义凛然，对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斯捷潘·拉辛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苏联人民在莫斯科红场建立了一座斯捷潘·拉辛纪念碑。列宁亲自参加了在洛布台举行的纪念碑揭幕典礼，并发表了讲话，指出：“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

^① 洛布台是莫斯科红场上一个石头高台，建于1534年，十六至十七世纪曾作为宣布沙皇诏书和执行死刑的处所。

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①今天，我们联系苏联党变修国变色，广大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的惨痛教训，缅怀斯捷潘·拉辛，学习列宁的上述教导，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① 《在红场上的三次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96页。

沙俄的侵略魔爪伸向 乌拉尔以东

1547年1月的某一天，莫斯科黑云压城，寒风凛冽，一辆辆地主贵族的马车在大街上疾驶而过，卷起层层积雪，过往行人无不怒目而视。原来，就在这一天，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开始亲政，加冕称“沙皇”，确立起军事封建专制制度。

伊凡四世一上台，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加强对农奴的压迫与剥削。对外大肆扩张，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

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首都喀山城是伏尔加河航运的重要内港，又是通往乌拉尔山以东的交通枢纽。1552年6月，伊凡四世亲率十五万大军强渡伏尔加河，进攻喀山城。城内三万守军，在居民的配合下，不畏强敌，坚持了一个半月。后来，伊凡四世通过收买内奸，里应外合，攻陷了喀山城，征服了喀山汗国。1556年，伊凡四世又征服了位于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这样，伊凡四世就把整个伏尔加流域纳入了沙俄的版图。

当时，沙俄还是一个内陆国家。为了向西争夺波罗的海

出海口，伊凡四世与瑞典、波兰、立陶宛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1558——1583年)。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得逞。

正当沙俄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一筹莫展之际，伊凡四世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乌拉尔以东。打头阵的，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强盗头子叶尔马克。1581年叶尔马克率领一群主要由武装的哥萨克组成的乌合之众，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第一个受害者，是位于乌拉尔至托博尔河一带的西伯利亚汗国(该国也是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侵略者到处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把一个个村落变成了废墟。1582年，沙俄用火和箭侵占了西伯利亚汗国。

消息传到莫斯科，伊凡四世赦免了叶尔马克的死刑，后来又赏了他一副盔甲和一枚勋章。这个亡命之徒受宠若惊，更加死心塌地地充当沙皇向东扩张的马前卒。但是，一切侵略者都不会有好下场的。1584年8月，叶尔马克在额尔齐斯河附近遭到蒙古人伏击，当他慌忙跳上一只小船逃命时，失足落水，溺死在额尔齐斯河里。

沙俄在西伯利亚西部设立殖民机构，霸占土地，搜刮貂皮及其他贵重毛皮，使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下面是沃古尔族人民对沙俄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他们(俄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

侵占了我们的江河、森林。

他们强迫各家各户，

都向他们贡献礼品。

随着俄国人的到来，

死神也悄悄地随着飞来，

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病害，
给我们的牲畜带来了瘟疫……
他们的人(俄国人)一天天增多，
我们的人一天天减少。

沃古尔族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

沙俄侵占了西伯利亚汗国后，对于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大量珍贵的毛皮，愈加垂涎三尺，急不可待地继续向西伯利亚东部扩张，并在险要地方强筑寨堡，作为殖民据点。1619年沙俄殖民者到达叶尼塞河，建立叶尼塞斯克。1628年进至勒拿河，建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632年在勒拿河盆地建立雅库次克。1649年闯到鄂霍次克海滨，建立了鄂霍次克。

1643年7月，沙俄雅库次克殖民当局派波雅科夫率领一百多名侵略者，越过外兴安岭，入侵历来属于中国领土的黑龙江流域。这伙强盗大肆抢劫和屠杀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达斡尔人，甚至食用尸体。达斡尔人英勇反击沙俄入侵者，“他们从村寨中冲出，其中有几个骑马的，向俄国人勇猛进攻，有十个俄国人重伤被俘，剩余的被迫退却到森林中。其中许多人也受了伤，而达斡尔人随即将他们包围起来。”四天以后，被围的侵略者趁达斡尔人不备，才侥幸逃脱。后来，波雅科夫经黑龙江，下鄂霍次克海，北上至乌里雅河口，然后通过连水陆路(船只被运过陆地)，再沿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及马亚河顺流而下，于1646年才回到雅库次克城。

波雅科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鼓吹继续派遣军队侵

略和掠夺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他说：黑龙江地区“人口稠密，盛产粮食和貂皮，各种兽类和谷物都很繁多，河流中还有丰富的渔产，皇帝陛下的武士在此地决不会为缺粮所苦。”

1649年，另一个沙俄殖民者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又组织了一支哥萨克侵略军，沿勒拿河支流奥廖克马河南下，再次侵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1650年7月，哈巴罗夫强占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村，构筑城堡，并四出烧杀掳掠。1651年6月，这伙匪徒攻占了一个达斡尔人村落，杀死大人和小孩六百多人。

1653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的职务后，在清军和当地中国居民的痛击之下，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一度受到遏制，侵略军在雅克萨构筑的城堡也被平毁。但是，沙俄不甘失败。约于1665年，沙俄侵略者又侵占了雅克萨，重建被平毁的城堡，在中国领土上骚扰破坏达二十多年。1682年，有一次这伙匪徒竟将二十名当地的猎人关在室内，活活烧死，把他们的马匹、粮食、器物统统抢去。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朝政府多次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并企图通过和平交涉，使侵略军撤出中国领土。然而，沙俄却置若罔闻，侵略活动更是有增无减。清军迫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包围了雅克萨，击毙了侵略军头目。在这种情况下，沙俄被迫接受了清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呼吁。1689年，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这项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那个亲自批准了这项条约的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年）就曾公开表示：他的愿望是前往西伯利亚，“然后再前往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直达中国的长城”。因此，沙俄继续不断地派人窥探中国黑龙江流域。

十七世纪末，沙俄的侵略魔爪继续向东伸展。1741年，一伙沙俄殖民者由白令率领，从鄂霍次克城出发，经堪察加半岛，到达位于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逐渐将这片辽阔的土地据为沙俄的殖民地。而且，沙俄殖民者还沿着美洲西海岸南下，一直到达今美国的旧金山一带。1784年，沙俄在阿拉斯加南岸的科迪亚克岛上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1799年，又设立“俄美公司”，掠夺当地的毛皮。沙俄统治阿拉斯加的一个世纪里，那里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比如，阿留申群岛的人口就由原先的三万人，减少到三千人。沙俄在北美的扩张，引起英美两国的不安和反对。1857年3月，沙俄被迫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代价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从此，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属地（今为美国的一个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沙俄也于此时乘机从北方入侵中国，急先锋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自1854至1858年，穆拉维约夫几次率领侵略军入侵黑龙江地区，在江北岸强行设立军事哨所，架设炮台，建立哥萨克“村屯”。

1856年，英法联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沙俄借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机，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霸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

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为中俄“共管”。恩格斯在评论中俄《璦琿条约》时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1860年11月，沙俄又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开始对中亚细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实行武装占领。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2月，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通过《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沙俄版图。

就这样，沙俄在乌拉尔以东通过三个多世纪的武力扩张，侵占了西伯利亚、中亚细亚以及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一个殖民大帝国。

^①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37页。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上，在欧洲的北海之滨、来因河下游，有一个名叫尼德兰^①的国家。早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尼德兰就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年），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同时，由于当时尼德兰是西班牙的属地，处在西班牙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尼德兰革命又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

十六世纪，尼德兰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城市林立，因此有“城市国家”之称。不过，尼德兰南北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北方七省，尤其是在荷兰、西兰两省，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毛纺、造船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与西班牙则很少有经济上的联系。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有些贵族改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在南方十省，尤其在佛兰德尔，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但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而且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主要依靠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农村中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封建贵族还相当得势。

尼德兰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

^① “尼德兰”意为低地，因这一带地势低平而得名，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

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它还不够成熟，尤其是与西班牙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大商人，倾向于保守和妥协。工场主和中小商人比较激进，迫切要求摆脱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发展资本主义。

广大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深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生活极端痛苦，强烈希望改变现状。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

旧阶级也逐渐发生分化，北方的贵族渐渐与资产阶级接近，成为新贵族，参加了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些仍然靠封建地租过活的旧贵族，企图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贵族特权，成为革命的对象之一。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视富饶的尼德兰为自己“王冠上的一颗珍珠”，大肆搜刮。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掠自尼德兰的收入，为掠自西班牙其他殖民地收入的四倍，占西班牙国库年收入的一半。他还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1550年他颁布“血腥诏令”，规定凡是新教徒或被控为新教徒者“男人——杀头，女人——如果不坚持自己的错误，活埋；但如果坚持，则受火刑；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财产都应没入国库。”1556年腓力二世即位后，下令废除尼德兰商人直接与西班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权，拒绝向尼德兰银行偿还国债，提高尼德兰商人在西班牙收购羊毛的税额，加强宗教裁判所的活动。结果，带给尼德兰的是商业衰退，工场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失业。整个尼德兰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1565年，一部分与资产阶级接近的贵族，以奥兰治亲王

威廉为首，组成“贵族联盟”，向西班牙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诏令”，撤退西班牙驻军，同时表示效忠腓力二世。骄横的西班牙统治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骂他们是一群“乞丐”。后来，为争取尼德兰独立而斗争的战士就幽默地称自己为“乞丐”。在形势的逼迫下，1566年夏天，贵族联盟与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准备共同行动。

正当贵族联盟和资产阶级动摇于合法斗争和革命行动之间时，人民群众点燃了革命的烈火。1566年8月11日，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首先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的锋芒直指西班牙反动统治的支柱——天主教会。无数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没收教会财产，焚毁债券、田契。起义明显地越出了宗教的范围，西班牙总督惊呼：群众的斗争不仅“推翻了宗教，而且也摧毁了法律制度和一切政治秩序”。

残暴的腓力二世咬牙切齿地说，要“砍下每一个应该处死的人的脑袋”。1567年8月，他派遣新总督阿尔发率一万八千名军队杀气腾腾地来到尼德兰。阿尔发设立了名为“除暴委员会”的特别法庭，大肆迫害起义者，仅被处死的就达八千人。同时，阿尔发还宣称：宁留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给上帝，也不留一个富裕的尼德兰给魔鬼。1569年3月，阿尔发决定在尼德兰实行新税制，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征收百分之一的财产税，土地买卖征收百分之五的转卖税，商品交换征收百分之十的交易税。这些税收进一步加重了尼德兰的负担，使得尼德兰的经济更为萧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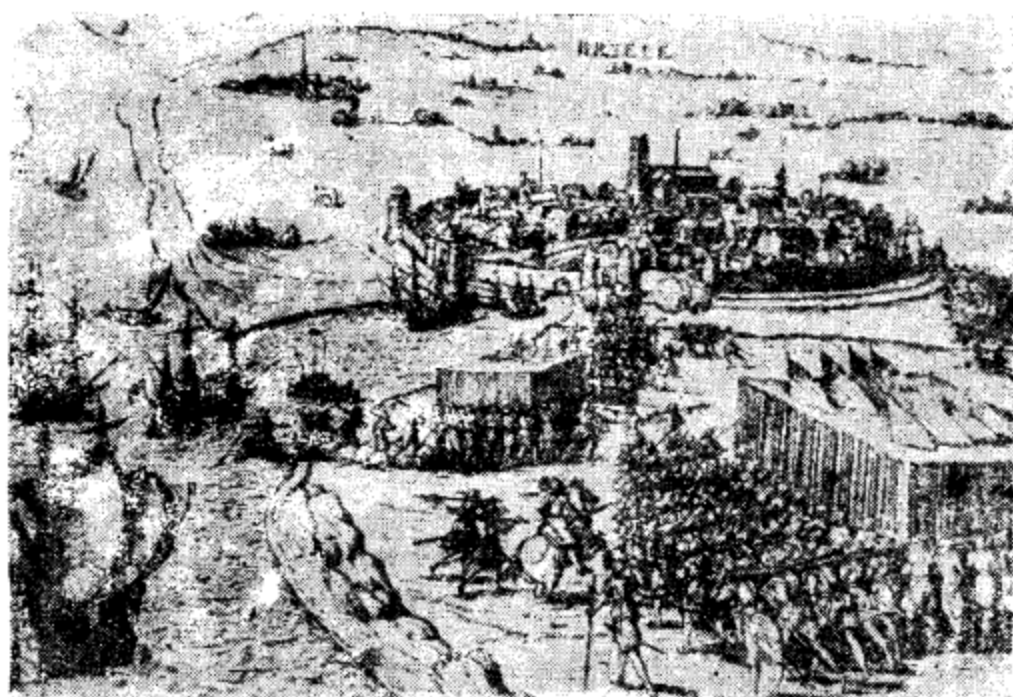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奥兰治亲王威廉和一些贵族、商人、

工场主纷纷逃到德国，企图借助外国雇佣兵打败西班牙。由于威廉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执行一条狭隘的贵族抗战路线，因此，虽然多次攻入尼德兰的南部和中部，但都遭到了失败。

与此相反，酷爱自由的尼德兰人民，没有被西班牙统治者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组成游击队，频频打击西班牙侵略者。

在南方，大批手工业者、工场工人和农民离别了自己的家园，活跃在佛兰德尔一带的密林之中，组成名为“森林乞丐”的游击队。他们神出鬼没地袭击小股西班牙匪军，逮捕和惩罚作恶多端的天主教神甫和官吏。广大群众积极支援游击队，经常为游击队递送情报，供应粮食，掩护转移等。

在北方，广大的水手、渔民和码头工人利用广阔的海域，



“海上乞丐”攻占布里尔城

组成名为“海上乞丐”的游击队。他们驾着轻便的小船，勇敢地袭击西班牙侵略军的沿海据点、西班牙的军舰和运输船队。西班牙殖民当局把海上乞丐视为心腹之患。

蓬蓬勃勃的人民游击战争，迎来了革命高潮。1572年4月1日，一支由二十四只船组成的海上乞丐解放了西兰岛上的布里尔城。这一胜利如同一颗红色信号腾空而起，引起强烈反响，起义浪潮汹涌澎湃。至1572年夏天，西兰、荷兰两省全部从西班牙军队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了。

此时，侨居国外的奥兰治亲王威廉，正在准备率领一支外国雇佣军，打回尼德兰。当他获知北方人民的胜利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一点高兴。相反地，他还抱怨说这些小成就妨碍他所准备的主要措施”。但是，威廉的进军并未达到目的，又失败了。

革命在北方各省迅速向前发展。在那些获得解放的城市里，革命群众严惩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收天主教会和反动贵族的土地，停止缴纳捐税，拒绝履行封建义务。至1573年底，北方七省先后宣布独立。

革命群众的举动，不仅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罪恶统治，也震动了尼德兰的资产阶级。北方的资产阶级急于使革命就此止步，因此还在1572年7月，他们便推举威廉为北方各省总督，让他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西班牙总督阿尔发，曾于1572年底，再次调遣大军，镇压北方的革命。他在围攻阿尔玛克城时，狠狠地说：“如果我占领阿尔玛克城，我决不留一个活人。我要把刀子刺入每个人的喉咙。”但是，不管敌人多么凶残，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

运。1573年，西班牙国王怪阿尔发镇压无力，将他调回，另派列克森为总督。

1573年10月，列克森以重兵围困莱登。莱登人民忍着饥饿的折磨，坚持战斗，表示宁可吃掉自己的左手以保全右手，也决不屈服。莱登四郊的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灭小股西班牙军队。海上乞丐也闻讯赶来，打开水闸，淹没敌军，迫使敌人后撤。

北方的革命烽火迅速延烧到南方。

1576年9月4日，总督府所在地——布鲁塞尔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国务会议大厦。南方各省人民也都拿起了武器，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全国抗战的新形势，要求南北联合。1576年10月，在根特城召开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全尼德兰的等级会议——三级会议，缔结了“根特协定”，宣布恢复南北统一，但没有提及争取尼德兰独立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等基本问题。

南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反动贵族和天主教會的极度恐惧。1578年秋，南方的一些反动贵族发动叛乱，并于次年1月6日成立“阿拉斯联盟”，宣布效忠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公开叛变了革命。西班牙军队勾结阿拉斯联盟，扑灭了南方的革命运动。

北方各省为了保卫革命成果，防止反动势力卷土重来，于1月23日成立了“乌特勒支同盟”，宣布北方七省为一个整体，要“永久团结，犹如一个省”。1581年7月26日，北方七省正式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成立联省共和国，因荷兰省最大，

经济也最发达，所以称作荷兰共和国。

西班牙军队在南方得手之后，转而向北方进攻，但遭到北方人民的坚决抵抗。1588年7月，在与英国争霸海洋的斗争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覆没，从而减弱了西班牙对共和国的威胁。后来，共和国收复了被西班牙占领的北方领土，解放了南方的部分地区。西班牙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于1609年4月9日，同荷兰缔结了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获得了胜利。

尼德兰革命，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整个欧洲尚是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的时候，尼德兰革命的胜利，无疑有它的进步意义。不过，由于尼德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而以手工工场为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新贵族又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革命很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正因为如此，尼德兰革命对欧洲的影响，远不能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因而不把它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然而，尼德兰革命毕竟是以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从而促进了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七世纪，荷兰的商船吨位占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航行世界各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的呢绒、麻织品畅销欧洲各国。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港内经常停泊着两千多艘各国的商船。荷兰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①。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56页。

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筑在对内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对外疯狂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之上的。

荷兰工人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至十六小时，工资低微，而物价十分昂贵；在农村中，农民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十分痛苦。

马克思指出：“荷兰的人民群众在 1648 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①。

荷兰早自十六世纪末叶就开始对外殖民。1595 年，荷兰的商船到达印度，继而东航到达印度尼西亚。1602 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对印尼等国的殖民掠夺。不久，荷兰又占领了斯里兰卡及马六甲。1621 年成立荷属西印度公司，垄断美洲和西非的贸易和殖民特权。1652 年，荷兰开始侵入南非。荷兰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

荷兰殖民者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1624 年，荷兰霸占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烧杀抢掠，作恶多端。1662 年，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和台湾人民一起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 年版第 258 页。

附 录

大事年表

公元前		
3100—2680	埃及统一国家形成	
3000—2500	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国家形成	
2800—2300	埃及第三至第六王朝 金字塔的建造	
2369—2189	阿卡德王国	
2350—1700	印度哈拉帕文化	
约二十一—十六世纪	中国夏朝	
约1792—1750	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1750	埃及贫民与奴隶大起义	
约十六—十一世纪	中国商朝	
约十一世纪—770	中国西周	
1000—700	印度恒河流域国家形成	希腊荷马时代
770—476	中国春秋	
650—约509		罗马王政时代
约620—560		伊索
594		雅典梭伦改革
约565—486	释迦牟尼	
558—529	波斯帝国创立者居鲁士	
521—485	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509		雅典克利斯提尼改革
约509—27		罗马共和时期
492—449	希波战争	
490		马拉松战役
485—465	波斯国王薛西斯	
约484—425		希罗多德
475—221	中国战国	
464—453		斯巴达希洛人起义
449		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
443—429		雅典伯里克利执政
431—404		伯罗奔尼撒战争
427—347		柏拉图
413		雅典二万奴隶大逃亡
336—323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305	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	
273—232	印度阿育王	
264—241		第一次布匿战争
247—约183		汉尼拔
221—206	中国秦朝	
218—201		第二次布匿战争
206—公元 220	中国汉朝	
149—146		罗马征服希腊 第三次布匿战争
139—126	中国张骞首次通西域	
137—132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133—123		罗马格拉古兄弟改革
104—101		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101—44		尤里乌斯·凯撒
73—71		斯巴达克起义
27		罗马帝国建立
27—公元 14		罗马统治者奥古斯都

公元后		
40—43	越南二征起义	
66	巴勒斯坦犹太人起义	
97	中国甘英使大秦未果	
约 200	日本邪马台国兴起	
220—265	中国魏蜀吴三国鼎立	
226—642	伊朗萨珊王朝	
238	日本女王卑弥呼遣使至 中国	
270—280		罗马巴高达运动兴起
284—305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约300	日本大和国家兴起	
306—337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313		米兰敕令
约320—520	印度笈多王朝	
330		罗马迁都拜占庭
395		罗马分裂为东西帝国
399—414	中国法显游印度	
420—589	中国南北朝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486		法兰克王国建立
491—529	伊朗马兹达克起义	
527—565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
532		东罗马尼卡起义
534		东罗马征服汪达尔王国
535—555		东罗马征服东哥特王国
570—632	穆罕默德	
581—618	中国隋朝	
618—907	中国唐朝	
622	穆罕默德迁麦地那	
627—645	中国玄奘西行	

645—654	日本孝德天皇	
646	日本大化革新	
661—750	阿拉伯倭马亚王朝	
675	新罗统一朝鲜	
710	日本奈良时期	
747—750	阿拉伯穆苏里姆起义	
750—1258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768—814		查理大帝
794—1192	日本平安时期	
802—1431	柬埔寨吴哥王朝	
843		《凡尔登条约》 法兰克国家分为三部分
960—1279	中国宋朝	
980—1009	越南前黎朝	
997		法国诺曼底农民起义
1010—1225	越南李朝	
1024		法国布列塔尼农民起义
1044—1287	缅甸蒲甘王朝	
1054		基督教会正式分裂
1066		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
1096—1270		十字军东侵
1162—1227	成吉思汗	
1187	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	
1192—1333	日本镰仓幕府	
1198—1216		教皇英诺森三世
1204—1261		拉丁帝国
1225—1400	越南陈朝	
约1254—1324		马哥·波罗
1258	蒙古攻陷巴格达	
	阿拉伯帝国灭亡	
1271—1368	中国元朝	

1287—1555	缅甸阿瓦王朝	
1296	中国周达观出使柬埔寨	
1303—1307		意大利多里奇诺起义
1336—1573	日本室町幕府	
1337—1453		英法百年战争
1358		法国扎克雷起义
1368—1644	中国明朝	
1369—1415		约翰·胡司
1370—1405	帖木儿帝国	
1378		佛罗伦萨梳毛工人起义
1378—1424		约翰·杰士卡
1381		英国瓦特·泰勒起义
1392	朝鲜李朝建立	
1405—1433	郑和七次下西洋	
约 1405—1468		斯坎德培
约 1410—1431		贞德
1419—1434		捷克胡司战争
1452—1519		达·芬奇
1453	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	东罗马帝国灭亡
1455—1485		英国红白玫瑰战争
1473—1543		哥白尼
1478—1535		托马斯·莫尔
1483—1546		马丁·路德
1487		迪亚士航抵好望角
约 1490—1525		托马斯·闵采尔
1492		哥伦布航抵美洲
1498		伽马航抵印度
1519—1522		麦哲伦环球航行
1519—1521		科蒂斯侵略墨西哥
1521		德国茨威考城工匠起义
1524—1525		德国农民战争

1526	印度莫卧儿帝国建立	
1531—1536		皮萨罗侵略秘鲁
1536		加尔文宗教改革
1545—1598	李舜臣	
1547		俄国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
1549		英国罗伯特·凯特起义
1557	葡萄牙侵占中国澳门	
1558—1603		英王伊丽莎白
1562—1594		法国胡格诺战争
1566—1609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1569		波兰、立陶宛合并
1581		尼德兰北方七省成立联省共和国
1582—1598	日本丰臣秀吉统治	
1588		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
1592—1598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600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2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3—1867	日本德川幕府	
1606—1607		俄国波洛特尼科夫起义
1618—1648		欧洲三十年战争
1624	荷兰侵占中国台湾	
1637	日本岛原起义	
1640		葡萄牙恢复独立
1644—1911	中国清朝	
1654		沙皇俄国吞并乌克兰
1662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7—1671		俄国拉辛起义
1689	中俄《尼布楚条约》	